

探
索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 索

二〇二六年第一期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6. 1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6年1月

征稿启事

2026年，《探索》将持续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努力推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原创性成果，欢迎大家不吝赐稿。

一、常设栏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重点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研究等。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新时代国家治理前沿问题、国家治理数智化与数字政府建设、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四大全球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等。

党的建设研究：重点关注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数智时代党建工作创新、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等。

公共治理研究：重点关注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数智治理、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等。

文化与传播研究：重点关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与信息化转型、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等。

二、动态栏目

学术前沿：重点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问题、党中央重要决定决议政策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国家重大战略问题。

数字经济研究：重点关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包括健全数据要素制度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及完善平台经济领域监管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关照。

绿色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推进绿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时代内涵与实践转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建构，绿色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及协同机制。

自主知识体系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标识性概念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探索笔会：重点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前沿问题，一期围绕一个主题以2~3篇文章形成一组。欢迎学者拟定选题，并与编辑部联系，联合展开文章组稿。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 索

2026 年第 1 期 总第 247 期

2026 年 1 月 15 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晓吾

副主任：王 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贵 王炳权 王炳林 王洪树 田鹏颖
刘同舫 杨凤城 佟德志 张贤明 孟天广
陈金龙 吴晓林 吴增礼 周 平 徐 勇
项久雨 秦 宣 蓝 江 燕连福

总编辑：金华宝

副总编：王 慧

本期执行编辑：蒋英州

本期英文译校：陈 卓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 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 011153

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160 号

邮 编：400041

电 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s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 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每册 15.00 元 半年价：45.00 元 / 全年价：90.00 元

目次 | CONTENTS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的回顾与展望 许士密, 韩笑 1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的回溯与前瞻 付文军 1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 秦宣, 郭佳宁 30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研究

公共数据开放何以影响亲清政商关系

——来自城市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王丛虎, 王聪 42

复合型断层: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困局及其生成逻辑 韩瑞波 55

“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与实践路径 丑则静 65

党的建设研究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观照与实践遵循 徐俊 77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探析 刘蕊 89

公共治理研究

-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十五五”时期的进路 谢新水, 佟 洲 100
- 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与有效监管 陈水生, 江沛霖 112

文化与传播研究

- 生成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工智能角色 阎国华, 魏新宇 125
-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与应对策略 王 振 136

Contents

No.1 2026 (Serial No.247) (Bimonthly)

1.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iew and Prosp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XU Shimi, HAN Xiao	1
2.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evel Opening-up	FU Wenjun	16
3.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Roo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QIN Xuan, GUO Jianing	30
4. How Open Public Data Influences the Close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Launch of Urban Data Open Platforms	WANG Conghu, WANG Cong	42
5. Composite Fault: The Dilemma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Its Formation Logic i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N Ruibo	55
6. Core Issu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OU Zejing	65
7.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eepen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the Stage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XU Jun	77
8.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Basically Achieving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Party's Self-reform	LIU Rui	89
9. Basic Logic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Approach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XIE Xinchui, TONG Zhou	100
10. Compound Risks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CHEN Shuisheng, JIANG Peilin	112
11. Generation and Shaping: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AN Guohua, WEI Xinyu	125
12. Hidden Risk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Zhen	136

引用格式:许士密,韩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的回顾与展望[J].探索,2026(1):1-15.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的回顾与展望

许士密¹,韩笑²

(1.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2.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从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及其社会改革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基础。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结合中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厚历史底蕴和强大实践伟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随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展开,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完善,并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及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01-15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1]70}。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1]70}。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包含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根本性质、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部署、目标任务、重大关系、独特观念与世界意义等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以来,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主要论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体系、鲜明特质、出场语境、哲学根基、重大创新、标识性范畴以及方法论等问题。但“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2],需要从改革的角度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因为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3]，“中国式现代化是在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创新研究”(25CWYJ10),项目负责人:韩笑。

作者简介:许士密,男,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笑(通讯作者),女,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4]。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改革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与发展始终的一条逻辑主线。因而本文试图分析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以探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走向成熟完善的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基础

从现代化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有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观念,也有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获得的理论认知。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以及社会改造与民主改革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从经济基础变革的维度推动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和中国以往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迈出了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至为关键的一步。

(一)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5]1081}。新中国成立后,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6]350},毛泽东将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范畴,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207}。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132},初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116}。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科学文化现代化修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8]439}的宏伟目标和“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439}的“两步走”战略构想。“四个现代化”与“两步走”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既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理论性表达。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三大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四个现代化”与“两步走”战略构想赋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实现人民的解放与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经济上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

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确保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上通过消灭剥削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重塑了社会结构,保障了人民的平等权利与基本福祉。在文化上通过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发展人民文化事业,提升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改革(民主改革)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变革,使人民真正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导向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10]。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

“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1]43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根植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出路的勇敢探索。面对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与外部侵略,早期中国共产党并未盲从西方模式,而是将民族解放与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确立了通过革命手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11],实现了“精神上的主动”——找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景^[12]。这一选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精神上摆脱了被动模仿的困境,开始自主规划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逻辑实现了从以往的“被动应急”到如今的“主动引领”的根本性转变。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确立了以“一化三改”为中心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态与社会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制定“一化三改”的总体战略,到设计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渐进式改造路径,再到创造性地运用“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策略。在农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而是创造性地设计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渐进式改造路径,既适应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在工业改造中,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尚有一定积极性的现实出发,采取了“公私合营”这一渐进式改造路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但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既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条件,又避免了产生社会震荡。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问题,增强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3]557}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仅在生产关系层面实现了根本变革,更在上层建筑层面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性。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确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优势,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即始终朝着有利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前进。通过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建设协同推进,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与现代化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独特基质,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避免了苏联早期“先工业化、后集体化”

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根本不同于西方通过殖民扩张和残酷剥削完成原始积累的现代化老路,从而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14]。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更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起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到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再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无不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二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制度根源,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两条腿走路”即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将工业现代化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统筹起来。三是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一精神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超越,体现在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把握,更体现在现代化事业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构建的根本性转变。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到“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再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体现了立足国情、自主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品格^[15]。

(四)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72] 这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包含了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一是用改革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用“民主改革”^{[8]132}、“社会改革”^{[8]107}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有步骤、有计划地引导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转变,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改革的方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方法论启示^[16]。这一历史实践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智慧和建设与改革并举的现代化理念。二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全面推进建设的方法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蕴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方法,核心在于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协同推进,以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根本性变革,还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整体性变革,中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8]132}的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由于缺乏经验,“以苏为师”是必要的。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转变。农业改造没有采取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而是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渐进式过渡形式,成功引导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有采取苏联的暴力剥夺方式,而是创造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这些独创性的实践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的生动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

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形成

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7]208}新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7]208}。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的全面的深化的改革,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辅之以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配套改革和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国策,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一)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核心内容的守正创新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17]164}的重大命题。与“四个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的现代化”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程度。邓小平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来阐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将现代化的落脚点从国家层面的“强国”目标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到人民层面的“富民”目标。“小康”目标更加贴近实际、贴近民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奔小康”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既体现了对强国目标的矢志不渝,也彰显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涵的时代性调整与丰富。

一是从“领导核心”到“根本保证”的理论创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6]350}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确立的这一原则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削弱、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18]588},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二是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四个现代化”重点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反映了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根本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将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纳入现代化目标体系。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每一次拓展都反映了党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三是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务实调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步走”战略构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热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无论是“两步走”还是“三步走”,其内在逻辑都是将宏大的现代化目标分解为若干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阶段性任务,通过完成一个个具体目标,最终实现整体战略目标。这种循序渐进的战略定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

(二) 通过全面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373}。这一概括不仅廓清了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优化生产关系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目标,以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战略布局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20]。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取得突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核心是搞活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逐步转向制度创新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全面改革,逐步构建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主要围绕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两大主线稳步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同时,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也协同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教育、科技、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核心要素。“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7]40} 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把人才培育和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为创新驱动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融合发展路径^[21],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续而强劲的内生动力。

(三)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伴随“改革”的是“开放”。“改革开放”最早表述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来演变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19]98}。对内经济搞活就是对内经济改革。因此,“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也可理解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党的十三大提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改革开放”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9]368}和“关键抉择”^[22]。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为开放创造条件,开放又倒逼和推动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微观主体缺乏活力等严峻问题。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从内部着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全面而深刻的内部改革,对外开放将缺乏有效的承接主体和制度保障,难以发挥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内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理念、规则和国际竞争的压力,这种外部压力被转化为国内改革的强大动力。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伴随着国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23]。对外开放带来经济、政治层面改革的同时,为文化领域注入了新的空气和活力,推动了文化体制的深刻变革。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制度保障,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注入外部动力,对内改革和

对外开放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四) 确立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7]163}。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就实践而言,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实践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内容,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独特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既体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通过全面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与“普遍特征”日益凸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的集中体现^[24]。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模式,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社会撕裂等诸多问题,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25]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内含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立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市场化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和运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现代化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正式确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26]334}。面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4]。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一) 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建设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机制重塑,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时代内涵。

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与活力。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制度,不仅为市场主体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更通过深化户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人口、资源在城乡和区域间的优化配置。聚焦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锚定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双向赋能,既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27]。通过构建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了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稳定性,用实际行动阐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内涵。

全面深化改革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原则的与时俱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28]。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既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又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注重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的思维方法,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效益。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原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引。

(二) 优化和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又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政策协同与效果共振。经济体制改革以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突破口,将高速增长阶段的规模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质量红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衔接,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同步推进,既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充分释放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协同效应,推动经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嵌入现代化治理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文化体制改革以文化自信自强为价值内核,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使文化建设与物质文明提升同频共振。社会体制改革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围绕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加大制度创新,使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制度安排,使生态文明建设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动力,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互动共生。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廓清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升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生链式联动。一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牵引,通过“顶层设计—试点先行—总结提升—制度强化”的闭环机制,使制度成熟定型与改革动态调整并行不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二是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将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三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从而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和现代化建设优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经济双循环、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绿色转型等多重目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战略维度上获得了可迭代升级的系统性优势。

(三)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制度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根本保证。”^[29]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沿着既定的战略方向稳步前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蕴含在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制度逻辑之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突出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框架下,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174]。

(四)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打开更大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结合,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举措,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催生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新理论的产生。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举措,构建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命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

文化体制改革着力破解文化建设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的创新。通过深化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举措,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通过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社会体制改革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同时强调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难题,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30]。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四、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趋势

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创新,特别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党的建设等关键领域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由初步构建走向成熟完善。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个重要论断,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完备,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新的内涵。新时代新征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制度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升华为解码增长奇迹、重塑文明形态的世界性议题,实现从“本土话语”到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跃升。

(一)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继续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28]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把改革引向纵深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革经验、探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改革谋划与具体举措的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既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整体性、协同性和渐进性的统一,又呈现出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31]。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每一项实践创新,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继续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坚实的根基。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体现着改革决心与意志、改革方向与方式的一以贯之,又反映出改革原则与经验、改革内容与重点的与时俱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使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双向互动和彼此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问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深刻回答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问题;提出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问题;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深刻回答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策略和手段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论、目的论和实践论,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怎样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3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一是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33]。这一定位不仅是对未来五年发展阶段特征的深刻洞察,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的学理性总结,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进程动态演进和阶段划分的思想,强调了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有机衔接和战略协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二是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33]。夯实基础就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全面发力就是在“五位一体”各领域协同推进。这一定位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发展动力和发展路径的思想,强调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辩证关系,以及在关键节点上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战略方法,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三是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可衡量的阶段性指标。这种目标导向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了可以通过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奋斗来实现的具体规划,不仅增强了发展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也为评估发展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战略管理和目标治理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战略谋划能力和目标执行力。这些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创新性贡献,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战略任务和政策举措,从而在多个维度上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发展路径和战略目标的理论认知。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完善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使命任务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贯通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十个具有标识性的重要论断充分表明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认识更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更深刻、对中国式现代化坐标的认识

更清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在理论创新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自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系统的实践路径。

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再认识与理论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实践检验与理论丰富,“十五五”规划建议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主要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以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新质生产力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基点,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支撑,对新征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擘画和系统谋划,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建设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擘画了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个环节的发展蓝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学理化创新和体系化跃升,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系统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上达到了新高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熟完善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不仅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新的现代化模式和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新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表率,为全球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在国家治理理念上,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照搬别国模式,保持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34],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自觉和崇高的全球关怀^[35]。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极富创造性的文明话语建构工程。”^[36]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新时代新征程最集中的体现,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石。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旨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理论支持和知识基础。初步构建起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发展,这既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随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通过提炼“改革驱动型现代化”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构建“全要素制度供给”政治经济学范式和塑造“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从本土话语到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跃升,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思想力量^[37]。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探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改革开放谋划与具体举措的过程。作为生产关系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尝试,开辟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迈出了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至为关键的一步。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相对封闭的探索转向开放环境下的改革创新,打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更在方法论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与推进,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入了系统集成和全面提升的成熟完善阶段。改革之所以能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于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遵循与运用。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更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38]。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在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多的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南方国家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繁荣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携手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当改革驱动型现代化完成从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到全球公共思想产品的跃升时,中国式现代化便不再只是“中国样本”,而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提供启示和借鉴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2]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求是,2023(2):4-9.
- [3]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5-11-21.
-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王常柱. 民生导向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与价值[J]. 探索,2024(6):1-15.
- [11] 周建超.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基本认知与理论探索[J]. 江苏社会科学,2025(3):29-38.
- [12] 张雷声. 从现代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5):13-22.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毛泽东年谱:第5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4] 肖唤元,孟晓瑞.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性探索及奠基性贡献[J]. 宁夏社会科学,2024(2):61-70.
- [15] 丁俊萍,贾书衡.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点和现实启示[J].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3):54-65.
- [16] 金民卿. 走自己的路:新中国75年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J]. 红旗文稿,2024(19):24-28.
-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第4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丁燃.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J]. 探索,2025(3):15-28.
- [21] 刘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守正创新[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22.
- [22]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07-10-25.
- [23] 谢富胜,匡晓璐. 转型增长的中国奇迹[J]. 教学与研究,2021(11):30-42.
- [24] 张来明.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N]. 光明日报,2021-11-24.
- [25] 骆郁廷.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56-63.
- [26]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7] 赵庆杰,许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逻辑、现实要求与实践进路[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51-58.
- [28]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25-10-24.
- [29]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 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N]. 人民日报,2023-12-04.
- [30] 中共生态环境部党组.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J]. 求是,2024(21):33-38.
- [31] 蒲清平,马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10.
-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J]. 求是,2025(1):34-39.
- [3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
- [34] 曹海军.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J]. 探索,2024(5):1-14.
- [35] 何力,张思军.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球正义的思想基础研究[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39-48.
- [36] 虞崇胜. “四手联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时代场域[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1-10.
- [37] 蒋英州,何红彦.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80-92.
- [38] 宋才发.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 党政研究,2024(5):18-29.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iew and Prosp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XU Shimi¹, HAN Xiao²

(1.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to advanc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aid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eps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steadily promoted according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rategic layout, so as to initially form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 summarizes and elaborat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mak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re clear, more scientific, more sensible and feasible.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united and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gradually buil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trong practical strength by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summar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further deepening comprehensively reform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have advanced th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constructed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mor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for the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eory.

Key word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引用格式:付文军.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的回溯与前瞻[J]. 探索, 2026(1):16-29.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的回溯与前瞻

付文军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化与拓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选择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是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得以展开的,二者内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展开了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构思和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觉的开放意识积极寻求“外援”辅助现代化建设并推动“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方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建设规律的认知,并实事求是地推出了以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基础更牢、水平更高、布局更优、保障更强和活力更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而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深化与拓展,在实践和理论上凝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崇高目标。新时代新征程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随之走向世界,为人类现代化和文明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世界历史;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16-14

现代化的推进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展开的,它需要妥善处理好“对外”的各种关系。这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经验,也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议题。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普遍交往的扩大,都直接促使那些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逐渐崩解,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近现代以来,欧美国家掀起的现代化逐步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使得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不得不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对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且充满悖论的难题,即是否对外开放和如何对外开放。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印证了这一点,因为西方列强入侵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封建统治腐败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3}。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开始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对外开放的认识逐步提高,深刻认识到“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2]147}。对外开放已经成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必选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明确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此基础上明

作者简介:付文军,男,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明确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标志着党和国家依照改革开放的实际而逐步提升了对对外开放的要求、标准、层次、质量和水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3]9}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要求在开放、改革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和开放水平的显著提升,还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拓展与走向世界。

一、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层面的交流与互动也就成了常态。世界历史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2]147}是全球化时代的明智之举。现代化的出现与普及、对外开放的实施,二者都根植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并统一于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审视现代化的必然性及其内在要求,才能科学洞察对外开放的内在驱动力与外在压力之间的关系。现代化与对外开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是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得以展开的,它们内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

(一) 世界历史的开放性特征与对外开放的抉择

“‘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4],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展现自身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19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力剖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世界历史就是现实个人在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5]540}等一系列条件来推动各个世代不断交替的现实过程。根据唯物史观的思路与逻辑,世界历史就是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推动的,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生成性”特质。这种“实践—生成性”既不是目的论的达标过程,也不是观念论的抽象历程。马克思创设了一种全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观,这种历史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强调历史必须与现实个人的活动方式相联系。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历史观还是以“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为内核的,强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和现存状况都要“从不断的运动中”去深刻把握其间的“暂时性方面”^{[6]22}。据此看来,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更新。只有在唯物且辩证的视域中来审视历史和世界历史,才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世界历史所具有的实践—生成性特质强调要“在实践中求解现实问题”^[7],内蕴着一种开放性的要求和特征。因为现实个人的活动形式与内容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这就预示着世界历史的推进方式和现实进程也会随之改变。这种依照现实状况而变更的情形就要求具备一种开放性的视域或思路来对其进行把握,实践性、生成性和开放性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得以统合。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世,整个世界日渐开放并连为一体,全球化也从一种设想和理论变为了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世界市场的成型,世界市场全面影响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各项活动,继而全方位统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逻辑按照自己的欲求和面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资本增殖的目的和需求之下重新塑造时间与空间,使得整个世界历史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如此,

世界历史进程中人们存身的空间也得以不断开放,不同空间之间的隔膜逐渐消解、跨地域的空间之间的间隔得以缩短,使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整个世界的开放性程度也逐渐提高。“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61}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实确认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事实。只要以“发展论”来审视世界历史,就必然要以动态的思维和开放的视域来对待世界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过程。世界历史的实践生成性、开放性也就直接要求它的“参与者”必须要以开放的姿态和行动来处理现实中的各项事务,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选择。只要置身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个欲求发展并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也必然要实行对外开放。

(二)“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开放意识

世界历史发展的诸多事实已然表明:各种现代化的发展类型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市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开放”。总体而言,“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9]123},即“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前者又称为“内源性变迁”,它依靠内部孕育现代生产力的条件而逐步推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商业化和资本化,并据此自觉地开放市场、打开国门。后者称为“外诱性变迁”,它多是在遭受外部冲击或深受外部影响而在制度、思想等方面发生变革。按照这种划分,近代中国是被动融入世界历史的,是在外部现代化冲击之下而逐渐展开了对开放及其作用的认知与实践。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场冲突及其灾难性后果,使得广大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与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未能改变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境遇,更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引出了“中国与近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些冲突和斗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9]235}。就此而言,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西方列强入侵,还是一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较量,中华民族也被卷入资本所构建的世界市场之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0]609}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开启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与实践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道路。

从历史来看,中国虽有主动开放的一些举措和事实,但全面接触现代化的“道”与“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动展开的。鸦片战争之后,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充分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威力。不仅西方现代化的“器物”在这场战争中尽显优势,而且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思想等也对沉睡已久的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封闭自守、与世隔绝将不利于民族发展,“睁眼看世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和被动的选择,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产生的一种自觉。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输入中国,在于“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1]10}。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探索中找到化解危机、走向自强的正确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开放的眼光审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并以此为思想认识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以

开放的态度积极利用一切有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资源。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中主动接纳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上了正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诉说了—个朴实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11]187} 在与现代化的深度交互中,中国人民以开放的姿态踏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社会实际不断调整、完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也是一种开放视域、意识、姿态或理念的践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对外开放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以在实践中铺陈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现代化系列部署与实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坚实的制度保障。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反思和认真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开放”的过程中注重吸收苏联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在—段时间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向外国学习”与争取“外援”辅助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展开的,这些实践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正式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614} 在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直强调中国需要建立国际联系和追求国际合作。“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13]340}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向外国学习”这一口号,还提出了“有原则地”学习的基本思路:“—切民族、—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4]41} 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党和国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5]352} 的方针。随着美苏关系、中苏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积极寻求“中间地带”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中国迅速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些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积极谋求国际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直依据时代发展的局势和现实需要而—积极争取“外援”,并竭力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争取“外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见识到了苏联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优势与成效,同时也—积极吸收了国外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在梳理对外关系与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辩证智慧处理好了外部援助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在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抉择中,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16]10} 的现代化建设思路。毛泽东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解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4]380} 这种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认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17]。

(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以苏为师”的现代化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禁运、军事封锁的策略,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8]¹⁴⁷³。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实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8]¹⁴⁷⁵在贯彻落实“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过程中,中国和苏联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深度的交流和互动,中国的现代化就此进入了一个“以苏为师”的时代。

从苏联学习现代化建设经验,依托苏联支援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实际状况的必然选择,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的开放主要是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苏联除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上的直接援助外,还派遣了大批的专家来中国展开援建行动并帮助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⁴¹⁰。与此同时,中国还采用了以“中央计划”和“出口骨干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联式外贸体制”^[20]。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代化建设过程来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为中国提供了参照。除了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直接的援助与指导外,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训和经验也为中国所重视。与此同时,同包括东欧和朝鲜、越南、蒙古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三)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方案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逐渐出现,双方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召回了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万多名专家,废止了两百多个科技合作项目。“一边倒”的外交方案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被迫中断,之后一段时间中国“基本同世界隔绝”^[21]。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极力寻求和开拓对外交往与发展空间。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刻,中国积极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建交,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的开放在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中打开了新的局面。

从中苏交恶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国际环境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真总结苏联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还积极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走向问题。按照苏联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也十分重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建设。党和国家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明确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22]¹⁴⁴作为基本任务提了出来。同时,改变“非社会主义的工业”的基本性质,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23]¹⁸⁷。在对现代化的认知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方面,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聚焦“工业化”,在具体工作中始终强调我们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要求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集体化’与工业化相适应”^[2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周恩来

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现代化的视角从“工业”开始扩展到“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16]132} 等其他方面和领域。毛泽东也明确提出在人民获得解放之后就要开始“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25]24} 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到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6]439}。至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重视工业”到“四化同步”的转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情和现实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抉择,又是基于对苏联现代化模式反思的结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打开,中国也开始接触并利用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成果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苏联的撤资和单方面毁约,中国共产党人推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来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相继建交,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设备、开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援助和展开国际交流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推进方案。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虽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也积极反思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适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虽然并未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然认识到离开外部环境、外部援助和外部关系的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通过集中力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展开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储备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15}。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尽快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21],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成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一) 对外开放格局与社会主义本质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知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认识到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密切关联。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6]133} 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对外开放的焦点放在了“引进”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国际市场资源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了现代化建设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26]233-234}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深度反思,它不仅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审视了现

代化建设与开放政策的关系,还再次明晰了现代化进程中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互动和耦合。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最关键的理论问题。围绕“社会主义”这一现代化的核心,邓小平明确了它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373}。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整个现代化的工作任务就得以明确:依照“实际”来建设“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6]231}。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是统一的关系。只有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厘清了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7]37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26]236}。正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推广开来。

中国式现代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解放中推进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持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互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知逐渐科学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既不能走封闭自守的老路,也不能走依附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必须“走自己的路”^{[1]67}。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需要做好“开放”和“自主”之间的平衡,对外开放并不是要求放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也并不是要排斥对外开放。在独立自主中有序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坚守自主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理论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才得以持续推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创造性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和反思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关系改革,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新境界^[28]。

(二) 对外开放部署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对外开放不仅直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还让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清了我们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探索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开掘出的一条适合中国人自己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开放还让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世界上各类现代化的本质、模式以及问题,中国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开掘的。从所有制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深厚的私有制根基,这种现代化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它是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现代化。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严格遵守了公有制的建构原则,在全社会内推行普遍的公有制,但排斥市场经济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着重强调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并加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

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7]110-111} 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原则”的现代化,且这一原则必须是以公有制为基底的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其特色之处就在于实现了在原则性基础上贯彻灵活性的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9]17} 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9]256},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

从经济组织和运行机制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利润或利益为导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必然力推市场扩张、自由竞争和垄断谋利。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计划指令来调控国营企业、集体化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谋划现代化建设方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运行机制”^{[30]487}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理论创造。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31]22} 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0]16},再到“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2]629} 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3]627},直接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18}。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和有效经验,在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之下激发了市场的活力、释放了政府的能量。

从国家权力结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守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推行“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流执政。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统筹有限的资源来展开现代化建设,但逐渐走向了僵化落后,从而阻碍了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目标,系统部署了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维护安定团结等具体工作,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以自我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下不断摸索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打开国门搞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33]151} 和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建设,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7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确立和拓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1]59} 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环境中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34]99}。在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

过程中,党的二十大不仅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而且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25}纳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版图之中。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标示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得以深化,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一) 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空间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愈发紧密,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主动的交流和更加积极的行动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35]25}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地谋求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中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的中国”积极助推“现代化的中国”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思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并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便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与世界的交互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举措与方案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了内外联动、系统协调、包容开放的现代化格局,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基础更牢”的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引领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都跃上了新台阶。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还按时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使得中华民族正以“强起来”的状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3]4-5}。这些“条件”“趋势”和“优势”增强了对外开放的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夯实了对外开放的根基。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度的交互过程中得以共进。

以“水平更高”的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高水平 and 高质量是统一的,高水平的开放必然会对开放的质量有所要求,高质量的开放也会对开放的水平有所规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落脚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36]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也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主动的战略来拓宽国内国际的合作空间。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努力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提升,以此推进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成型。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38},在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以“布局更优”的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地部署了对外开放的格局。依托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边境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各级各类功能性平台,逐渐建构起横贯东西、穿透南北,囊括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于一体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如此,还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35]27},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完善并着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通过建立涵盖国内和国际的立体开放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以“保障更强”的开放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全面、立体的多维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11]¹⁸²,确保了对外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还充分顺应民意、关注民情、善待民众并致力民生,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此便为对外开放汇聚了大量的民力、民智,有效地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进程。社会主义方向、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等都有机地融入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为对外的顺利开放保驾护航。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贯彻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把握机遇中深化合作,在深化合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诸多的“保障”有效地推进了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反哺”了中国式现代化。

以“活力更盛”的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充满活力的开放,这不仅体现为对外开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更是为对外开放以来的实践成果和显著成就所证明。对外开放并不是单论对外的开放,还要求对内的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辩证中激发内部和外部的活力,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局面^[37]。正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全体人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全社会的创造潜能得以释放,甚至整个世界的创造活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迸发。活力的激发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它需要在一定的秩序和范围内才能有效激发并释放正能量。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和加强舆论引导等,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都在“活而不乱、活跃有序”^[2]⁸⁵的动态平衡中得以持续推进。

(二) 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出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化、体系化和学理化的认知,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的时候,首先结合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兼具时代性、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术语与判断,比如“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倡议”“文明交流互鉴”“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提出的富有时代性的原创性和标识性的范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而不断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实践中凝练出的系列术语、判断与范畴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所独有的“标识”,又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世界的深度交往中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特色与内涵、重大原则和战略安排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理念的颠覆与超越,能够最大化地调动民力和民智。坚持自信自立要求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问题自己解决的方案来化解一切矛盾和处理一切问题。坚持守

正创新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顺应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引领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要求现代化建设必须积极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中富有前瞻性地思考现实问题、在全局性的视域中谋划相关建设方案、整体性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事业。坚持胸怀天下则要求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现代化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在实践过程中凸显了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实践的表征,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放的视野在多重比较中凝练而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国际力量调整、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外部打压遏制升级等风险挑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受住考验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深刻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回应了现代化该“怎么干”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则是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阶段性目标。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和“怎么干”、“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目标”等基本问题构建了一套内容完备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有序展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一具有时代高度和创新高度的新范畴,还在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过程中深化、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理论指导,而且为丰富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中国贡献^[38]。

五、新时代新征程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走向世界

身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从理论上为一个一穷二白、饱受欺凌的落后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援和历史智慧,还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深刻地影响并有力地助推世界历史的进程。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深化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活力之源和动力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2]7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现代化建设中迎来新的深化和拓展。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现代化的局势,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思考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经验材料、理论储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积极发挥其指导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条件。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史的考究中,既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实践方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综合把握,又要以开放的思路和发展的观点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稳定性与超越性、具体性和抽象性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不断走向世界,为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在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批判与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67} 这一论断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承续关系、重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异同提供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充分尊重历史并积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处理好了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在辩证审视西方现代化和苏联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发展。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深受人民拥护、体现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理据充分地重构了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更为准确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81}。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了它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国式现代化使得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为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再次印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具说服力、更加强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强有力地助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索中不断推进的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它积极探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与“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以崭新的面貌引领着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来谋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在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必须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并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新时代新征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

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获得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成熟与完善,而且在对外开放中成为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化理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4]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21(6):30-48.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刘同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境界[J].中国社会科学,2021(9):4-25.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6]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7] 丁燃.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J].探索,2025(3):15-28.
-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0] 郝雨凡.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5):57-63.
- [21]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4-16.
- [22]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4] 秦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2):4-21.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8] 刘勇.论伟大社会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J].探索,2023(4):41-52.
- [29]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0]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2]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3]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6] 王文涛.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求是,2025(14):25-30.

[37] 程运麒. 中国共产党以系统观念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路[J]. 理论探索, 2025(2): 52-58.

[38] 吕晓斌.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J]. 探索, 2023(6): 14-27.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evel Opening-up

FU Wenju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Reform and opening-up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advanc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fuels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ha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choose the path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Both modernization and opening-up unfold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and are inherent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have consciously carried ou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actively sought foreign assistance to support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blueprint of the synchro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with a conscious awareness of opening-up. During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the CPC hav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its laws of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ut forward a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pragmatic manner which i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s its goal.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he CPC have not only continuously advanced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level opening-up featuring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a higher standard, a more optimized layout, stronger safeguards and greater vitality,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d the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expand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which has been condensed in both practice and theory into the lofty goal of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As high-level opening-up is further advanced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also making its way to the world, thus contributing mor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opening-up, high-level opening-up,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引用格式:秦宣,郭佳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J].探索,2026(1):30-4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

秦 宣,郭佳宁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相通、人文精神相承、道德规范相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发挥着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理论根基、提供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的重要功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坚持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秉持开放包容,在弘扬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和有力支撑。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脉;“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30-12

现代化是社会发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现代化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内在规定与各国特殊情况所凸显的独特特征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367},并强调“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2]31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既源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也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和资源禀赋。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精神命脉和文明底色,深刻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鲜明特征、价值指向与实践旨归,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独特标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调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3]26}。这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再次明确了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脉的重要作用,需要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系统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全面把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坚定历史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D202512),项目负责人:郭佳宁。

作者简介:秦宣,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佳宁,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培根铸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不断激扬创新创造活力。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从多维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交汇,扎根历史深入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曲折历程,立足现实系统探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丰富素材。

第一类研究以理论逻辑展开,主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4]，“人口规模巨大”继承了“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源于“仓廩实而知礼节”的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契合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出“和合”智慧^[5]。有学者认为，“保合太和”的宇宙观与“大道之行”的天下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和深层逻辑^[6]。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7]。

第二类研究以历史逻辑展开,主要探讨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曲折过程。有学者聚焦现代化起步阶段对于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如晚清兴起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民国初年的“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障碍,而文化保守主义陷入复古迷思,无不陷入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的二分对立中^[8]。有学者聚焦中国共产党对于二者融合的探索,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指明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总体实践道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小康”概念融入现代化目标,进一步明晰了以传统文化支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新时代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作为标志,体现着文化自觉的新高度,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鲜明的路线图^[9]。

第三类研究以实践逻辑展开,主要探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和实践路径。有学者从“两个结合”出发提出,通过激活传统理念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传统文化精神血脉融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0]。有学者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要打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11]。有学者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主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文明对话破解“文明冲突论”^[12]。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系统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要素体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较为深刻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然而,现有研究的学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强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传承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嬗变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待深化;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以辩证唯物主义视域考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巨大能动性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方法论的维度考

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尝试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之处,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分析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更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提供知识增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470-471}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我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将对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产生影响。历史继承性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意味着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文化传统必然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土壤,在吸收中华文化精髓中开拓和发展,这一内在逻辑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高度契合。分析把握这种多层次的契合,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4]314}这一重要论述清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次与结构,即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指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等深层次、根本性的宏观维度,人文精神指精神、价值等中观维度,道德规范指具体表现的微观维度。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维度审视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人民观等思想观念与传统文化相通,所体现的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等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相承,所涵盖的道德规范与传统文化相契合。

(一) 中国式现代化鲜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作为最根本、最深层的哲学思想和思维逻辑,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观念既为社会实践提供根本指引,又塑造着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批判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并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实践探索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民族特质的哲学思维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5]15}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鲜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具体体现为两者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民主观上高度契合。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民主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凸显中国自古以来以人民为国之根本。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亦劳止,汜可小康”体现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权有无,均贫富”体现着中国古代追求公平正义、主张均平共富的朴素理想。与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蕴含着“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庶之”“富之”“教之”强调不仅要物质富足,还要精神富裕。“富润屋,德润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论述指明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与西方国家物欲膨胀、精神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体现天地相通、万物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了天、地、人是自然的有机整体,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与西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强调绿色发展,明确指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相契合。“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天下都崇和向善的价值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推崇求同存异的“贵和”思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体现和睦相处的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观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人类共同福祉。

(二)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作为文化精髓和民族基因,人文精神植根在每一个人内心,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重要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范式与行为取向。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精神品质,其核心在于确立“人”的价值地位,强调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和精神的关怀与尊重,追求社会和谐。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显著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既保持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与结构稳定性,又不断与时俱进,充分彰显了民族精神的时代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6]13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具体提炼为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奋发奋起的重要原因,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延续与革新。

一是与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核心范畴的“家国同构”理念,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敬天保民”的政治哲学萌芽。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国古代将个体、家庭与国家命运熔铸为有机整体的人文精

神的标志性表达,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价值序列。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爱国精神实现了价值认同的升华,即传统忠君观念升华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西方现代化模式深陷民粹主义泛滥与认同危机的困境时,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破解现代化难题的关键所在,更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启示。

二是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个体德性的修为要求以及对社群伦理的价值追求,构成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无论是应对自然挑战的实践探索,还是面对外族入侵的顽强抵抗,奋斗精神逐步熔铸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将这一传统精神淬炼为系统的革命精神谱系:井冈山精神彰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志气;“两弹一星”精神体现自力更生的勇气;改革开放精神展现敢闯敢试的锐气。这种奋斗精神既保持历史延续性又体现时代创新性,使中国式现代化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常见的“发展—享乐—停滞”陷阱。当部分发达国家陷入福利依赖和增长乏力的困境时,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挑战、社会变革时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三是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一脉相承。中华文明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其“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多民族文化的吸纳兼容以及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动态延续包容精神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的范式创新,传统“美美与共”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了文化理论的兼容创新,传统“和合共生”思想转化为“两个结合”的理论优势;实现了发展道路的系统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智慧孕育出多样化现代化路径。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又贡献了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方案。

(三)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塑造国民品格和引领文明风尚的价值基石,不仅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构筑伦理基础,而且是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并强调“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17]5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关于个人的自我规定、关于人与人的秩序规定、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道德基础和社会价值准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为道德规范的传承,更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构建了“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实现了对道德基因的延续。

一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兼善天下”“藏富于民”树立宏观层面的道德理想,寄予国家“富强”的愿景;“民贵君轻”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惠民,体现为“民主”的价值目

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通过礼乐教化、德性修养构建“文明”社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致中和”,这与“和谐”价值观相呼应。

二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合包容的社会理想主张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理念倡导多元共存,与“自由”“平等”相融通;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反对“不义而富且贵”,体现崇尚“公正”的伦理原则;法家提倡“刑无等级”,为“法治”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是“爱国”精神的传统体现;“执事敬”等思想、“业广惟勤”的勤勉态度和“敬业乐群”的协作精神,显现出传统文化中的“敬业”观念;“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诚信”构建道德根基;“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精神,是传统文化在“友善”中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道德规范的结构契合,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与升华。在这一过程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伦理穿越时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路径焕发出现代活力,体现了当代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马克思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8]649}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精神因素,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持久的、深沉的、有力量的推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理论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历史遗产,而是内化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中,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9]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思想根基。

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毛泽东主张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拒绝盲目复古。对于传统文化,他提出既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也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20]707},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甄别。其次,毛泽东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内涵,提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其服务于革命与建设。最后,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一要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二要厚古薄今,古为今用;三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1]54}。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奠定理论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发展、完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基因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丰富资源。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强调反对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他赋予“小康”这一传统概念新的时代内涵,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他还提出“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方法论^{[22]212},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此外,邓小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二者并不对立,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江泽民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警惕盲目复古。江泽民将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融入外交战略,“和合”理念成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提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史为鉴,将历史经验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在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胡锦涛强调要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3]27}。胡锦涛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夯实理论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的判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4]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脉论”“基因论”等许多原创性理论,将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塑和现代转化,使其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旧邦新命”的文化基因,使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让马克思主义枝繁叶茂,让传统文化生机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立根铸魂。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民族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凝聚奋进动力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1]441}在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价值引领、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整合的聚焦点,通过重塑集体认同符号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锚点,缓解转型期的价值真空危机,避免现代化引发的认同撕裂,构建现代认同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重塑文化主体性,其价值内核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方向,形成强大的精神磁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的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大

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理念广泛的价值认同,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欲膨胀、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之路,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纽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凝聚力。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冲突,这往往导致社会陷入文化撕裂、认同危机中,极端情况下会造成现代化中断^{[25]412-413}。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积极因素,通过伦理共同体维系社会信任,为现代化转型提供“软性支撑”。基于此,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局部利益冲突、观念冲突时,优秀传统文化起着一种文化“粘合剂”的作用。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叙事和民族情感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从而将社会有效整合为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推动力。传统文化作为“历史基因”,通过选择性适应与功能性转化成为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功能性剥离与结构性嵌入激活现代化的内生发展动能,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怕吃苦、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种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性转化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创造性转化为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为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这些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使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不衰、历经磨难而弥坚。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百余年来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形成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概言之,在现代化的发展变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前行的磅礴伟力,凝聚起鼓舞人们投身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艰苦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向心力筑牢价值共识、凝聚力整合多元力量、推动力激活奋斗基因,形成全体人民顽强拼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局面。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精神命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对外交往等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第一,以文化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科技赋能和产业融合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通过“文化+”打破产业边界,推动文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释放经济建设新动能。此外,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等道德观念有助于规范市场运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以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17]8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其治理智慧创造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比如,民主集中制和

新型政党制度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民惟邦本”理念的延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对“礼法合治”传统的创新。传统治理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因性塑造,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第三,以文化资源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文化现代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表达,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精神食粮,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滋养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以文化符号赋能社会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通过符号转化与机制创新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提供潜移默化的影响;“礼义廉耻”、乡贤文化等有助于构建社会秩序规范,提升治理效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既传承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又适应了现代社会治理需要。

第五,以文化叙事增强国际话语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突破西方话语垄断提供了独特思想理论资源,借助国际传播增强文化软实力。通过“和合共生”世界观、“协和万邦”天下观厚植外交理念,由“和而不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话语体系,通过“达则兼济天下”的叙事框架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文明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文化支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我们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发展理念、治理智慧、精神资源与外交理念,也要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赋能和传播革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3]27-28}。新时代,我们既要立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性支撑,又要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建构其时代性价值,还要形塑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进而在继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根基。

(一) 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6]44}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内涵,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型,两者有机结合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因此,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要植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坚持“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背

景、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发展,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源泉。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阐发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精神内涵和道德精髓。“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旧邦新命,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要依靠‘两个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7]简而言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指导思想,使“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通过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文明基因,使“旧邦”焕发“新命”,二者交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历程。唯有坚守“魂脉”与“根脉”,方能以文化自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堡垒,答好民族复兴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二) 坚持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8]309}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核心路径。守正是根基,创新是动力,二者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转化是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元素进行符合当代需要的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而创新性发展是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拓展、完善。一方面,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其核心在于坚守中华文明的本源性特质。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坚守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与核心价值,坚守文化基因、理论根基和历史根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和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提炼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文化精髓,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活力。

另一方面,创新是守正的发展,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强调内容活化、形式创新、技术赋能和载体转换;创新性发展则聚焦内涵拓展、产业升级、跨界融合和价值输出。这意味着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表达革新实现形式创新;通过回应时代课题的价值重构实现内容拓展,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守的是文明根脉之正,创的是时代形态之新。这一过程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传统基因、通过数字文明重构表达形式、通过全球视野拓展文化边界,最终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三) 秉持开放包容,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绵延五千多年的核心密码。在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的今天,秉持开放包容,在兼收并蓄中创新传统文化、在文明互鉴中弘扬传统文化,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在开放中推动传统文化于创新中赓续绵延。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既要坚守主体性,又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借鉴全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价值的多元重构。坚持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横贯古今、融通中外,不断推进传统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另一方面,在包容中推动传统文化于传播中实现美美与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并非被动接纳,而是主动融合创造新的文化。要完善国际传播格局,创新宣传理念、运行机制、话语体系;要塑造中华文化的良好国际形象,提高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话语。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今天,只有通过交流激活文化基因、传播拓展文明边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塑造更多为世界所知的中华民族形象,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相通相融;才能构建横贯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生态,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拉紧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纽带,更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其精神内涵和独特品格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内在关联性,揭示了作为“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维度上深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通过价值整合与精神滋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并通过多维度嵌入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坚定的文化支撑。立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新部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两个结合”筑牢文化主体性、以“守正创新”激发文化创造力和以“开放包容”拓展文明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汲取历史与面向未来的统一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与创新的双向互动中行稳致远,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4] 韩庆祥,孙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J].学术研究,2025(6):1-11.
- [5] 王健,张荣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J].山东社会科学,2024(9):176-192.
- [6] 邵龙宝.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科学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契合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5-26.
- [7] 吴忠民.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影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2):24-37.
- [8] 杨增崇,范嘉祥.从近代“激进—保守”困境到“第二个结合”——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观[J].教学与研究,2024(11):14-24.
- [9] 赵素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形态[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43-52.
- [10] 黄一兵.“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1):1-10.
- [11] 赖海榕,郑济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J].毛泽东研究,2022(6):23-34.
- [12] 陆卫明,王子宜.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J].探索,2023(5):14-25.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7]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4-9.
-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2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
- [25] 塞缪尔·亨廷顿.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张景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26] 习近平.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7] 秦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意蕴[N].光明日报,2025-02-13.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Roo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QIN Xuan, GUO Jianing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in harmony with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ral norms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integrating with Marxism,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s to upholding tradition while embracing innov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adapting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has regained vigorous vitality and vitality,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cultural roo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oviding spiritual strength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great cause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must firmly uphol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solidat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 to upholding tradition while innovating, and build a modern cultural 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ing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we will buil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rough promotion, and provide inexhaustible impetus an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root, “the two integrations”

责任编辑:赵超

引用格式:王丛虎,王聪.公共数据开放何以影响亲清政商关系——来自城市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探索,2026(1):42-54.

公共数据开放何以影响亲清政商关系 ——来自城市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王丛虎,王 聪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在数字中国建设全面深化的背景下,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至关重要。基于 2017—2022 年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 PSM-DID 框架与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改善地方亲清政商关系,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此外,相较于亲近政商关系,公共数据开放对于清白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一方面通过信息共享使政府行为透明化,进而强化权力约束;另一方面则通过价值创造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压缩行政干预空间,最终改善亲清政商关系。由此证明,公共数据开放在赋能政府治理、重塑政商互动模式中具有关键作用,能够为理解数据要素如何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公共数据;数据开放平台;亲清政商关系;准自然实验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42-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1]。在 202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这内在要求政府要通过优化政务服务体现“亲”,干部要廉洁履职和压缩非生产性利益空间落实“清”^[3]。在这一框架下,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治理工具,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从深层次影响政商互动模式,进而促进亲清政商关系的实质性构建。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机制,以期数字化背景下的政商关系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数据已成为关键的新型生产要素^[4],能够持续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公共数据开放则是指公共管理与服务机构在保障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研究:本土理论、成效评价与策略提升”(23AZD979),项目负责人:王丛虎。

作者简介:王丛虎,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王聪(通讯作者),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过专门平台向社会开放可访问、共享和利用的数据资源^[5]。近年来,各地大力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归集整合并统一开放本地公共部门履职中收集产生的各类数据,以推动公共数据共享。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数据开放的宏观治理效能与微观企业价值创造两方面问题。宏观上,公共数据开放作为透明政府的重要治理工具,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与风险防控能力,并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增强城市基层治理能力与经济韧性^[6],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来改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7],推动区域协调发展^[8]并通过提升创新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革新^[9]。微观上,公共数据开放为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信息资源,影响其决策、创新与绩效,主要包括推动企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10]、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改善融资环境^[11],通过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等机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12]。此外,公共数据开放还有助于激发城市创业活力^[13]。

政商关系植根于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14],是政企互动过程及结果的核心体现,构成企业依赖的关键社会资本与根本制度环境^[15]。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稳定预期与资源支持,直接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能提升企业效率与资源配置能力,包括提高投资效率、优化资本配置^[16],并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性交易成本^[17];二是能驱动企业创新^[18]与应急风险防治^[19];三是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营造稳定环境^[20]。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能通过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增进社会福祉。实证表明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引导企业关注社区贡献以履行社会责任^[21],进而提升整体社会福祉。

已有关于公共数据开放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对政府或企业单方面的积极影响,较少关注政企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在宏观政府行为与微观企业反应间的中观层面研究尚显不足。尽管相关研究已开始关注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社会影响,但长期以来,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潜在作用与内在机制未被系统分析。事实上,公共数据开放的重要目标在于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进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并尝试回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公共数据开放是否有助于改善亲清政商关系?二是其促进亲清政商关系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三是该影响是否在不同情境或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厘清这些问题,有望弥补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应与政商关系影响因素交叉研究领域的理论不足,并为理解数字化如何重塑良性政企关系提供关键学理依据。

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在研究内容上,首次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与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丰富该交叉领域的研究内容;在理论层面上,揭示了二者间的作用路径,提出并验证了信息共享与价值创造两项关键传导机制;在研究方法上,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增强了因果推断的可靠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信息共享与促进价值创造方面。因此,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与数据的价值转化,已成为优化政商关系的关键路径。

(一) 信息共享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效应

公共数据开放可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改善亲清政商关系。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政商关系扭曲的重要诱因,而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成本、提升权力运行透明度,从而清除政企信息壁垒。

信息不对称理论源于经济学领域,后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该理论指出,交易双方因信息掌握程度不同易引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22]。在政商关系中,政府通常掌握更多政策与资源信息,企业则处于信息劣势^[23]。这种不对称一方面降低了非生产性利益行为的隐蔽成本,为权力异化提供空间^[24];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为获取信息承担额外成本,加重经营负担^[25]。因此,克服信息不对称是构建良性互动、规范透明的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前提。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坚实基础。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信号传递机制,能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成本^[26],增进政商间的亲近;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权力运行过程的全面数字化,增强了服务效率和效能^[27],增大了权力非生产性利益的暴露风险与隐蔽成本,从而有效约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压缩了公共部门滋生非生产性利益的空间,增进了政商间的清白。据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公共数据开放将显著改善亲清政商关系;

假设 2: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改善亲清政商关系。

(二) 公共价值创造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效应

公共数据开放还可通过公共价值创造机制改善亲清政商关系。公共价值理论为理解数据开放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强调公共管理者应致力于将资源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价值体验,而非仅完成内部指标^[28]⁵⁰。在此视角下,数据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公共价值^[29],其意义已超越技术层面,上升为政府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公共数据开放的价值可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进行理解。静态维度涵盖政治、社会、经济、操作与技术等方面^[30];动态维度则关注价值在数据生产、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的递进实现路径^[31]。二者共同指向价值共创这一核心机制。近期研究进一步将其实践过程归纳为公共价值“期望—调和—共创”的逻辑链条^[32]。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价值期望通过数据平台得以整合与实现,最终形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效益。

结合既有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在政治与社会层面,通过提升政府透明度降低政企信息不对称,抑制权力非生产性利益行为,奠定“清”的信任基础;在经济与操作层面,通过赋能市场主体与优化资源配置,体现“亲”的服务导向;在文化层面,通过推动政企沟通从层级权威转向互动及对话,培育规范的政企关系。

总之,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弥合政企“信息鸿沟”,促进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融合。这将削弱行政干预动机和干预空间,加速政府角色向服务型与价值创造型转变,从而改善亲清政商关系。据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价值创造机制改善亲清政商关系。

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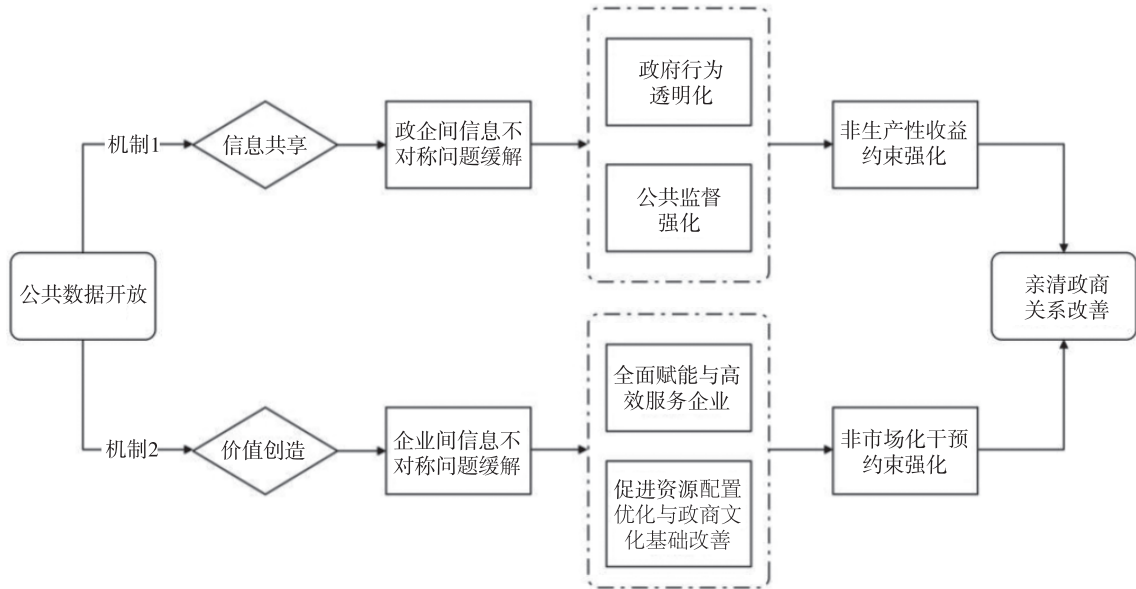


图1 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为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并对假设进行检验,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设计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一)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自2012年以来,国内各级地方政府陆续依托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来推动公共数据集中开放,将当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依法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进行归集、整理并统一开放。由于各个城市实施公共数据集中开放的年份不同,就形成了以此作为政策事件冲击的准自然实验,并适用于双重差分框架^[33]。另一方面,通过双重差分可以有效剔除共同的时间趋势和组间固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从而极大规避实证研究中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此外,是否实施公共数据集中开放可能受到城市行政、经济地位等因素影响,从而产生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削弱准自然实验的外生性,通过PSM处理则能够有效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进而确保DID方法的有效性。

在PSM-DID研究框架下,研究将基于PSM处理后的样本数据估计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Relationship_{i,t} = \alpha + \beta Treat_i \times Post_t + \sum_k \gamma_k Control_{i,t,k} + CityFE + YearFE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elationship_{i,t}$ 表示城市 i 第 t 年的亲清政商关系, $Treat_i$ 表示区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虚拟变量, $Post_t$ 表示区分处理前和处理后的虚拟变量, $Control_{i,t,k}$ 表示城市 i 第 t 年的控制变量 k , $CityFE$ 和 $YearFE$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α 表示截距项, β 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γ_k 表示控制变量 k 的回归系数。该模型不仅能够通过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还能够通过 Within 组内估计避免传统 OLS 下个体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体样本的虚假相关关系。由于回归系数 β 表示政策冲击的净处理效应,根据研究假

设,研究预期回归系数 β 的估计结果应该显著为正,即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改善了当地的亲清政商关系。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Relationship_{i,t}$ 表示亲清政商关系。研究采用 2017—2022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的亲清政商关系指数作为衡量城市政商关系的指标。被解释变量 $Relationship_{i,t}$ 的值越大,表示政商关系越良好。

解释变量。 $Treat_i \times Post_t$ 表示 DID 虚拟变量。其中, $Treat_i$ 表示处理组变量,样本期内实施了公共数据集中开放的城市为处理组($Treat_i = 1$),未实施的城市则为控制组($Treat_i = 0$)。 $Post_t$ 表示处理期变量,当年份 t 为处理组城市 i 实施政策前时, $Post_t = 0$;当年份 t 为处理组城市 i 实施政策后或实施当年时, $Post_t = 1$ 。

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对亲清政商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纳入以下控制变量:(1)经济规模($Economy_{i,t}$)以城市 GDP 的自然对数衡量;(2)人口规模($Population_{i,t}$)以城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衡量;(3)财政收入($Finance_{i,t}$)以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表示,以消除经济规模差异带来的不可比问题,下同;(4)开放程度($Open_{i,t}$)以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

(三) 样本数据

研究选取 2017—2022 年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数据进行分析,并采取如下预处理:(1)剔除 2015 年后设立的城市;(2)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3)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影响。最终获得 1 300 个城市年度观测值。研究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地方政府数据平台、城市统计年鉴以及马克数据网。表 1 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Relationship</i>	1300	37.557	19.238	4.065	34.270	91.670
<i>Treat</i>	1300	0.739	0.439	0.000	1.000	1.000
<i>Post</i>	1300	0.402	0.490	0.000	0.000	1.000
<i>Economy</i>	1300	7.642	1.008	5.646	7.571	10.318
<i>Population</i>	1300	5.873	0.689	3.808	5.919	7.298
<i>Finance</i>	1300	0.074	0.024	0.029	0.071	0.161
<i>Open</i>	1300	0.207	0.272	0.002	0.117	1.417

四、实证结果分析

研究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分析,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确保结果稳健。

(一) PSM 处理结果

研究基于 Logit 模型,以 0.05 为带宽和核匹配方法对样本开展 PSM 处理。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各协变量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拟合良好,且经济规模、财政收入、开放程度等因素与政策实施显著相关。若不进行 PSM 处理,可能引发样本选择偏误。

图 2 展示了 PSM 处理前后各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处理前,各变量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大多接近或超过 20%;处理后,所有偏差均降至 10% 以内,表明样本平衡性得到显著改善。这说

明 PSM 处理有效降低了样本选择偏误,缓解了 DID 估计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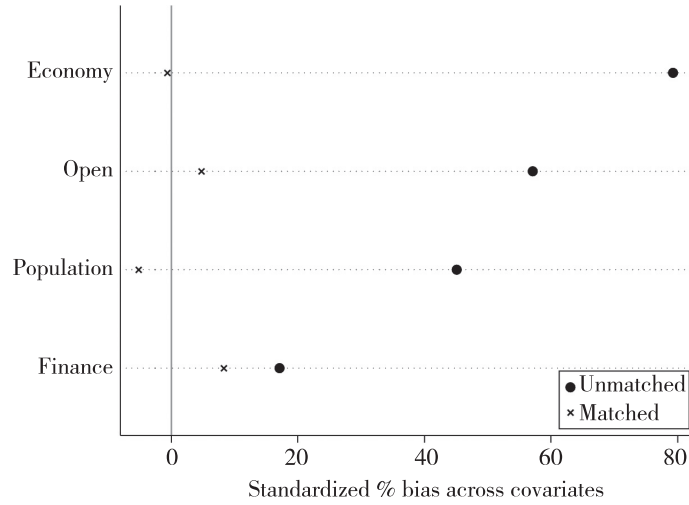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衡性检验结果

经过 PSM 处理后,研究共得到 1 238 组匹配成功的样本观测值(未匹配样本量为 62 组),接下来,将基于这些样本数据进行 PSM-DID 回归估计,以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二) PSM-DID 结果

表 2 展示了模型(1)的 PSM-DID 估计结果。Treat × Post 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净效应,即政策实施有效改善了当地政商关系,假设 1 由此得证。

表 2 PSM-DID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i>Relationship</i>			
<i>Treat × Post</i>	3.295*** (3.21)	3.390*** (3.27)	3.295*** (3.01)	3.390*** (3.12)
<i>Economy</i>		-5.611 (-1.51)		-5.611 (-1.08)
<i>Population</i>		0.477 (0.13)		0.477 (0.10)
<i>Finance</i>		-46.299 (-0.99)		-46.299 (-0.73)
<i>Open</i>		8.218* (1.87)		8.218 (1.60)
<i>Constant</i>	39.477*** (55.62)	80.650** (2.20)	39.477*** (47.95)	80.650 (1.58)
<i>CityFE</i>	Yes	Yes	Yes	Yes
<i>YearFE</i>	Yes	Yes	Yes	Yes
<i>Robust</i>	No	No	Yes	Yes
<i>N</i>	1238	1238	1238	1238
<i>R²</i>	0.345	0.349	0.345	0.34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统计值。

(三) 平行趋势检验

DID 方法的重要假设之一为平行趋势假设,也即在政策冲击发生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不满足这一基本假设,则可能严重损害 DID 方法因果识别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借鉴事件研究法的核心思路,基于以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Relationship_{i,t} = \alpha + \sum_m \beta_m Dummy_{i,m} + \sum_k \gamma_k Control_{i,t,k} + CityFE + YearFE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Dummy_{i,m}$ 表示城市(i)的政策冲击事件窗口期虚拟变量,当某一年份为城市(i)实施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前(后)第 m 年($m = -5, -4, \dots, 4, 5$), $Dummy_{i,m} = 1$, 否则 $Dummy_{i,m} = 0$ 。例如,某城市政策实施年份为 2020 年,则其在 2019 年(即政策冲击前一期)时 $Dummy_{i,-1} = 1$, 其余 $Dummy_{i,m} = 0$ 。模型(2)中回归系数 β_m 的大小反映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政策冲击事件窗口期内各期的结果变量(即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值。如果研究的样本数据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则预期 β_m 的估计值在 $m < 1$ 时不显著,而在 $m > 1$ 时显著为正。

图 3 展示了模型(2)的估计结果。其中,纵轴表示回归系数 β_m 的估计值大小,横轴表示政策冲击事件窗口期 m ,虚线区间表示回归系数 β_m 估计值的 90% 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当 $m < 0$ 时,回归系数 β_m 估计值均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而当 $m > 0$ 时,回归系数 β_m 估计值从 $m = 2$ 期开始,在 10% 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政策冲击发生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也即 PSM-DID 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在政策冲击发生一年后,处理组结果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与控制组间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差异,这意味着从公共数据开放第二年起亲清政商关系开始得到显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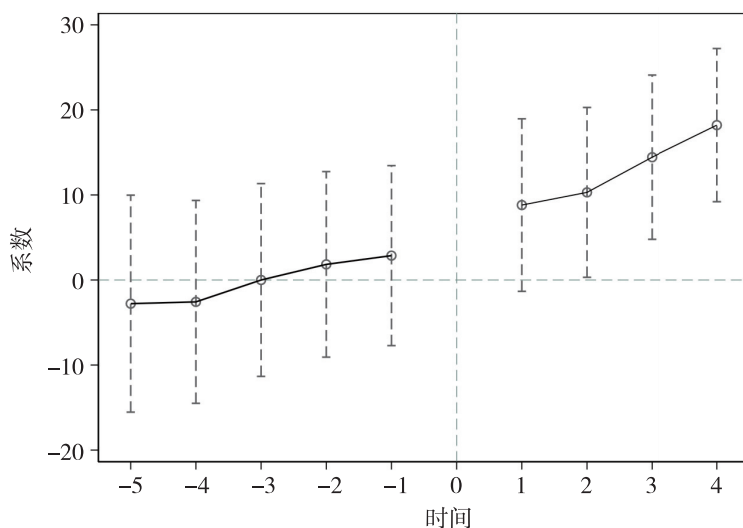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四)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 DID 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排除虚假效应或偶然性影响,研究对模型(1)进行了安慰剂检验。核心方法为随机生成虚假的“处理组”,并重新估计模型(1),重复该过程 500 次。如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不是偶然性的,那么 β 的回归结果估计值在这 500 次安慰剂检验结果

的分布中应该为小概率事件。检验结果显示, β 的回归结果估计值在500次安慰剂检验结果分布中出现的概率为0.0000,表明模型(1)的DID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五、进一步研究

公共数据开放改善了亲清政商关系,接下来将进一步实证分析其影响更倾向“亲近”还是“清白”。

(一)拓展分析:政商关系更加亲近还是更加清白

亲清政商关系的衡量分为亲近关系和清白关系两个维度。为进一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实施究竟是促使政商关系更加亲近还是更加清白,分别使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的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并重新估计模型。表3展示了区分维度的估计结果。第(1)列以政商亲近指数(Closeness)为被解释变量,Treat \times Post系数在10%水平上不显著;第(2)列以政商清白指数(Whiteness)为被解释变量,Treat \times Post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改善了政商关系的清白维度,而非亲近维度。

表3 公共数据开放对政商亲近关系和清白关系的影响 I

	(1)	(2)
	<i>Closeness</i>	<i>Whiteness</i>
<i>Treat \times Post</i>	1.033 (0.84)	5.439*** (3.84)
<i>Control Variables</i>	Yes	Yes
<i>City FE</i>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i>Robust</i>	Yes	Yes
<i>N</i>	1238	1238
<i>R²</i>	0.343	0.158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统计值。为节省篇幅和便于阅读,表格中未展示控制变量组的估计结果。

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的数据进一步将政商亲近指数分解为政府关心指数(Attention)、政府服务指数(Service)、企业负担指数(Burden),将政商清白指数分解为政府廉洁指数(Integrity)和政府透明度(Transparency),表4结果显示,Treat \times Post对前三个指数的效应均不显著;而对政府廉洁指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对政府透明度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提升政府透明度与廉洁度,改善政商清白关系。

(二)机制分析:信息共享还是价值创造

如果信息共享机制成立,则能够通过公共数据开放消除当地“信息孤岛”与“信息鸿沟”^[34],有效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降低市场制度性成本,进而改善政商清白关系。据此可以推断,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参照已有文献^[35],将每一期样本按照指数大小均等划分为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和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两组子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一体化程度低的分组中,Treat \times Post的回归系数(5.28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分组中,Treat \times Post的

回归系数(2.037)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从而支持了信息共享机制假设。

表 4 公共数据开放对政商亲近关系和清白关系的影响 II

	(1)	(2)	(3)	(4)	(5)
	<i>Closeness</i>			<i>Whiteness</i>	
	<i>Attention</i>	<i>Service</i>	<i>Burden</i>	<i>Integrity</i>	<i>Transparency</i>
<i>Treat × Post</i>	2.617	0.649	-2.433	2.699*	4.389***
	(1.16)	(0.42)	(-1.10)	(1.84)	(3.23)
<i>Control Variabl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CityFE</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arFE</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Robust</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Yes</i>
<i>N</i>	1 238	1 238	1 238	1 238	1 238
<i>R²</i>	0.167	0.344	0.203	0.252	0.31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统计值。为节省篇幅和便于阅读,表格中未展示控制变量组的估计结果。

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信息流通和要素流动^[36],因此空间结构更加集中的城市对于信息共享的需求和获得的边际效应更大。据此可以推断,如果信息共享机制成立,则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多中心化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参考已有文献^[37],将每一期样本按照指数大小均等划分为多中心化程度低和多中心化程度高两组子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多中心化程度低的分组中,*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4.681)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多中心化程度高的分组中,*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2.515)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多中心化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从而支持了信息共享机制假设。

对外开放程度越低的城市信息汇聚流通能力往往更弱,因而通常对于信息共享的需求和获得的边际效应更大。据此可以推断,如果信息共享机制成立,则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对外开放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基于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大小,将每一期样本按照其大小均等划分为对外开放程度低和对外开放程度高两组子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分组中,*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4.366)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分组中,*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2.073)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对外开放程度更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从而支持了信息共享机制假设。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全面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38]和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促进各类资源公平优化流通配置,改善全要素生产率^[39],从而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政商清白关系。而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之一便是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的公平高效配置。如果价值创造机制成立,则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较高的城市中更加显著。基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大小,将每一期样本按照其大小均等划分为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较低和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较高两组子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财政收

入占 GDP 比重较高的分组中,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较低的分组中,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较高的城市中更加显著,从而支持了价值创造机制假设。

由于投资源于储蓄转化,资源优化配置还体现在城市金融存款的优化配置上。如果价值创造机制成立,则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高的城市中更加显著。我们基于存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大小,将每一期样本按照其大小均等划分为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低和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高两组子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高的分组中,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5.402)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低的分组中,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2.249)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正面影响在存款余额占 GDP 比重较高的城市中更加显著,从而支持了价值创造机制假设。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基于 2017—2022 年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 PSM-DID 方法与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了数据开放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实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优化了亲清政商关系,该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亲近”维度,数据开放对“清白”维度的正向效应更为突出。机制检验揭示,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两大路径发挥作用:一是借助信息共享推动政府行为透明化,从而提升权力非生产性利益与其实际成本;二是通过释放数据价值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削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研究从经验层面确认了公共数据开放在赋能政府治理、重构政商互动逻辑中的关键角色,也为理解数据要素如何助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提供了学理性支撑和政策性参考。

研究证实,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信息共享与价值创造双重路径,显著提升了政商关系的清白程度,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关键抓手。基于实证分析,政策制定不应停留在是否开放的层面,而应迈向如何高质量、高效能开放的新阶段。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公共数据开放促进清白政商关系,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性工程。研究发现,相较于政商亲近关系,数据开放主要改善的是政商清白关系,即通过增强透明度和可问责性来减少权力带来的非生产性利益。其一,建议政府继续强化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中的数据服务功能,在明确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下提供更多公共数据服务功能,使公共数据开放走向服务型公共数据开放,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公共数据价值,并保证其可信流通。其二,建议推动政府数据服务平台与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的联动。比如,开设公共资源交易及政府采购专栏,实现从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的全过程可追溯,形成政府内部监督与公众监督的强大合力。

第二,聚焦信息共享与价值创造双轮驱动,推动数据开放的高质量转化。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共享和价值创造是数据开放发挥效用的核心路径。因此,在信息共享层面,致力于降低信息

模糊性,提升信息精度与效用。其一,建议政府借助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建立政企匹配推送系统。利用海量数据,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便于“政策找企业”。其二,建议政府主动利用平台进行市场风险提示,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与财务风险。在价值创造层面,建议尝试培育数据市场,激发各主体的潜能。其三,完善公共数据的收益定价分配机制,按照贡献等多重标准制定完善的收益分配体系,使得数据提供、数据运营、数据监管等参与公共数据提供全过程的主体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收益分配,以此来强化各主体参与公共数据开放的激励。

第三,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数据开放策略,尊重并呼应城市间的异质性特征。异质性分析揭示,数据开放的积极效应因城市而异。这意味着必须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其一,对于市场一体化程度低、空间结构单中心、开放水平不高的城市,政策应侧重于发挥数据的信息共享功能,通过数据开放打破信息壁垒,引入外部竞争要素,激发市场活力。其二,对于财政收入占比高、金融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则应重点挖掘其价值创造潜力,引导财政和金融资源与开放数据相结合,扶持数据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打造高能级的数据要素市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 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N]. 人民日报,2025-02-18.
- [3] 罗进辉,巫奕龙,郑丽群. 亲清政商关系能否助力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1):3-17.
- [4] JONES C I, TONETTI C.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9):2819-2858.
- [5] NAGARAJ A. The private impact of public data: Landsat satellite maps increased gold discoveries and encouraged entry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1(1):564-582.
- [6] 刘敏,朱亚鹏,肖霞,等. 公共数据开放如何提升城市韧性——基于城市政府治理和营商环境的视角[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5(5):18-39.
- [7] 李佳昌,章力丹,蔡晓燕. 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来自市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商业研究,2025(3):43-53.
- [8] 方锦程,刘颖,高昊宇,等.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管理世界,2023(9):124-142.
- [9] BERRONE P, RICART J E, CARRASCO C. The open kimono: Toward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pen data initiatives in cities[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6(1):39-70.
- [10] 陈艳利,蒋琪. 数据生产要素视角下开放公共数据与企业创新:基于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管理,2024(1):25-46.
- [11] 欧阳伊玲,王愉靖,李平,等. 数据要素与城投债定价: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J]. 世界经济,2024(2):174-203.
- [12] 王振东,裴成荣.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据资产化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9):32-44.
- [13] 蔡运坤,周京奎,袁旺平. 数据要素共享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公共数据开放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8):5-25.
- [14] 闫春,王钰涵. 亲清政商关系能否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河南师范大学

-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6-74.
- [15] 于天远,吴能全. 组织文化变革路径与政商关系[J]. 管理世界,2012(8):129-146.
- [16] 庄旭东,张翼飞. 新型政商关系的投资效率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2021(12):66-76.
- [17] 李雪,罗进辉,黄泽悦.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交易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7):98-111.
- [18] 管考磊. 亲清政商关系会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财经,2019(6):130-141.
- [19] 刘志伟,王一凡. 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整合再造[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85-96.
- [20] 彭彬,祝树金,李丹.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风险——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经济经纬,2025(4):107-119.
- [21] 侯方宇,杨瑞龙. 新型政商关系、产业政策与投资“潮涌现象”治理[J]. 中国工业经济,2018(5):62-79.
- [22] 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3):488-500.
- [23] 李剑培,时洁,顾乃华.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政府采购合同大数据的证据[J]. 南方经济,2025(2):1-25.
- [24] 张电电,谭志乾,牟姿建. 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2021年1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7-48.
- [25] 王水莲,钱鹏浩,王静. 场景赋能驱动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演化——“柠檬豆”案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6):11-20.
- [26] ZHOU M L, WANG Y, HUANG X H, et al. Can open government data policy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in China[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23(5): 2593-2603.
- [27] 袁方成,魏玉欣. 政务服务极简化的风险及其演化逻辑[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33-45.
- [28] MOORE M.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29] 门理想,王丛虎,门钰璐.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政府数据开放——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 情报杂志,2021(8):104-110.
- [30] JANSSEN M, CHARALABIDIS Y, ZUIDERWIJK A. Benefits, adoption barriers and myths of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J].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2012(4):258-268.
- [31] 夏义堃. 开放数据开发利用的产业特征与价值链分析[J]. 电子政务,2016(10):41-50.
- [32] 门理想,赵芷墨,李亚兰,等.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共价值共创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2):91-97.
- [33]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5):1637-1667.
- [34] 王愉靖,李平,方锦程,等. 公共数据开放对非正规金融风险的治理效应——基于中国法律裁判文书的微观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5):71-92.
- [35] 盛斌,毛其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J]. 世界经济,2011(11):44-66.
- [36] 卢婉婷,刘艳芳,安睿,等. 多维流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网络结构分析[J]. 现代城市研究,2025(7):112-118.

- [37] 乔艺波,罗震东.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 27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J].城市规划,2024(12):17-26.
- [38] 张洪辉,林森城.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J].证券市场导报,2025(3):68-79.
- [39] 袁天荣,张佩雯,刘瑞.数据要素共享与新质生产力——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J].经济与管理,2025(2):1-11.

How Open Public Data Influences the Close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Launch of Urban Data Open Platforms

WANG Conghu, WANG C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China”, examining how open public data influences a close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carri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China’s municipalities, sub-provincial cit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7 to 2022, this study employs the launch of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a PSM-DID framework with an individual-time fixed effects model, our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ata open platforms on fostering close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open public dat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lose-yet-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t local level.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parallel trend and placebo tests. Moreover, compared with fostering closer government-business ti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pen public data on promoting a clean and transparent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open public data improves the new type of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through two primary channels. On the one hand, it enhance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ransparency, which in turn constrains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it creates economic value and optimizes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by reducing space for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which ultimately improves the close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open public dat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mpower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reshaping the mode of government-business interaction. It provides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how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can better integrate a “proactive government” with an “effective market”.

Key words: public data, data open platform, close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责任编辑:牟 怡

引用格式:韩瑞波.复合型断层: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困局及其生成逻辑[J].探索,2026(1):55-64.

复合型断层: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困局及其生成逻辑

韩瑞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数字治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在实践中,数字技术嵌入城乡融合发展场景后并未充分释放治理效能,反而因技术与组织的适配失衡形成治理梗阻。突破“技术决定论”与“组织决定论”在研究视野方面的局限性,全面兼顾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提出“复合型断层”这一核心概念,用以刻画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因技术适配偏差、组织协同失效与主体能力失衡而导致应用断层、协同断层与能力断层并存的结构状态。为系统解析该断层的生成机理,构建了“技术适配—组织协同—主体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选取鄂中J县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普适性与城乡差异性的张力、技术统合性与组织分割性的张力、技术专业性与主体能力不均衡性的张力构成复合型断层产生的核心诱因。据此,提出弥合断层的可能路径:在技术维度构建城乡适配的场景化体系,在组织维度重塑跨域协同机制,在主体维度培育数字能力生态。

关键词:县域治理;城乡融合;数字治理;技术与组织互构;复合型断层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55-10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2]},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谋划。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浪潮正深刻重塑着社会治理格局与范式。《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2]。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数字治理的理念、技术与模式深度嵌入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特定场域,以数字化势能破解城乡融合的深层梗阻,从而激活社会内生发展动力、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价值性与现实紧迫性的前沿议题。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数字治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刻重塑城乡融合发展图景。各地政府纷纷投身于数字平台建设、数据资源整合与业务流程再造,以期借助技术之力破解城乡分治的长期积弊。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种子培育项目“乡村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生成机理与破解路径研究”(CCNU25ZZ267),项目负责人:韩瑞波。

作者简介:韩瑞波,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而,数字技术在城乡融合实践中的嵌入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其在部分地区的确发挥了实质性的赋能功效,但在有些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数字悬浮”^[3]或“数字形式主义”^[4]问题。为解读这一现象,学界的探讨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变量展开:一是作为驱动力的“技术”本身,指向数字技术的内在属性与作用逻辑;二是作为承载体的“组织”,指向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和统筹能力。由此,衍生出了“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两种解释路径。

“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先进技术会自然推动社会形态向技术逻辑预设的方向演进。在城乡融合研究中,这一理论常用于解释数字技术如何借助自身的功能优势来重塑城乡关系。例如,数字技术可以通过5G、物联网等硬件建设,打造政务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政策执行的全周期精准治理,进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5]。数字技术渗透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数字生产力、流通力、分配力、消费力等不同形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可为城乡融合提供新动能^[6]。这一解释路径尽管捕捉到了技术赋能对于城乡融合的工具性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适配的组织机制与应用边界问题。因此,在解读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困境时,“技术决定论”更倾向于将其归结为技术滞后或技术脱节,而难以触及更深层次的组织性与制度性因素。

“组织决定论”强调技术的效能并非由其功能属性单方面决定,而是深度关联组织结构、权责配置与执行能力,认为技术工具若脱离组织载体,其赋能作用将流于形式。一方面,数字化平台尽管具备先进的数据整合能力,但其政策执行力的提升本质上依赖于党政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与条块联动的协同治理结构;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政治统合能力决定了技术资源的配置效率。城乡融合需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等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来调动资源^[7],而数字技术仅可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辅助手段。此外,科层组织对城乡融合相关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是技术落地的前提。若数字治理与现有户籍或土地政策相冲突,技术反而可能加剧城乡二元分割^[8]。这一解释路径为理解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提供了关键补充,但由于片面强调科层组织对于技术工具的单向约束,往往将数字治理的困境成因定位于条块分割、体制僵化、执行乏力等结构性因素。

鉴于上述两种解释路径的局限,在解读城乡融合场景下的数字治理时,应突破“技术决定论”与“组织决定论”的二元对立,全面兼顾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在充分考量技术适配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到数字治理的组织载体、运行机制与行动能力。因此,本研究拟从“技术—组织”互构的理论视域出发,提出“复合型断层”的概念。此概念用以描述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数字治理困局,具体指数字技术嵌入城乡治理体系时,因技术未能适配城乡差异化需求、组织未能形成跨域协同机制、主体数字能力存在显著失衡,导致数字治理效能衰减、组织运行成本增加、城乡融合进程受阻的结构性状态。这种数字治理断层如何表现、何以生成,又怎样弥合,正是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解析维度

回溯学术史,技术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的核心议题^[9]。简·芳汀关于“技术执行”的经典论述试图阐明技术效能的兑现是技术方案与既有的组织规则、权力结构及制度环境持续互动的社会性结果。这一洞见从根本上挑战了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的

预设,确立了互构理论的核心命题:技术潜力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组织行动者对技术进行解释、设计和执行的方式^[10]¹⁰⁴,而组织本身亦在此过程中被技术所重构。

(一)“技术—组织”互构理论的内涵阐释

互构理论建构起一种双向互动的解释进路。一是“组织的技术化”过程,即组织为适应技术应用而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其内部结构、业务流程与权责关系,技术由此成为驱动组织变革的触媒。信息技术推动了组织结构由传统科层制向无边界、网络化形态的转型,通过削减中间层级、简化决策流程,增强了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与执行效率。二是“技术的组织化”过程,意指组织依据其目标设定与治理需求,对技术的应用场景与功能模块进行选择性地采纳与适应性改造,主动参与技术的定义、设计与演进,使技术工具服务于特定的组织逻辑与权力结构。此外,组织内部的利益碰撞、资源分配冲突等权力因素也会影响技术的演化路径,从而限制其整体效能的有效发挥。正是凭借这种动态的、情境化的互构性关联,新的治理形态与制度安排得以生成。

上述互动过程通常难以在理想环境中展开,其演进路径、速率乃至最终形态均深受其所嵌入的复杂现实情境的制约。互构论的核心理论精髓在于将“具体情境”置于分析范式的中心位置,坚决反对任何脱离语境的论断。换言之,脱离特定的制度环境、历史脉络与实践场域,便无法真正理解技术与组织互动的内在逻辑。该理论不仅关注技术的功能属性或组织的静态特征,更着重反思并揭示技术对组织行为与个体行动所产生的规范性要求及其作用边界,即技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规定了何为可能、何为合理的行为模式;同时,也深刻指出组织结构与行动主体具有一种“反驯化”的力量来挑战技术应用的方式与效能,这为分析数字时代城乡融合等领域的复杂治理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透镜。

(二)数字治理断层的解析维度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情境中,数字治理的本质是地方与基层政府依托前沿数字技术,系统性地整合城乡资源,重构跨域治理流程,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高效流动,旨在最终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产业发展的优势互补与深度协同,以及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依据“技术与组织互构”的理论视角,数字治理有效性取决于数字技术与既有组织结构、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结合数字治理断层的内涵界定,对城乡融合进程中的数字治理效能进行解析,至少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性的分析维度。

第一,技术适配维度。城乡融合场域内含的异质性与非均衡性特征,决定了其数字治理实践必须正视技术方案与特定社会基础结构的适配性。数字治理平台与工具的应用效能高低有赖于技术逻辑与城乡迥异的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形态、社会结构及居民需求特征之间能否实现精准耦合与有机互嵌^[11]。数智技术驱动城乡要素流动的潜能,深受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成效的制约。若乡村地区的物理基础设施未能实现有效的数字化改造,则难以与城市高端要素实现无缝对接和对等交互,从而无法对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标准^[12]。因此,面向农村地区的服务应用设计,需充分考虑低带宽环境下的可用性、非专业用户的操作习惯以及本土文化语境的可接受性。如果技术方案过于复杂或过度超前于当地现实承受能力与认知水平,非但无法赋能,反而会制造新的“应用断层”,加剧数字排斥,使部分群体在城乡融合进程中深陷边缘化风险。

第二,组织协同维度。城乡融合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技术赋能重构跨

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体系。这一进程触及政府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与权责关系的系统性变革,要求打破长期存在的行政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顺畅共享与业务流程的有机整合。当前,城乡融合正面临显著的组织协同困境。各部门权责边界模糊、政策目标存在交叉或冲突,难以形成支持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政策合力^[13]。数字治理项目往往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在缺乏高位统筹与强力协调的情形下,各部门基于自身权能和利益考量所推进的“数字化”,可能形成新的数据孤岛与数据烟囱,无法支撑城乡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治理流程的一体化重构。这种技术与组织之间的脱嵌状态,可能因部分领域的“伪数字化”而加剧不同系统间的摩擦与内耗,形成更深层次的“协同断层”。

第三,主体能力维度。在城乡融合的数字化治理进程中,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市场主体以及城乡居民等不同群体的数字素养与参与能力直接制约着数字治理的普惠性与精细化水平。然而,当前城乡融合中的数字技能和专业人才缺失已成为突出短板,尤其体现在村民数字素养的不足上^[14]。受客观数字鸿沟与主观数字化认知的影响,在技术维度和心态维度产生不同的人群归属。当主体能力存在突出断层时,数字治理则可能被少数精英主导,导致主体缺位下的数字鸿沟拉大^[15]和数字红利的非均衡分配,以及治理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价值张力。因此,强化数字素养培育,推动数字治理从技术赋权转向主体平权,是破解主体能力困境的关键^[16]。

前述分析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数字治理效能梗阻,可被概念化为一种复合型的“治理断层”现象,具体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技术层面的“应用断层”、组织层面的“协同断层”以及主体层面的“能力断层”。为深入剖析这三种断层形态在实践场域中的交织逻辑、具体表征及其生成机制,本研究拟采取质性个案研究路径,将分析视野聚焦于鄂中J县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察对象。案例的选择基于其代表性考量:J县作为我国中部地区一个正处于城乡融合探索阶段的县级单元,集中体现了大多数普通县域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挑战,因而为我们观察“复合型断层”的真实样态提供了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样本。本研究基于扎实的经验材料,这些材料源于研究团队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1月对J县开展的数次、累计近三个月的驻点式田野调查。

三、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复合型断层的实践表征

鄂中J县作为中部地区典型农业县,其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实践呈现出探索性与过渡性特征。整体而言,J县数字治理正处于由硬件设施初步覆盖向系统化效能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初步完成县级大数据平台和部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覆盖县乡层级,并在智慧农业、电商物流等领域涌现出个别成功案例。然而,治理效能未随技术投入同步实现全域提升,城乡数字鸿沟依然明显。

(一)技术应用断层:城乡需求异质下的技术异化

技术应用断层的本质是技术供给的逻辑与城乡融合场域中复杂多元的现实需求发生结构性脱嵌,导致数字技术辅助性、工具性的本质发生异化,在实践中凌驾于实质治理目标之上,陷入一种“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内卷困境。这一断层深植于基础设施配置与应用场景设计的系统性失衡,使得技术应用不仅未能有效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反而可能在治理过程中加剧资源错配与治理内耗,进而酿成有数字化形式却无治理实效的“数字悬浮”局面。

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城乡非均衡配置,构成了技术适配的物理性瓶颈。J县于2022年启动“智慧J县”项目,旨在通过县级大数据中心实现全域数据归集与联动。然而,截至2024年底,县城区域的5G基站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2个,而乡村地区均值仅为0.8个,且存在明显的覆盖盲区。固定宽带接入情况同样严峻,县城家庭千兆光网接入率已达92%,而乡村地区这一比例仅为37%。这种基础设施的“硬差距”与县域财政投入的城乡差异直接相关。据J县财政局档案显示,2023—2024年度县域数字新基建投入中,投向县城及产业园区的资金占比高达68%,而用于乡村地区,特别是用于补齐偏远村庄网络短板的资金则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技术应用场景与乡村实际生产生活逻辑存在偏差。一个典型例证是县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的“智慧农业云平台”。该平台集成了高精度气象监测、病虫害AI识别、土壤墒情分析等功能,但其运行依赖高速、低延迟的网络环境以进行实时高清数据传输。然而,在J县西部山区多个乡镇,移动网络信号仍以4G为主且不稳定。另外,该平台的操作界面复杂,参数设置专业化程度高,超出了大部分普通农户的知识范畴。平台设计者与用户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与需求错位。技术方案未能充分观照地方性知识和现实约束条件,结果则是先进的数字工具从预期的赋能工具异化为形同虚设的“数字摆设”,甚至因增加了不必要的操作复杂度而引发基层的抵触情绪。

(二) 组织协同断层: 条块体制下的治理碎片化

组织协同断层实质上是科层制固有的条块矛盾在数字治理场景下的显性化。数字技术以其互联互通、数据驱动的内在特性,本应为打破部门壁垒、重塑治理流程提供强大动能,推动实现跨领域、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然而,其运作效果往往差强人意。现实经验表明,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数字治理因平台分散建设与标准不一而加剧了科层体制内部的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形塑出一种数字赋能与体制惯性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

在横向协同层面,部门本位主义与平台分散建设引致系统壁垒。J县目前共有12个涉及城乡治理的主要数字平台,分别由发展与改革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等不同职能部门主导开发和管理。这些平台在建设初期缺乏顶层的统一规划,导致数据格式、接口协议、用户认证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县自然资源局的“国土空间规划平台”与县住建局的“城乡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共存,前者侧重于空间规划和用地审批,后者聚焦于项目建设和工程管理,二者在业务逻辑上本可以紧密衔接,但因数据标准不一,项目信息无法自动同步。这种数据割据状态使得跨部门的业务协同难以实现,人口、土地、产业、环境等要素信息无法融合利用,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决策和跨域协同治理更是无从谈起。

在纵向协同层面,数字技术强化了上级政府的督查考核能力,以此实现对基层政策执行与绩效结果的实时化与全程化监控,但并未相应下放相关资源与权限。J县通过建立数字化的“重点工作督查平台”,依托数据自动抓取、流程节点留痕和量化排名算法,将以往相对模糊的、结果导向的督查转变为高度透明的、过程导向的精准控制。由此打造的“数字控权”模式在提升政令传达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基层的权责不等。县级部门凭借数字平台向基层下派的任务有增无减,且多数任务要求高、时限紧。在这种境况下,基层陷入“责任无限下沉而权力资源上收”的结构性难题。部分乡镇干部将大量精力耗费于应付系统填报和留痕迎检,自然也就挤压了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的时间与空间。

(三) 主体能力断层:数字素养差距下的赋能失效

主体能力断层的深层症结在于数字治理体系在实际运行中演变为技术精英化的运作,即以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为绝对主导,将技术可行性与效率最优化作为治理决策的首要准则,过度依赖算法模型、数据指标等技术工具构建治理框架,却忽视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能力差异性,从而在价值层面与城乡融合发展所追求的普惠性、包容性价值目标发生背离。此种断层由数字素养的群体性差异所致,可被视为一种阻碍社会广泛参与的综合性排斥机制。

其一,治理主体内部的数字能力分化,制约了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与创新。针对J县基层干部(涵盖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一线办事员)的问卷调查显示,能熟练运用基础办公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和报表生成的占比近80%,但能进一步运用简单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初步决策分析的干部比例骤降至约20%。而能够理解并尝试运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或操作专业业务系统进行深度分析的干部,比例不足4%。这种数字能力的倒金字塔式分布,使得数字治理的应用效度在基层大打折扣。基层干部的数字技能如果仅停留在操作层面,而无法进阶至分析与决策层面,数字治理便难以从工具性应用升华为赋能性变革。

其二,数字素养鸿沟依然凸显,导致城乡居民的参与受阻。数据显示,在政务APP操作这项关键数字能力上,城镇居民的掌握率接近农村居民的两倍。此外,农村居民在信息甄别、网络安全防护和虚假信息辨别等方面的能力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这种素养差距在具体的数字治理场景中转化为参与不平等。以J县统一推广的“村民议事”数字平台为例,在经济基础较好、距离城区较近的城郊村,由于网络条件好、村民平均年龄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平台使用率能达到65%以上。然而,在县境西部的偏远山区乡村,该平台的使用率长期徘徊在8%以下。可见,由于缺乏对特定用户群体使用习惯和认知能力的充分考虑,技术设计上的“一刀切”直接将部分群体排除在数字参与的门槛之外,甚至导致数字社会的情感极化^[17]。

四、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复合型断层的生成逻辑

数字技术具有鲜明的治理模式重构功能,其普适性、统合性与专业性的属性特征,要求打破传统城乡治理中二元对立与条块分割的运行机制,追求治理情境的有机统一、治理流程的高效联动与治理主体的能力进阶。然而,技术普适性与城乡差异性的张力、技术统合性与组织分割性的张力以及技术专业性与主体能力不均衡性的张力,共同形塑了相对固化的治理断层格局(见图1)。

(一) 底层逻辑:技术普适性与城乡差异性的张力

J县所呈现的数字治理技术应用断层,是技治主义治理范式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底层矛盾的直观展现。技术理性的普适性诉求与城乡社会的基底性、异质性现实之间存在冲突,由此带来的技术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18]。基层社会恰恰是充斥着差异性的生活世界,其运行逻辑深深嵌入特定的历史传统、熟人网络、非正式规则和地方性知识之中。它们是无法被完全标准化和量化的。当追求同一性的技术方案意欲强行嵌入并主导这个差异性的生活世界时,必然会产生剧烈的摩擦与排异反应。具体到城乡融合的治理情境中,技术普适性与城乡差异性的张力是基础设施配置的城镇中心主义与应用场景设计中的技治主义价值迷思共同驱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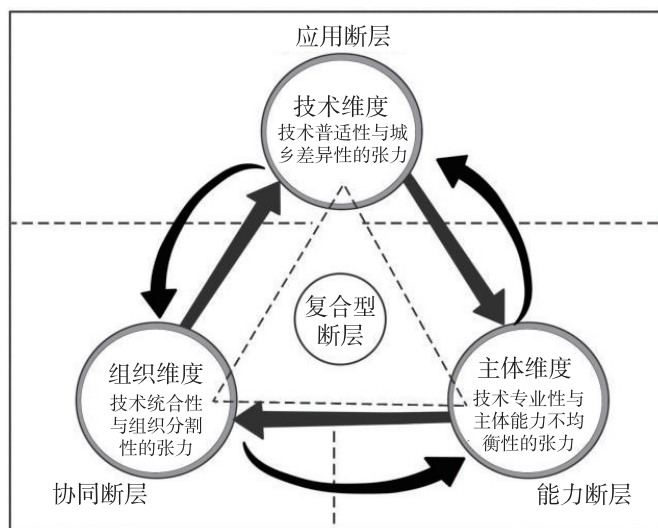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治理复合型断层的生成逻辑框架

在基础设施配置方面,数字治理的资源投入表现出城镇中心主义导向,是技治主义追求规模效益和标准化管理逻辑的必然结果。决策者习惯于将在城市试验成功的标准化技术方案直接移植到乡村,忽视了乡村地理空间特性所导致的超高边际成本,造成网络硬件覆盖和运行质量存在显著城乡梯度差。此类“重硬件、轻适配”的投入模式使得技术基础设施在乡村地区成为一种悬浮式存在,无法真正内嵌至乡村社会的深层肌理,客观上体现出技治主义在面对复杂治理情境的“脆弱性”^[19]。在应用场景设计上,将数字技术视为首要治理工具的实践理路,其蕴含的效率优先逻辑往往会遮蔽基层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性^[20]。在J县的实践中,程式化、标准化的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错综复杂的生产生活逻辑出现了一定的适配性冲突。注重技术应用而轻视治理实践的技治主义思维不可避免地沦为削足适履的工具性嫁接。总之,技术越是追求形式上的精准,就越有可能与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南辕北辙,进而陷入治理内卷化的谬误。

(二) 结构逻辑: 技术统合性与组织分割性的张力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数字治理的深入推进,在技术层面追求数据资源的无缝流动与平台系统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技术统合性的功能优势,通过“入口”和“界面”控制实现对复杂社会需求的抽象与简化,并借助数据与算法重塑条块部门间的协作模式。然而,科层制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组织壁垒,却使数据常被切块或拆分而固化在条块内部,形成难以打通的“信息孤岛”。这种技术与组织互构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悖论性图景:数字技术具备的统合功能与科层体制根深蒂固的分割惯性,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可能陷入相互锁定、甚至彼此强化的负面循环。进一步说,旨在提升数字治理整体效能的技术统合实践,在未能有效触及深层制度结构的情况下,其工具理性可能被原有的条块分割的组织逻辑所吸纳和利用^[21]。

组织协同断层的根源在于科层组织架构、权责配置模式与绩效考核激励等制度安排,无法支撑技术统合所要求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条条”部门基于专业分工形成的垂直管理系统,与“块块”政府以属地管理为核心的横向综合协调机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数据管理交叉与权责不清问题。数据的聚合与流动难以遵循城乡融合治理任务的总体性需求,反而更易被各部门的业务边界所切割和隔离。即便在党政组织强有力的高位推动下,整合原先分散的“各建一套、各管一摊”的平台体系仍需克服巨大的组织惯性^[22]。更为深刻的矛盾体现在纵向政府间职责同

构与横向部门间权责模糊的叠加效应上。在纵向上,尽管存在以数字技术实现“精准定责”^[23]的理论可能,但上下级政府间围绕数据权限的博弈以及条块在数字治理创新绩效生产过程中的竞争,加剧了基层的治理负荷,压缩了其灵活处置空间。在横向上,数据采集、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归属不清,极大削弱了已经构筑的组织灵活性。这意味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建立与数智时代相匹配的权责利相统一的协同机制,即便强化技术平台的建设力度,也难以扭转治理碎片化的困局。

(三) 能动逻辑:技术专业性与主体能力不均衡性的张力

主体能力断层清晰表明,高度专业化、追求统一规范的技术逻辑,与城乡融合场域中差异显著、能力分化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张力。数字治理的技术专业性,建立在一整套标准化数据格式、程序化操作流程及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架构基础之上。其运行逻辑强调治理过程的去情境化、可计算性与可预测性,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的效率最大化。然而,城乡融合所面对的治理场域具有极强的异质性、动态性与地方性特征。当标准化的数字技术系统尝试嵌入这一异质性格局时,其内在的刚性特质与在地化实践之间便出现了适配性冲突。一方面,技术系统要求基层事务能够被“转译”成其可识别的数据语言,这就可能忽略许多难以量化的本土知识和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技术应用的刚性可能无法灵活应对基层治理中常见的例外情况和模糊地带,导致数字治理所追求的精准化目标在实践中异化为机械化操作。

与技术专业性相对的是城乡治理主体能力的显著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政府人员在数字素养、技术操作能力上存在差距,为政策传导与执行中的信息耗散与理解偏差预留了空间。其二,城乡之间、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群体之间,在数字设备接入、数字技能掌握、数字信息辨识等方面存在落差。数字治理在理论上尽管具有降低参与门槛、促进民主化的潜力,但其技术性实际上构筑了新的能力壁垒。对于数字素养较低的基层干部和乡村居民而言,繁琐的操作界面、专业化的术语体系以及快速迭代的平台功能都可能使其在数字治理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上面临一定的障碍,既表现为硬件接入的“初级数字鸿沟”,也反映在数字技能、社会支持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次级数字鸿沟”^[24]。数字权利的实现需以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为基础。若数字治理的建设只关注技术平台的有无和功能的强弱,而忽视使用这些技术的“人”的能力建设、能动性激活与普惠性关怀,那么数字技术终将无法成为弥合城乡差距与促进社会平等的媒介。

五、结语

本文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理论视角,通过对鄂中J县的案例观察,深入剖析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数字治理所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困境——“复合型断层”。该断层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三重样态:以城乡需求异质下的技术异化为表征的技术应用断层、以条块体制下的治理碎片化为表征的组织协同断层、以数字素养差距下的赋能失效为表征的主体能力断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技术普适性与城乡差异性、技术统合性与组织分割性、技术专业性与主体能力不均衡性这三组关系的内在张力,分别解读了复合型断层得以生成的底层逻辑、结构逻辑与能动逻辑。

本研究试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意义上实现对既有研究的增量性贡献。理论层面,有效拓展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特定情境中的适用边界,凸显技术适配、组织协同与主体能力三者之间的非线性交织作用与结构性张力,为观察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提

供了更具动态性与整体性的理论支撑。此外,这种复合型断层并非J县所独有,而是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深水区的诸多普通县域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因此,超越对个案的描述与归因,针对这一问题靶向,探索系统性的弥合路径与解决方案就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在技术维度上,增强技术应用的适配性,使技术工具更好地服务于城乡融合的具体场景与多元需求。构建分层分类的技术适配标准体系,针对不同乡镇、不同部门的数字化基础、业务复杂度和人员能力,设定基础应用、整合协同、智能创新等不同层级的技术配置标准。其次,在组织维度上,着力打破条块壁垒,构建基于数据驱动和任务导向的协同治理机制。可在县级层面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实体化运作的城乡融合与数字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常设性议事协调机构,赋予其对全县数据资源、数字项目、相关财政资金的统筹调度权和考核评议权。最后,在主体维度上,积极培育数字能力生态,聚焦实质性的数字包容,确保各类治理主体能够有效接入、理解和运用数字治理平台,共享数字红利。还应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基于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开发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相关应用。总之,这些弥合路径的最终目标应定位于构建一个技术适用、组织灵活、主体参与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N].人民日报,2022-06-24.
- [3] 范炜烽,白云腾.何以破解“数字悬浮”:基层数字治理的执行异化问题分析[J].电子政务,2023(10):59-70.
- [4] 董石桃,董秀芳.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6):66-73.
- [5] 余练,袁明宝.数字治理提升县域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机制及成效[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101-111.
- [6] 谢璐,韩文龙.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2(11):96-105.
- [7] 贾玉娇,张译文.社会政策何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个“地域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25(5):157-178.
- [8] 孙海军,张长立.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J].江淮论坛,2023(3):153-158.
- [9] 张燕,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9(2):200-215.
- [10] 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1] 丁波.数字情境: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与技术适配[J].社会科学研究,2025(5):14-22.
- [12] 晏晓娟.城乡融合发展的数智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J].江苏社会科学,2025(4):142-149.
- [13] 朱鹏华,李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现实约束与推进方略[J].改革,2025(7):125-140.
- [14] 文丰安,刘昊东.乡村数字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65-74.
- [15] 胡卫卫,杨文霞.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基层伪创新行为的生成与矫正[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31.
- [16] 周济南,胡梦田.数字治理从“赋权”到“平权”:数字素养培育的生成机理与实现方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5(7):80-95.
- [17] 宣朝庆,王雪纯.数字社会治理中的“情感—秩序”框架建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63-71.
- [18] 陈寒醒,张亮.技术与解放: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蠡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20-27.
- [19] 杨嵘均.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J].探索,2022(1):125-135.

- [20] 陈亮. 数智社会基层“技治主义”的迷思及其矫正[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5(6): 23-32.
- [21] 宋纪祥, 汪超. 技术统合: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数智化赋能之道[J]. 社会科学研究, 2025(4): 101-109.
- [22] 方雷, 曹冬松. 统合型技术治理: 数字平台驱动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实践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5): 37-50.
- [23] 黄飏. “精准定责”: 数字治理语境下纵向政府间关系的新可能[J]. 政治学研究, 2024(3): 76-93.
- [24] 沈费伟, 胡紫依. 建构数字包容体系: 实现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策略选择[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1): 115-123.

Composite Fault: The Dilemma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Its Formation Logic i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N Ruibo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Digi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embeddedn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not fully unleashed i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stead, it has created governance obstacles due to the mismatch betwee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ism”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it proposes the core concept of “composite fault” to describe the structural state of application fault, coordination fault and capability fault co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ue to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deviation, organizational synergy failure and imbalance of subject capabilit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is fault,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subject capability” was constructed, and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county J, central Hubei provi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echnology and urban-r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ragment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specialization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capability constitute the core causes of composite fault. Based on this, possible pathways for bridging the fault are proposed. We should build a scenario-based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hape the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a digital capability ecosystem.

Key words: county go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composite fault

责任编辑: 牟 怡

引用格式:丑则静.“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与实践路径[J].探索,2026(1):65-76.

“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与实践路径

丑则静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构建新安全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做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的基本思路与路径,其聚焦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十五五”时期作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内外安全形势,对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以整体性理念健全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以重点性突破思维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以主动性作为增强统筹维护国家安全本领与塑造有利外部安全环境的能力。不断完善的新安全格局将在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与加强海外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国家安全基础。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新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65-1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赋予了“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工作鲜明的承前启后的特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将“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建议》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并提出“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1]。“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工作成果进行系统巩固,又要不断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从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与加强海外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入手,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国家安全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以来的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安全保障。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国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路径优化研究”(23LLZZB087),项目负责人:丑则静

作者简介:丑则静,女,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并提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2]。这是在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首次出现“新安全格局”的表述,取代了之前“大安全格局”的一贯表述。此后,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被赋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开放和安全协同共进等更明确的实践要求与目标。本文系统考察“十五五”时期中国内外安全形势所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围绕既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与主要实践路径,为进一步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面临的主要形势

对形势的准确研判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新安全格局的加快构建同样离不开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的安全新形势的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中国内外安全形势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国正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面临各方面安全风险隐患不断累积、集中显露的现实压力,以及内外联动、“双期”叠加影响下的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演化态势。

(一) 错综复杂国际安全形势下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缘政治动荡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深陷逆流,“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面对的外源性安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其一,在安全领域,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积聚,和平赤字不断加深。一是全球军事冲突数量、烈度显著上升。深刻改变欧洲和中东地缘战略格局的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只是全球军事冲突数量、烈度不断上升的缩影。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规模的、倾尽全力的阵营化军事对抗,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冲突表现为有限规模,但频发、易发而不易止,波及人口、国际行为体规模、数量不断上升等特性显著,而这种“永久化”的冲突趋势正成为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3]。二是军备竞赛与阵营化对抗风险上升。当前,全球正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快速度的军事扩张。在俄乌战火之下,欧洲国家大幅提升国防预算,截至2024年6月,32个北约成员国中已有23个国家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及以上^[4]。为满足特朗普二度执政对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的强烈诉求,2025年北约海牙峰会通过联合宣言承诺在未来10年内将国防支出门槛从GDP的2%提高到5%^[5]。而在亚太地区,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也是在这个所谓的地区战略的大国竞争战略怂恿鼓动下^[6],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比照欧洲国家做法,将国防预算占GDP的比例提升至2%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原本占据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国家唯恐失去优势地位,明显加快大国竞争化战略调整,在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的世界中不断挑唆与制造大国博弈对抗,频繁冲撞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加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正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部环境中的突出威胁和风险因素。可以说,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既承受全球性、地区性的共同安全风险,也面临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特殊安全挑战。

其二,在发展领域,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与政策风险叠加。世界经济在百年变局之下受多重因素轮番拖累,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明显弱化,能源资源等供给稳定性下降。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部分国家罔顾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强推“脱钩断链”“筑墙设垒”,以非经济理由对他国滥施关税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屡屡发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再次执政的特朗普以更加武断、肆意的方式实施关税战,展现出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7]。特朗普主张的关税战能否实现所谓的纠正美国贸易失衡、促进制造业回流、打击非法移民与加强芬太尼治理等目标存疑,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非歧视的多边经贸规则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但这也赋予中国现代化进程时空高度压缩的鲜明特征^[8]。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外部冲击和新增威胁不可避免,如遭受跨境传播的自然气候灾害、传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9],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也面临诸多外部挑战。

除此之外,以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且危害不断增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复杂难解,全球风险社会的特征日趋明显。西方发达国家曾长期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力量,但伴随国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进一步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更专注国内事务,在为全球性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上的能力、意愿持续下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下的治理赤字问题进一步凸显。比如,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2月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彰显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内顾化”色彩浓厚的对外政策议程,反复阐述让美国利益最大化,停止对与所谓美国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世界事务的无效分担或投入,从而试图使美国在不介入世界事务、不承担国际负担的情况下最大化保持全球影响力。

不确定性加剧、不利影响加深仍然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已具备诸多有利因素。“十五五”时期复杂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机遇。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围堵遏制、极限施压、威胁讹诈等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通过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十五五”时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融合、外部安全风险复杂多元,中国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积极携手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更好把解决安全难题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不断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对于中国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意义重大。

(二) 艰巨繁重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中的风险与韧性

“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除国际形势演变影响国内发展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外,中国自身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各类矛盾问题与安全风险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对“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新形势的分析研判越准确,在新安全格局下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机制政策设计与实践应对就越有针对性。

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出

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已成为中国在加速高质量发展中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重要底气。但也必须看到,“十五五”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关键阶段,在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以及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的同时,各种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问题交织,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不容忽视。从国内国际双循环上看,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尚存在卡点堵点。从增量和存量关系上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人口形势看,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中国人口转向减量发展阶段,老龄化程度加深,少子化、人口区域增减分化等趋势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

与此同时,随着“十五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持续进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更多利益关系发生深度调整。在此过程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重大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恶性犯罪事件等对社会安全稳定的影响,即保安全、促稳定的压力不断增大。另外,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在享受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滥用、恶用问题^[10],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强代替潜力^[11],以及人工智能改变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等问题,这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社稷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十五五”时期,中国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且受错综复杂的外部安全形势传导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触点多、燃点快、传导快,各类风险跨界性、关联性、穿透性显著增强,对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2]。在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过程中,通过系统整合与多域联动及时阻断了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大大降低国家安全领域“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问题的发生^[13]。与此同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既力求整体推进,维护好国家利益,对各领域安全风险进行防范化解,也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域,突出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的新安全格局构建需要在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的同时,也要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不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

二、“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

“十五五”时期,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同时中国发展进程中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系统思维与大安全理念,不仅要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而且要通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以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高公

共安全治理水平与加强海外安全保障作为核心议题,为进一步保障新发展格局、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 坚定捍卫政治安全

“从最广泛的层面看,所有领域的安全样样是政治安全,样样离不开政治安全。”^[14]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着力构建集政治安全等多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十五五”时期的国家安全工作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政治安全的首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是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其他领域安全,十分强调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最终是在政治安全得到维护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保障。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国可能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

当前,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实施分化战略和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图谋从未改变,且针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风险、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恶意炒作、煽动力度不断加大。数智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深度融合,不断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与蓄意制造诋毁党和国家的网络舆论^[15],以及算法操控、人工智能生成信息对社会认知的干预干扰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安全挑战。“十五五”时期,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内部与外部影响联动、现实与虚拟威胁共存的复杂局面。因此,“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从坚决维护好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出发,将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在加强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的基础上,对外需要防范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对内要打好风险防控主动仗,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强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构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坚强人民防线。

(二) 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一个国家要面对、处理的问题众多,但归结起来就是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鉴于发展和安全因循相对独立的政策框架,又不得不面临国家有限资源的约束,在实践中同时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治理目标绝非易事^[16]。新时代以来,随着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思考日趋成熟完善,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思想。站在战略全局高度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统筹兼顾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强调发展和安全在地位上的同等重要、在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17]。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的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中国是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之中、在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下谋求自身发展。因此,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夯实安全发展基础、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已成为“十五五”时期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针对“十五五”时期夯实安全发展基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繁重任务,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

应坚持系统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着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有序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防范应对能源资源安全风险为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现代化跨越的关键发展阶段,战略性矿产资源支撑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国情没有改变^[18]。但当今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能源和资源领域的政治化、武器化、阵营化趋向明显,中国能源资源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从有效增强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弹性、拓展多元化能源资源进口来源、推动全球能源资源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补齐中国能源资源国内供应不足、进口来源相对单一和输运通道受制于人等关键安全短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资源保障。

(三)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安全本质上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对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间的发展关系进行全面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19]。“十五五”时期,为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正进一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既要降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刚性约束,又要有效减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态安全要求,即进一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基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安全被确立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将其作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中国将继续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与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与绿色发展的强大动能、优势同步形成。新时代以来中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累积与各类复合性生态安全风险等仍然是中国生态环境系统的短板与不足,对人民群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生态安全预警防范体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成为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与目标任务。“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持续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安全问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此基础上,从体系化、科学化、协同化等多维入手,进一步完善生态安全体系和加强生态安全科技支撑,并通过培养生态环保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参与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四)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国泰民安一直以来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然而,现代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各种风险挑战。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20]党的二十大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入手,强调在完善新征程上的国家安全工作布局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在新安全格局之下应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的一体化关照,妥善防范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风险挑战。“十五五”时

期需要立足更高起点,从人民群众更加多元的安全需求着眼、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入手,切实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

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体现,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社会公共安全整体水平。公共安全治理所具有的鲜明人民性、系统性与协同性,与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价值取向与目标要求高度契合。一方面,“十五五”期间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进一步聚焦风险防控,全面提升公共安全治理的应急体系韧性与多元协同水平;另一方面,“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扎实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强调让人民群众满意,使公共安全治理、平安中国建设产生更多实绩实效。新时代以来,中国基于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在重特大自然灾害面前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全国2024年的自然灾害受灾人次、倒塌房屋数量,与前5年均值相比分别下降20.4%、50%^[21]。“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全面深化市场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综合执法机构改革;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全面增强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等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安全问题的治理实效。

(五) 加强海外安全保障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走向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而需要在对外开放环境中不断增强动态维护国家安全、海外安全的本领。“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持续深入推进,中国海外利益已由早期聚焦贸易和投资拓展至更为广阔的领域,海外安全保障工作已不再是危机防范式的临时性安排,而应加快朝着组织协调更高效、法治保障更完备、风险防范响应更精准的方向迈进^[22]。

在新安全格局下应加快设立以海外安全保障为主要任务的专门机构,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海外安全保障工作上的职责任务,努力形成海外安全保障的前期监测预警、中期管理保护、后期介入帮扶的体系性合力。“十五五”时期,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要更加全面、系统、科学、有效地推动我国海外安全保障工作。针对部分国家滥用出口管制,以各种非经济理由强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对中国正当发展权益、海外利益的侵犯,中国应着力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及时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丰富反制政策工具箱,坚定捍卫国家开放发展权利^[23]。

与此同时,加强海外安全保障离不开新时代中国对有利外部安全环境的主动塑造。现代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制定往往都要考虑外部安全环境^[24]。在新安全格局下中国已从过去被动接受外部安全环境的影响,到当前能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中国对外部安全环境的主动塑造能力显著增强。“十五五”时期,中国防范化解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金融、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海外利益等多领域矛盾风险的任务繁重艰巨。塑造有利的外部安全发展环境,已成为新安全格局下加强海外安全保障的重要方向。中国正不断丰富各类塑造外部安全环境的手段,不仅聚焦地缘政治冲突等传统外部安全环境,也通盘考虑发展、生态、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外部安全环境。

三、“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实践路径

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突出强调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面对“十五五”时期国家

安全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通过整体性推进与重点性突破加快健全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与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并在实践中实现主动作为,增强统筹维护国家安全本领与塑造有利外部安全环境的能力。随着整体推进、重点突出且战略主动性不断彰显的新安全格局不断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将在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夯实安全发展基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加强海外利益保障等核心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 整体性推进:健全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主要是指为实现国家安全和使国家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展开,而由一系列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完整系统^[25]。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国家安全体系、机制是否普遍建立且门类齐全,以及国家安全体系、机制内部与相互间是否匹配并实现有效互动联动^[26]。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本之策,健全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自然也成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重点实践方向。面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以及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安全威胁风险所涉及的众多体系与机制,坚持系统性思维与整体性推进至关重要,应着力打造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系统集成、联动高效,从而形成体系性合力。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更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将党的领导更全面、系统、整体地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其一,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全链条全要素协同联动,形成体系合力。国家安全体系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国家安全子体系,各国家安全子体系间既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又因持续的动态变化而伴随着巨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更好实现协同联动与体系合力,离不开整体性的布局完善与改革创新。“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从国家安全体系、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社会治理体系、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方面进行统一布局,贯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内和国际、顶层和基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实现国家安全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提升国家安全体系的协同化水平。比如,就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而言,在科学制定国家安全总体战略和各领域专项战略政策的基础上需要聚焦两个方面的重点:一是明确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优化跨部门、跨区域协调联动,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形成权责分明、层层负责、高效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持续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战略政策评估机制,增强国家安全战略政策的前瞻性、适应性和实效性。

其二,聚焦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提高应急应变效能。重点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撑。“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海外安全等核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统筹规划,探索建立各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与重点工作、跨境合作协调小组。“十五五”时期,需要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推动形成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各环节无缝有效衔接,以及整体合力不断彰显的大安全大应急格局。“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就要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应通过切实的政策支撑保障加大监测预警的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应急应变效能,应在全面健全完

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和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基础上,以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深化应急管理机制、体系改革^[27]。

(二) 重点性突破: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家安全能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保障国家处于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和^[28]。国家安全能力为国家安全问题的预防和化解提供工具支撑,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位置。“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聚焦重点领域,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

一是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实现国家安全能力的全领域覆盖与重点领域增强。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必要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与国家安全资源。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突出强调总体性。因此,国家安全能力实战实用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各类国家安全组织、能力资源要素的作用,并对其进行归纳整理,既做到分门别类,突出国家安全能力要素间的差异化功能划分,又推动统筹协调,使国家安全能力能够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的迫切需要^[29]。“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域与风险挑战随着国内国际安全环境变化而不断延伸拓展、加剧,在提升及时有效解决一域一业安全问题能力的同时,也要从全环节多领域入手推进安全能力建设,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30]。

二是注重科技赋能,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改革创新是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的不竭动力。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而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向国家安全各领域赋能渗透。科技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国家安全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科技为国家安全各领域注入新动能、引入治理新手段,充当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基础,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已知或尚难预料的安全风险挑战,倒逼国家安全内涵边界和外延不断拓展,以更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31]。科技赋能正成为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关键支撑。当前,国家安全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不仅军事、经济等传统国家安全领域明显受科技影响,太空、深海、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新兴国家安全领域,以及关乎国家安全的大国竞争的某些关键细分领域的安全水平与战略态势,都与科技创新能力息息相关,也天然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与赋能^[32]。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正面临数据爆炸式增长,各类安全风险与问题不断跨域传导、叠加突变,使得提升国家安全的情报感知能力、决策能力以及多场景安全风险应对能力变得迫在眉睫。人工智能与安全发展、公共安全治理等深度融合,一方面可实现对地理空间影像、开源情报等多元信息的实时融合分析,显著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性与时效性^[3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突破人类认知局限,建立起分析复杂安全威胁的智能系统,并据此生成联合行动方案,提升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水平。

(三) 主动性作为:积极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如果说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由国家安全保障机关针对国家安全领域已经存在的现实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进行解决与动态应对,那么塑造国家安全在主体上更具广泛性,其聚焦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系统性改进提升以及对周边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整体塑造^[34]。“十五五”时期内外安全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也使得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不能仅停留在预防层面,还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塑造有

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国家安全态势。

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除了以钉钉子精神补齐短板弱项与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外,还应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厚植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针对目前存在的国家安全认知水平较低、观念较陈旧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危机感、责任感淡化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应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在主体上,形成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覆盖。在内容与形式上,积极开展更精准化、差异化宣传教育。比如,对于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来说,一方面要系统讲解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成就与当前面临的威胁,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要系统剖析大学生遭遇的高频安全问题,帮助他们主动更新维护自身安全、国家安全的“技能库”。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其不仅体现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也反映在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柔性力量和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先导力量,只有全面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才能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汇聚起强大的人民力量。

与此同时,通过理念引领与行动助力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是“十五五”时期塑造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要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35]针对外部安全环境,“更高层次”强调通过塑造更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助力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更具前瞻性”则意味着通过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塑造,将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线前移,真正把各类安全风险、安全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当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深陷代表性、权威性与有效性危机。不断加深的和平安全赤字,客观揭示出无论是以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主要框架的国际安全治理机制,还是一系列地区性安全协作机制,都无法有效应对持续动荡的国际安全形势与不断上升的地缘冲突风险^[36]。在理念上,中国应持续高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强调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可持续安全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行动上,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的核心平台,并积极携手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多措并举推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安全合作。

四、结语

中国正经历发展速度快、时间短、规模大的现代化进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使人类社会发生着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置身于一个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社会”^[37]。“十五五”时期,中国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且受错综复杂的外部安全形势传导影响,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都比以往更复杂,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绕不过去、回避不了的。各种内外风险相互耦合、复合关联,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部分局部矛盾风险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演变为国内矛盾风险,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8]。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但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条件不可能自动生成。“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从国家发展总体格局出发,

把握好新安全格局的核心议题,通过加快推进更具协同高效、实战实用性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主动性,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国家安全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
-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国家安全战略(二〇二一—二〇二五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二〇二一年咨询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 人民日报,2021-11-19.
- [3] 王文,陈修豪,刘锦涛,等.“大争之世”:特点、中国经验以及应对建议[J]. 学术探索,2024(9):31-39.
- [4] KNICKMEYER E, KIM S. A record number of NATO allies are hitt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target during war in Ukraine[EB/OL]. (2024-06-18). <https://apnews.com/article/nato-defense-spending-stoltenberg-biden-5246409eec70745e6e936d997073a6f4>.
- [5] NATO. NATO concludes historic Summit in the Hague[EB/OL]. (2025-06-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p/news_236516.htm.
- [6] 达巍,王鑫.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外交战略的延续与变异[J]. 当代世界,2020(9):11-16.
- [7] BLYTH M. The world economy is on the brink of epochal change[EB/OL]. (2025-06-28). <https://www.theatlantic.com/economy/archive/2025/06/reboot-capitalism-operating-system/683308>.
- [8] 钟开斌.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J]. 学海,2023(3):24-32.
- [9] 童星,张海波. 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2010(1):132-146.
- [10] 龙俊,王天禹.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法律风险防控[J]. 行政管理改革,2024(3):69-79.
- [11] 李磊,王小霞,包群. 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中国经验[J]. 管理世界,2021(9):104-119.
- [1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13] 钟开斌. 构建新安全格局:逻辑起点、理论指引与实践进路[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9):5-14.
- [14] 王炳权. 新时代政治建设思想论纲——学习习近平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J]. 理论探索,2025(5):5-21.
- [15] 李艳艳. 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 红旗文稿,2015(14):9-12.
- [16] 何艳玲,汪广龙. 统筹的逻辑:中国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实践分析[J]. 治理研究,2022(2):4-14.
- [17] 丑则静.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与经验的世界价值[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4):49-60.
- [18] 王安建,高蕊蕊. 中国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展望[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338-344.
- [19] 张琨,林乃峰,徐德琳,等. 中国生态安全研究进展:评估模型与管理措施[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8(12):1057-1063.
- [20]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1] 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EB/OL]. (2025-05-12). 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505/t20250512_894771.html.
- [22] 刘伟亮,永林钊. 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2025(3):149-157.
- [23] 孙祁,栾文韬. 应对法律战视角下的涉外法治建设初探[J]. 和平与发展,2024(5):1-24.
- [24] 钟飞腾.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J]. 国际安全研究,2013(4):64-82.
- [25] 王秉,史志勇,邱斐,等. 国家安全体系的定义与特征:基于体系思想的分析[J]. 情报杂志,2024(3):72-78.
- [26] 李文良.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涵、特点及建设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15-123.

- [27] 丰俊功, 房宁. 习近平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J]. 理论视野, 2025(5): 32-38.
- [28] 李文良.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5): 3-29.
- [29] 王秉.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J]. 学术论坛, 2024(3): 22-33.
- [30] 黄大慧, 王月禾. 国家安全能力: 一个过程机制分析框架[J]. 政治学研究, 2025(2): 35-51.
- [31] 肖晞, 王一民.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 理念、机理与路径[J]. 探索, 2023(6): 53-66.
- [32] 刘光宇.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N]. 光明日报, 2025-04-08.
- [33] 张海涛, 庞宇飞, 刘彦辉, 等. 人工智能赋能情报服务与决策: 内涵、逻辑与路径[J]. 图书与情报, 2025(1): 1-8.
- [34] 张杨.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 基于模型的阐释[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3(5): 72-82.
-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36] 凌胜利, 王秋怡.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J]. 外交评论, 2023(2): 1-21.
- [37] 范如国.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2): 65-83.
- [38] 肖巍. 更加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2): 19-25.

Core Issu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OU Zeji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and pathway for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t focuses o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continuously providing higher-level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crucial phase for China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and make all-round efforts toward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face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featuring coexist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as well as a growing number of uncertain and unpredictable factors. This im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 coordinated and efficient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 forg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with a mindset of prioritized breakthrough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hape a favorable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rough proactive actions. The continuously improved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will play a greater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ore areas such as resolutely safeguarding political securit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for secure development, building a strong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mproving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overseas security guarantees. In doing so, it will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to basically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nation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赵超

引用格式:徐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观照与实践遵循[J].探索,2026(1):77-88.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观照与实践遵循

徐俊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使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面对这一阶段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然而,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存在“自我革命自损论”“管党治党过度论”“自我革命旁观论”“权力层级绝缘论”等误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削弱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性。究其原因,这些误区的形成主要源于理论武装的系统性不足、历史主动精神的承继性弱化、利益固化藩篱的日益显现、责任传导的机制性衰减以及制度约束的刚性欠缺等多种因素。毫无疑问,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需要在理论武装上把握规律性,深刻理解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时代价值;在增强党性上锤炼政治品格,确保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在权力规范运行上健全法治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从严监督执纪上强化震慑效应,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健全压力传导机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基层落地生根。可以说,只有科学构建系统性的举措,才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而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根本保障。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认识误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77-12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1]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到新高度,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百年大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刹住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信仰建设史研究”(21BDJ027),项目负责人:徐俊。

作者简介:徐俊,男,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使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征程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面对这一阶段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历史与实践表明,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由之路。然而,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仍存在误区,这不同程度影响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毋庸置疑,系统澄清这些误区、深刻剖析其成因并探寻应对之策,既是新的历史方位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根本保障的必然要求。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命题展开了系统性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是关于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存在错误想法的研究。学界指出,在党的自我革命认识上存在一些错误想法可能影响自我革命的深入推进。耿芳兵指出,妄图将某一个阶段的自我革命经验不假思索地平移和嫁接就会陷入自我革命的经验主义倾向^[3];刘东旭、黄蓉生指出,有的偏重“知”,注重“知先行后”,有的偏重“行”,注重“行高于知”^[4];顾红亮指出,有些人“少了锐气,缺了斗志,不想担责,不想作为,不敢去碰硬问题,遇到难题躲着走”^[5]。可以说,现有研究揭示了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的错误想法的种种表现,但对其错误想法的类型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关于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存在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的研究。罗国庆、阎树群从党的思想建设的层面指出,“不信马列信鬼神”现象尚未彻底根除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的一大难题^[6];蒯正明、闫永超基于制度规范体系维度认为,在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7];唐皇凤、徐植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角度调查分析指出,容错纠错制度执行不力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领导干部存在畏难情绪、避责的心理^[8];王春玺、杨忠林从系统论的层面指出,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不足、骄傲自大的心态阻碍了党员干部对自我革命的认识水平和行动自觉^[9];王礼鹏、冯一帆的调查报告显示,公众认知中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等反映了教育引导的缺失^[10]。通过分析发现,学界现有的原因研究尽管涵盖了理论、制度、现实等不同方面,但相对缺乏对微观心理机制的分析。

三是关于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的主要举措的研究。张健、崔慧娟从主体、客体、价值、历史、实践等维度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认识逻辑^[11];王维国主张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思想建设等落实新时代要求以实现认识提升^[12];杨金海、张倩指出,需要在社会革命中检验自我革命效果,坚定历史自信和主动精神^[13];戴圣鹏从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入手,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14]。通过梳理可知,学界现有的举措研究虽注重实践导向,但举措之间的系统性整合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体而言,尽管学界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的研究成绩显著,但在其错误想法的系统分类、原因的多维分析以及举措的整合性等方面仍有深化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将在学习借鉴学界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指示^[15]为根本指引,着重从误区检视、成因剖析和基本遵循三个主要维度展开分析与探讨,以便为学界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二、当前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存在的主要误区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6]3},这就要求全党在对待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课题的认识上必须在思想、意志、行动上高度统一。然而,当前虽然多数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部分人还抱有不正确的想法。

(一)“自我革命自损论”的迷思

“自我革命自损论”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认识误区,其核心论点在于将党的自我革命错误地解读为一种“自曝家丑”的行为,“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15]。这种观点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误读,也是对政党形象塑造动态性的静态化理解。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一个政党的成长和发展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克服内在矛盾、实现自我扬弃的过程。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并非体现为永不犯错,而恰恰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7]576}。这就彻底打破了完美无瑕才是威信之源的迷思。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和壮大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壮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某些失误进行了坦诚反思和自我纠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党以巨大勇气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无不彰显了党对待错误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这些关键节点的自我革命实践“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15],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历史已雄辩地证明,只有敢于直面并切实解决问题的政党,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巩固执政之基。因此,“自我革命自损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历史经验上是缺乏依据的,在实践成效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二)“管党治党过度论”的悖论

“管党治党过度论”是当前阻碍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的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认识误区。这种观点将全面从严治党和激发干部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15]。这种论调在表面上似乎关注效率和积极性,实则是对管党治党与事业发展内在关系的误判,未能深刻把握“严管”与“厚爱”、“约束”与“激励”、“破”与“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政党,其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营造良好环境。一个纪律松弛、作风涣散、腐败滋生的执政党,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市场秩序混乱、

社会公平正义受损,最终扼杀真正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能。从实践成效来看,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在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同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跃上新台阶。这充分说明,自我革命“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5]。换言之,对于那些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而言,严格的纪律规矩恰恰是“护身符”,公平洁净的环境恰恰是“定心丸”,它保护干部不犯错误、少走弯路,激励干部在规则范围内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因此,“管党治党过度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它忽视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低估了优良作风对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错估了严明纪律对干部健康成长的保障作用。

(三)“自我革命旁观论”的责任虚化

“自我革命旁观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其典型特征是将党的自我革命狭隘地理解为高层决策或组织行为,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将个体置于“看客”或“局外人”的位置。这种“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15]的责任虚化倾向,实质上割裂了党的集体意志与党员个体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模糊了自我革命所蕴含的全党性、主体性等内涵,构成了阻碍自我革命要求落地落实的消极思想障碍。从组织纪律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战斗队。这就从根本制度层面确立了每一位党员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和参与义务。将自我革命的责任局限于上级组织或领导干部,实质上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片面理解,忽视了党员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肌体是由数千万党员“细胞”构成的一个整体,而每个“细胞”的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个肌体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如果大部分党员抱有“旁观”心态,对自身问题讳疾忌医、对周围不良现象听之任之,那么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必将受损,自我革命也就可能流于形式,难以触及灵魂、取得实效。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看,自我革命的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必然需要全员参与、共同用力。无论是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还是严守纪律规矩、规范权力运行,抑或反对“四风”、廉洁自律,其具体要求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具体思想和行动之中。理论与实践表明,“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15]。因此,“自我革命旁观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它消解了党员的主体责任,弱化了自我革命的群众基础和实践力量。

(四)“权力层级绝缘论”的虚幻安全感

“权力层级绝缘论”是在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颇具代表性的认识误区,其典型表现是“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15],产生所谓“反腐败免疫幻想”。这种基于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来判断腐败风险程度的认知模式,实质上是对权力本质属性的误解,也是对腐败发生规律和危害机制的片面化解读。从腐败发生的机理来看,腐败行为并非必然与权力层级成正比。腐败的核心在于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其发生与否关键在于权力运行的规范程度、监督制约的有效性以及掌权者的党性修养和法治意识如何。大量违纪违法案例表明,“微腐败”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因其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往往对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更严重的侵蚀性和破坏性。“蝇贪蚁腐”看似涉及金额不大、层级不高,但其危

害具有累积性、扩散性和基础瓦解性。它如同侵蚀堤坝的蚁穴,若不及时整治,将逐步瓦解基层政治生态,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最终可能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从权力监督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看,全面从严治党强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求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岗位和人员实现监督全覆盖。党的纪律对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将监督重点聚焦于“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与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重要方面。基层党员、干部数量庞大,直接服务群众,其作风和廉洁状况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效果。这种“权力层级绝缘论”所营造的“虚幻安全感”,其危害性不容小觑。它容易使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放松自我要求,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小节上失守,从而为更大范围的权力滥用埋下隐患;也可能导致对基层“微腐败”的警惕性不足、治理力度不够,积累民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想法,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在对待党的自我革命上存在的认识误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15]

三、当前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误区的深层原因

就其生成机理而言,当前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误区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理论武装的系统性不足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而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自我革命自损论”这一认识误区的产生,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于部分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存在浅表化、碎片化等倾向。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理解停留在表层。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18],更不能从哲学高度深刻理解“破”与“立”、“否定”与“肯定”等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揭露问题、修正错误简单等同于“否定成绩”“自损形象”,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他们忽略了“刮骨疗毒”是为了“强身健体”,而“自曝家丑”恰恰彰显了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对人民负责的担当。于是,理论上对政党发展规律认知的片面性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自我革命价值的误判。其次,理论学习的碎片化导致对党的历史经验汲取不深。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学习不系统、不深入,未能从历史长河中深刻感悟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再次,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及其深远意义的认识不够全面。部分党员、干部未能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置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中来理解,未能充分认识到清除党内严重隐患对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性。这种对实践成果解读的片面性源于理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不足,未能将反腐举措与执政安全逻辑紧密联系起来。最后,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薄弱。部分党员、干部理论学习不深、不透、不系统,存在严重的学用脱节。当遇到因自我革命触及利益调整而产生的阻力或杂音时,不能从理论高度进行有力辨析和引导,反而可能受到错误观点的影响,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认识上的混乱。

(二) 历史主动精神的承继性弱化

这种弱化表现为对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自我革命传统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收借鉴不够充分,从而在实践中缺乏应有的政治自觉和战略定力。

首先,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着深厚的实践根基和清晰的传承脉络。“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本就孕育着自我革命思想,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原点。”^[19]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越是承平时期,越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越是取得成就的时候,越要有检视自身的勇气。然而,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自我革命史的学习存在碎片化现象,对历史上因未能及时纠正错误而带来的深刻教训认识不足,对党依靠自我革命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历史智慧体会不深,导致在实践中缺乏将党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推进自我革命内在动力的能力。其次,历史主动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自觉意识和积极作为。它要求一个政党不但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能够主动顺应和驾驭这种趋势在历史关头做出正确抉择。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集中体现为始终掌握历史规律、洞察时代大势、引领事业发展的能力,而自我革命正是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最高体现。然而,部分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中未能将党的历史与党的创新理论有机结合,对“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一重大论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解不够透彻,导致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最后,历史主动精神承继性弱化直接导致一些党员、干部缺乏“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他们对于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认识不足,对于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挑战估计不充分,产生了可以“歇歇脚”“松口气”的错觉。

(三) 利益固化藩篱的日益显现

这种藩篱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本能抵触、权力与利益交织形成的保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惰性。当自我革命触及实质性的利益调整时往往会遭遇各种形式的“软抵抗”,使得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被虚化、弱化甚至扭曲变形。

首先,利益固化的藩篱体现在资源配置权的重新调整上。自我革命要求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资源分配机制。然而,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部分既得利益者会通过各种方式维护现有分配模式,对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措施采取消极应对或变相抵制,成为自我革命需要攻克的重点难点。其次,利益固化的藩篱体现在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顽固存在上。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特权,但一些领导干部将职务权力视为个人特权,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追求特殊化。这种特权意识不仅直接违背党的宗旨,还会产生示范效应,导致特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被默许甚至效仿,形成与自我革命要求相悖的现象。再次,利益固化的藩篱体现在责任与利益的不对称分布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部门特权化等现象,导致管党治党责任难以真正落实。当改革触及部门利益时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偏差,当问责追究可能影响局部利益时容易产生“护短遮丑”的倾向。这种责任与利益的错位使得自我革命在基层实践中容易遭遇“中梗阻”。最后,利益固化的藩篱体现在其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相互强化上。制度漏洞为利益固化提供了存在空间,而利益固化又反过来阻碍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由于制度设计不够周密、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使得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有了可乘之机。

(四) 主体责任的层级性传导衰减

这种传导衰减具体表现为管党治党压力从上至下逐级弱化,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执行温差,导致自我革命在基层实践中容易流于形式、难以深入。

首先,压力传递的逐级递减是责任传导衰减的突出表现。党中央推进自我革命的决心坚定不移、要求明确具体,但在向地方、部门乃至基层党组织的传导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出现理解偏差、重点偏移和力度减弱问题。部分中间层级的领导干部在传达部署时可能存在选择性执行的倾向,这种“过滤效应”使得自我革命的要求在落地过程中逐渐失真走样,难以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基层的具体行动。其次,责任与权力不匹配是导致责任传导衰减的要因之一。不同层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所承担的责任与其实际掌握的权力资源并不完全对等。一些基层单位往往面临责任无限大、权力有限小的困境,在推进自我革命时缺乏必要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制度创新空间。这种权责失衡状态容易引发基层的消极应对,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对自我革命要求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出现上面压得越紧下面动作越变形的逆反心理。再次,一些考核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进一步加剧了责任传导衰减。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考核仍存在重业务指标、轻党建实效的倾向。这种考核指挥棒的偏差无形中引导基层将更多精力投入容易出成绩的领域,而对需要长期投入、见效缓慢的自我革命工作则重视不足。当管党治党责任的落实未能与干部考核、晋升激励等有效挂钩时,责任传导的自然衰减就难以避免。最后,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完善为责任传导衰减提供了空间。对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往往侧重于程序合规性检查,而对实际效果的追踪评估相对薄弱。问责环节存在“宽松软”现象,对责任传导不力、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未能及时纠正和严肃追责。这种监督问责的刚性不足降低了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落实自我革命责任的外在压力,使得责任传导在末端环节容易出现“断链”风险。

(五) 制度约束的刚性化程度不够

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执行与监督等环节存在的弹性空间,导致权力监督制约的“笼子”未能完全扎紧。

首先,制度执行环节存在的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等问题突出。再完善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在执行制度时存在“执行难、执行弱、执行梗阻、执行走样等执行力不强问题”^[20],对上级强调多、要求严的工作就重视,对日常性、基础性的制度规定就松懈。这种执行上的偏差使得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在传递过程中衰减。其次,监督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削弱了制度刚性。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有些侧重于程序合规性,而对实质效果的评估相对薄弱,导致问责机制存在“宽松软”现象。特别是在“一把手”监督方面,虽然建立了相关制度,但由于监督主体相对弱势、监督手段相对有限,使得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效果不尽如人意。最后,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潜规则”使一些制度刚性不足。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潜规则”仍然存在,侵蚀了“明规矩”的权威性。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虽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程序,但“打招呼”“递条子”等“潜规则”仍然存在。这些“潜规则”的存在不但扭曲了“明规矩”的运行效果,而且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自我革命的要求在落实过程中被虚化、弱化。

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在党的自我革命认识上产生误区的重要根源。这些深层原因既涉及思想认识层面,也关乎体制机制设计;既反

映出主观层面的不足,也暴露了客观存在的短板。

四、新形势下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的基本遵循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真正把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向纵深推进,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就需要将科学的理论认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

(一)在理论武装上进一步把握规律性

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必须推动理论武装进一步从零散化、浅表化向系统性、规律性层面深化,使党员、干部真正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就要求我们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理论学习体系。

首先,建立中心组领学、支部研学、个人自学三级联动机制是确保理论学习系统性的基础保障。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围绕自我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专题学习和深度研讨,率先把握核心要义、领会精神实质。基层党支部要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形式,组织党员开展互动式、研讨式学习,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认知。个人自学则强调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研读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通过撰写心得体会、参与交流分享等深理解。这三个层级相互衔接、彼此促进,确保理论学习不留死角、不存盲区。其次,深化对“第二个答案”的规律性认识是理论武装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长河中深刻理解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战略抉择的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维度深刻把握自我革命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髓,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感悟自我革命展现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另一方面,要搭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向转化平台,鼓励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最后,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气力,以着力提升理论武装的转化效能。

(二)在增强党性上进一步锤炼政治品格

由于“党的自我革命与党员党性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21],而坚强的党性又是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成功推进的内在保证,所以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必须将增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

首先,建立科学的党性定期分析评估机制是增强党性锻炼针对性的基础。要结合年度考核、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载体,通过个人述责、组织评价、群众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对党员、干部的党性状况进行动态分析和综合研判。这种量化分析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及时发现党性修养中的薄弱环节。其次,将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锤炼党性的主战场。有计划地选派党员、干部到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前沿阵地经受锻炼,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检验和提升党性。特别是对年轻干部,要有意识地让他们“墩墩苗”,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补齐实践锻炼这一课。再次,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作用。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敢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坚决反对好人主义、克服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以整风精神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复次,强化正反典型教育的示范引领和警示震慑作用。深入挖掘和宣传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

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同时,做深做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通过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入剖析揭示问题根源及其危害,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闻警自省。最后,把牢选人用人的党性鉴别关口。既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考察干部在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的政治表现,深入了解其理想信念、政治忠诚、廉洁自律等情况,也要健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改进考察方式、延伸考察触角,全面历史辩证地识别干部的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

(三) 在权力规范运行上进一步健全法治体系

权力规范运行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必须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治体系。

首先,完善权力配置机制是规范权力运行的起点。要科学界定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部门的职责权限,特别是对“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权力边界进行清晰划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权力事项、法律依据、运行流程和责任主体。其次,强化权力运行过程的程序性约束。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特别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中,要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性要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再次,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规范权力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安排。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但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党员权利,而且要实行正确的集中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领导班子成员不仅要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坚决执行集体决定,而且要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强化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复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权力监督效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权力监督提供了新的路径。要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督”建设,推动权力运行全过程电子化、可视化、可追溯。通过技术手段固化权力运行流程,减少人为干预,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最后,严格权力运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问责机制,明确各类责任情形和追究方式,对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等问题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四) 在从严监督执纪上进一步强化震慑效应

从严监督执纪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重器,其震慑效应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如何。因此,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必须坚持严字当头,不断增强监督执纪的穿透力、震慑力和持久力。

首先,构建贯通协调的大监督格局是强化震慑效应的基础保障。要健全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等统筹衔接,实现监督职责的再优化、监督力量的再融合、监督效果的再提升。特别要重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前哨”作用。其次,强化日常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是抓早抓小的关键所在。监督不能浮于表面,必须深入肌理。要转变监督理念从偏重于查办大案要案向加强日常监督转变,把监督寓于日常、做在经常。要注重从干部群众反映中发现问题、从细微处着眼,及时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再次,保持执纪审查的凌厉攻势和强大震慑是“严”的体现。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是维护纪律权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对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要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等的有机统一。复次,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同根同源、相互交织,必须坚持风腐同查,既“由风查腐”,深挖细查“四风”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揭开作风问题的“盖子”、揪出腐败问题的“根子”;又“由腐纠风”,针对腐败案件暴露出的作风顽疾开展专项治理,铲除风腐一体的土壤。最后,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必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通过不懈努力,推动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营造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五)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进一步健全压力传导机制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组织保障,因此,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就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确保自我革命的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和每位党员、干部身上。

首先,构建清晰的责任主体体系是压力传导的基础。要明确划分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党员具体责任这五个层级的责任边界,形成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通过责任清单化管理将抽象的责任转化为具体的任务,确保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责任。其次,创新压力传导的方式方法是提升传导效能的关键。上级党组织在部署工作时要同步明确管党治党要求,做到业务工作与党建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要改进督查方式,采取随机抽查、交叉检查、暗访督查等多种形式,既看工作过程,更重实际效果;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在线管理平台,实现责任传导全过程可视化管理。再次,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是强化压力传导的重要抓手。“党的领导是实现制度科学评估的关键”^[22],因而,要健全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管党治党成效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中的权重,突出对落实自我革命要求的考核。对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既问直接责任,也问领导责任,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复次,强化监督问责的刚性约束是压力传导的保障。要健全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方式,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要坚持精准问责,区分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把握政策界限,做到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要加大公开通报力度,对典型问题及时曝光,形成震慑效应。最后,营造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是压力传导的环境支撑。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极端重要性,增强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五、结语

新征程上我们能否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党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能否真正到位。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自我革命的认识存在偏差。一是将自我革命误读为“自损形象”,认为严管严治会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是将自我革命视为“发展绊脚石”,担忧正风肃纪影响经济建设节奏;三是将自我革命误判为“高层事务”,认为基层党员与自我革命无关;四是陷入“小权无害”误区,忽视微权力异化的风险,认为自己不需要自我革命,等等。这些认知偏差导致部分地方和单位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时出现重视程度不一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些认知偏差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理论武装未入脑入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理解不深,未能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辩证统一;第二,历史主动精神弱化,缺乏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纵深感;第三,利益固化藩篱尚未破除,个别领域权力寻租惯性犹存;第四,责任传导机制失

灵,管党治党压力未能有效下沉到“最后一公里”;第五,制度约束刚性不足,监督执纪“宽松软”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打了折扣。

我们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就需要以系统思维进行综合施策。首先,在思想淬炼上,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把握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理论逻辑,破除影响发展的片面认知;其次,在历史自觉上,要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勇于自我革命的智慧 and 力量,不断增强治党务必从严的历史主动;最后,在制度攻坚上,要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让“小权力”在制度笼子里规范运行。

我们只有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J]. 求是, 2024(24): 4-7.
-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5-10-24.
- [3] 耿芳兵. 论自我革命的哲学能动原则及方法论意义[J]. 东岳论丛, 2025(4): 88-94.
- [4] 刘东旭, 黄蓉生.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蕴含的辩证逻辑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29-40.
- [5] 顾红亮. “第二个答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43-50.
- [6] 罗国庆, 阎树群. 现阶段“不信马列信鬼神”现象的治理对策论析[J]. 科学与无神论, 2024(2): 33-43.
- [7] 蒯正明, 闫永超.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逻辑理路[J]. 理论探讨, 2024(4): 37-43.
- [8] 唐皇凤, 徐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 效果评估、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46-58.
- [9] 王春玺, 杨忠林. 系统集成: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科学方法[J]. 河南社会科学, 2025(12): 23-31.
- [10] 王礼鹏, 冯一帆. 调查报告: 公众对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与感受[J]. 国家治理, 2022(24): 60-64.
- [11] 张健, 崔慧娟.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认识逻辑[J]. 学习论坛, 2023(2): 36-44.
- [12] 王维国. 深化对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J]. 红旗文稿, 2022(5): 21-23.
- [13] 杨金海, 张倩. 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认识[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4): 1-10.
- [14] 戴圣鹏. 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之辩证认识[J]. 教学与研究, 2025(7): 16-24.
- [15] 习近平.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J]. 求是, 2025(23): 4-8.
- [1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8] 梁敬国. 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的内在逻辑、现实场域及实践进路[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38-46.
- [19] 李武装.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探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1-14.
- [20] 李京桦, 刘向辉. 制度执行力建设: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关键[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23-30.
- [21] 何克祥, 孙妙. 自我革命的党性维度: 内在关联、逻辑理据和有效路径[J]. 探索, 2025(2): 71-82.
- [22] 金英存, 臧秀玲.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复合性分析——基于“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J]. 理论探索, 2025(5): 49-58.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eepen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the Stage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XU Jun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courage to engage in self-reform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and its greatest strength. Exercising 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 is a great practice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the new era.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conducted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roviding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n schedul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tests in this stage, we nee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persist in us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to drive social revolution, and make persistent and sustained efforts to advance 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 However, some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harbor certain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Party's self-reform, such as the fallacies that "self-reform is self-sabotage" "Party self-governance is excessive" "self-reform is a spectator sport" and "higher authority grants immunity". These misconceptions, to some extent, undermine the systemic nature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and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se misconceptions include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rounding, a weakening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the emergence of entrenched interest barriers, the attenuation of accountabilit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a lack of rigi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Undoubtedly, at the critical stage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we must grasp its inherent regularity in theoretical arming,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enhancing Party spirit, we must temper political character to ensure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are loyal, clean, and responsible. In standardizing the exercise of power, we must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system to lock power in an institutional cage. In enforcing discipline with strict supervision, we must strengthen the deterrent effect to form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hat ensures officials dare not, cannot, and do not want to be corrupt. In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arty governance, we must improve the pressu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at the requirements for 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 take root at the primary level. It can be said that only by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ing systematic practical measures can we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form to be deeply internalized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ed, advance full and rigorous self-governance to greater depth,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guidance, mass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appeal, thereby providing fundamental guarantees for ensuring decisive progress in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Party's self-reform, full and rigorous Party self-governance, misconceptions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刘蕊.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探析[J].探索,2026(1):89-99.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探析

刘蕊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取得重大成效的宝贵经验。“十五五”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离不开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关联、互促共进。党的自我革命本身内蕴着鲜明的现代性要义,离开党的自我革命谈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失去核心领导力的战略保障。当前,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谈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会失去现实指向和价值归依。因此,“十五五”时期深化党的自我革命要聚焦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政治保障这一现实指向,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引领、组织动员、民心凝聚等保障作用,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引领力、锻造上下贯通的组织动员力、汇集广泛深厚的民心凝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守正创新解答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过硬执政本领、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执政党调适性机制、涵养良好政治生态等重大时代课题,把党建设的更加充满生机活力、更具历史主动精神,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089-11

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确保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着眼未来五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1]13},这对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本身蕴含着鲜明的现代性指向,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的政治前提。当前学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探讨党的自我革命何以引领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方雷、谢科伦认为,自我革命具有的现代性要义能有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巨大作用,是根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科技创新型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路径研究”(25&ZD016),项目负责人:唐皇凤;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全域治理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24BJZJ04),项目负责人:刘蕊。

作者简介:刘蕊,男,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

积弊沉疴、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要素铢积寸累的重要方法^[2]。王建国、田娜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逻辑在于以不断地自我革命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3]。二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视角分析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孙会岩认为,党通过自我革命来引领国家现代化建设,呈现“自我革命—政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政党行动逻辑^[4]。武星星、卢黎歌提出,自我革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改革阻力向动力转化、现代化动能向人民美好生活势能转化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引领作用^[5]。尹传政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党的自我革命在其历史主动实践活动中最直接和生动的体现,认为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本的保障制度,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前进方向^[6]。已有成果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价值意义,阐释分析了新时代党通过自我革命推进政党治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但学者们大都从宏观维度切入,聚焦新形势下党的自我革命现实指向的分析相对偏少。

因此,聚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战略擘画,探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对引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指向并提出实践进路,这对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增强党的自我革命历史主动性和现实针对性,推动实现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协同共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7]20}。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政党发展史上长期有效执政的典范,在奋斗历程中,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始终保持着高度清醒并采取针对性回应举措,以巨大政治勇气和主体自觉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确立的中心任务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号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部署,重要任务是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的新要求。

(一)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需要以自我革命锻造党的执政主体

党的自我革命能够锻造党的坚强执政主体的核心逻辑在于:一是党的自我革命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等现象进行治理。有的党员在思想上未能以理性的自我认知自觉接受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现实逻辑,潜意识中把刀刃向外当作常理。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党员干部破除思想上的错误观念,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新思路推进社会革命的新实践。二是党的自我革命能有效增强各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具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本在于党始终重视管党治党建设这一核心议题,强调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严明纪律、端正作风,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激发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确保党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主动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执政主体锻造,通过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的系统性治理,锻造出能够驾驭高水平市场经济、应对国际经贸斗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政干部队伍,确

保党中央规划的战略蓝图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众志成城奋斗中变成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人民福祉的美好现实。

(二)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需要以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党长期执政所处的执政方位进行深刻分析,并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19},“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是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环境的精准概括。这种不确定与难预料因素既有来自外部的风险,也有内部自身潜在的风险以及内外部风险交织叠加生成的风险。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功能失灵、面临治理失序,一些国家围绕金融、航运、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主导权争夺日益激化,大国在涉及主权、安全、战略资源方面的摩擦冲突日趋增多,给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趋向带来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党内面临着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有效防止内部出现“变质、变色、变味”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1]19}等多重挑战,仍然还有一些诸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概言之,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风险来源及冲击程度都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把握。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主动识变、应变意识,通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来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确保党持续生成、维系并优化战略性执政要件和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8]34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注重持续更新应对长期执政风险所需的一系列战略性执政要件,譬如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整合,并能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执行惰性,将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转化为持续政策,具备确保政策接续实施的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党的战略规划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才能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和强大动力。

(三) 应对执政环境的复杂形势需要以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韧性

高度重视战略环境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自身方位的判断经历了从“全国执政的党”到“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再到长期执政条件下“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时代变迁,与此同时,党相继作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执政能力建设”“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战略部署。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回应执政环境变迁的重大话语创新,这种话语创新“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和建设任务的重大变化,而且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定力和政党自信的显著标识”^[9]。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1]18}。面对执政环境变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党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迁主动进行系统性、调适性变革,如何防止懈怠僵化、防止权力腐败等挑战,如何直面和解决党内存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10]2-3}等现象,如何在复杂形势中把握和赢得战略主动,发挥好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必然需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韧性。所谓执政韧性就是执政党基于自身的主体性能力而具备的“能够有效适应和灵活应对执政环境持续而复杂变化的潜能和特质”^[11]。党的自我革命能够通过清除导

致政治生态恶化的“污染源”与“病变组织”，恢复并优化执政系统健康运行所需的良好执政环境，有效应对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风险挑战，进而实现对执政肌体的革命性锻造，增强党的执政韧性。

二、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是未来五年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

党的自我革命内蕴着鲜明的现代性要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锻造更加坚强有力、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政治前提。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谈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就失去了现实指向和价值归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1]21}，这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阶段性要求，更体现了党在深刻把握执政规律、系统总结过往奋斗经验基础上所秉持的高度使命自觉和主动担当精神。面对“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擘画对自我革命提出的新要求，面对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新挑战和适应执政环境复杂的新形势，“十五五”时期党的自我革命聚焦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现实指向，只有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对引领和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引领、组织动员、民心凝聚等保障作用，才能锻造出引领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障。

（一）直面和解决政治建设领域问题，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政治引领力

党领导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12]423}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党长期执政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长期执政条件下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13]2}。保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权，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领导力量，就要直面和解决一些地方存在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通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系统性地巩固党的执政权威、有效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党内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14]477}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各级党组织和各群团组织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新时代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党更加注重以制度化方式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出台修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为推进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二）坚决破解组织活力衰减难题，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锻造组织动员力

一般而言，政党组织受路径依赖和行为惯性影响，很容易沿着既有行为模式与发展轨迹形成组织惰性。政党组织存续时间越是持久，层级和制度就越趋于繁杂，组织运作的成本就日趋升高，政党的组织惰性也会随着执政时间拉长而逐渐聚集增加。这种组织惰性不仅会造成执政

党对于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迟缓,无法以革新精神和战略眼光回应外部变化,而且会侵蚀执政党的健康肌体,进而导致执政党出现肌体活力衰减,造成组织运行效率低下。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着长时期和平执政陷入路径依赖进而导致执政系统生机活力衰减等问题。基于此,要“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15]544}。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敢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自我革命精神向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的现象施药动刀,坚决破解组织活力衰减难题。在锻造更加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需的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立起覆盖广泛、严密有序的组织体系,全国范围基层党组织共有 525.0 万个^[16],使全党成为上下贯通、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统一整体,这种组织上的巨大资源和巨大优势,使党具备强大组织动员力,能够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高效地贯彻落实到基层。因此,只有坚持刀刃向内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不断消除党的执政肌体活力衰减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其他政党或组织存在容易滋生的自由、分散、宗派倾向,汇集力量最大可能地实现宏伟目标。”^{[17]177}

(三) 抵御和防范消极因素侵蚀,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汇集民心凝聚力

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执政业绩,很容易让一部分党员干部骄傲自满,放松对自身党性修养锻炼的要求,出现追求低级趣味、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注重感官满足等现象。“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而容易遭遇来自政党内部的严峻挑战,即自我松懈与自我膨胀。”^[18]毛泽东曾批评党内有的党员干部出现“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19]843}的不良作风。如果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的骄傲情绪不加以严厉批评和纠正,可能会导致有的党员干部出现政治上的蜕化变质,甚至滑向腐化堕落深渊。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20]214}。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全国执政条件下相比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年代,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危险挑战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因此,应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党中央注重坚持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中央坚持刀刃向内坚决治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宗旨意识淡薄、担当精神缺乏、纪律观念松弛等突出问题,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引导干部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提供了党长期执政所必备的强大主体力量,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

具体而言,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通过持续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引领全体党员干部不断重温党的初心使命,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有效消除了党内思想分歧,澄清了错误认识,校正了思想偏差,在“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等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为凝聚全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引领和正确的价值导向。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开展反腐败斗争、完善监督体系等举措,有力清除了侵蚀执政基础和损害民心民意的毒素,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汇集起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所必备的广泛民心民意支撑,进而营造了党推进自我革命所需的有利执政环境和韧性包容空间。当推进自我革命触及深层次利益、引发局部出现短期阵痛时,这一韧性空间能够有效缓冲局部不满情绪的冲击,也能够为党坚持推进“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提供长期的社会支持和广泛的政治信任。

总之,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正确方向指引、

广泛主体自觉和强大内生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中维系并优化了党的政治引领力、组织动员力和民心凝聚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推进则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战略支点和现实可行性,也为党以更大决心坚定不移推进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治基础与战略空间。

三、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锻造强大的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前进,尤为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尤为需要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对于引领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守正创新解答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过硬本领、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执政党调适性机制、涵养良好政治生态等重大时代课题,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一)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政治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始终能够坚持根本政治方向的重要前提,也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力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政治逻辑在于党始终重视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百年奋斗历程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 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¹⁰⁰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问题,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征程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是要重视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把握历史主动的主体力量,必须通过自我革命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以便汇聚把握历史主动的磅礴力量。”^[22] 只有在自我革命中才能更好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确保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战略高度作出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六个方面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价值目标高度契合的统一整体,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就要高度自觉自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创业初期的高度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始终如一地积极有效应对党在各个时期面临的考验,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领导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能力。二是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确保党中央的号令在全党范围坚决贯彻、有力执行。政治监督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本任务是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由上级政治主体对下级政治主体进行纵向监督,监督重点主要围绕“关键少数”,聚焦对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执行民主集中

制、落实“党政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深化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监督对象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体系定位,精准发现监督对象履行职责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对监督对象进行精准监督,发现有变通执行、打折扣执行,甚至拒不执行等问题要严格进行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执行,从而坚决有效捍卫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 锻造强大执政能力,增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硬执政本领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本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议题。“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3]529},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必须解答好的时代课题。如果忽视执政能力建设或者执政能力不能匹配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就可能面临执政危机。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命题以来,党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执政本领。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24]6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1]70}。现阶段要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增强干部的过硬执政本领。

一是有规划、分步骤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全周期科学培训,全面提高党员干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需的理论修养和能力水平,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23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强调要“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为重点,注重知识培训,全面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25]11}。二是围绕发挥党员干部党建优势强项、补齐领导能力短板,增强治理能力弱项等关键环节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重点加强信息化、数智化背景下党员干部更好履职尽责和胜任繁重任务的实践锻炼,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提升数字思维、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进而增强党员干部善于运用数字技术辅助科学决策、善于运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手段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三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和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的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既考核干部的现阶段的显绩,也统筹考核干部对当地长远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奖惩激励等相挂钩,形成有效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干部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提升各级干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 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保持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执政肌体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是新时代党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结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26],这是党中央在深化推进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党自身依然面临着各种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如果不严加防范,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

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是要运用系统思维把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看作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一体化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围绕党内存在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利因素,对党员干部开展持久连贯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充分运用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二是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系统性协同推进加强党性锻造、弘扬优良作风与深化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促进党员干部真正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27]17},确保党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三是注重善于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党内监督,以党内监督的高效精准带动其他监督的规范有序。通过构建一体化网络监督平台,有效整合现有监督力量,并把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及舆论监督等多种党外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在监督平台上进行信息汇总与分类处置,形成多方监督合力,提升监督力量的聚合效应。譬如多地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三重一大”事项智慧监督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调阅会议记录电子文档,查阅“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发现违反决策程序的问题即时反馈并提出处理意见,实现对“三重一大”事项从酝酿、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监督。

(四) 优化执政党调适性机制,巩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厚执政基础

执政党调适性是指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智慧,形成了独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塑造生成了强大的政党生命力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譬如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包含了大量自下而上的参与和互动机制”^{[28]21},这种体制和机制使得党能够适时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以更好响应群众诉求变化,确保政策制定、实施和反馈各环节的顺畅稳定和连贯接续。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根本在于“通过不断地自我革命,主动适应社会变化、回应公众诉求,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来调整根本任务”^[29],确保党对执政环境的变化能够实时感知并及时做出相应调适。

一是提高政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外部执政环境变化对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新要求,迫切要求党要守正创新地推进管党治党理念和方略的更新,“把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引领社会革命、保障国家发展的制度引擎和政治保障”^[30],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制度化水平以积极回应群众的新期盼。新时代党中央强调,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进行管党治党,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明确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注重对干部政治标准、专业能力、锐意改革等方面的考核,更加突出考察干部的忠诚度、廉洁度,加强对干部的政治忠诚、品格境界和政治格局等更为全面和有效的识别。二是增强党对群团组织的制度化引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载体,对于吸纳社会上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级党组织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党建带群建作为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统筹基层党群组织工作资源配置和使用,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党员服务站点规划建设应该考虑群团组织需要”^{[31]9}。不断优化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打造集提供群众服务、维护群众权益、汇集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阵地,加强群团干部队伍的培养和激励,增加群团组织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群团组织建设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最为牢固的桥梁和纽带。

(五) 完善政治生态涵养机制, 营造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好执政环境

良好政治生态对于引导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意义重大, 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巩固, 关乎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荣辱兴衰。“做好各方面工作, 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32]33}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管党治党是否有力,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是否能够有效发挥, 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就是看其政治生态是否优良。党的良好政治生态的稳步生成需要党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内部结构功能, 并持续净化外部执政环境进而引领执政环境与执政系统之间互促共进、不断优化。

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一是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执政党自身内部组织结构, 提升执政系统运行效率。要适应当前执政环境复杂变化和治国理政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 在优化单一的垂直领导模式基础上适当增加扁平化的组织架构, 从而使同一层级的管理者之间的横向联系更趋紧密, 使执政党对于外部执政环境变迁能够精准把握, 治理响应速度更加敏捷。二是着力净化执政生态圈, 坚决治理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问题, 为执政系统持续输入更多正能量。“从政治生态学视域分析, 相较于其他系统而言, 拥有良性的、有机环境系统, 其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则比较强, 也能够不断调节执政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 进而维持执政生命系统的动态平衡。”^{[33]162} 三是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推进巡视巡察、信访举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构建起覆盖巡视整改全周期的责任体系和制度流程, 为执政主体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要健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 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责任制度, 从制度层面不断扎紧对权力有效监督的“制度笼子”, 堵塞制度漏洞。通过不断强化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及时发现执政过程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不断自我修复, 为顺利推进实施“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创造稳定有序的执政环境。

四、结语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确保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的政治前提。落实党中央战略决策部署, 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必须深刻认识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战略意义。所谓“决定性进展”, 从任务完成质量上应是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和重大进展, 从任务完成数量上应是绝大多数预期目标都已完成, 并对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一战略目标绝非自然演进的结果, 而是需要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执政环境复杂变化的严峻形势下发挥好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保障作用。

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充分主体自觉, 推动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中维系并优化党的政治引领力、组织动员力和民心凝聚力。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要聚焦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政治保障这一现实指向, 以高度使命自觉和主动担当精神直面解决党的政治建设领域的问题, 坚决破解组织活力衰减的难题, 有效解答侵蚀执政之基的考题, 刀刃向内对影响党的执政肌体健康的病症进行整治, 对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的因素进行清除, 锻造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新征程上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解答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长期执政的

过硬本领、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执政党调适性机制、涵养良好政治生态等重大时代课题,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关键环节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和激励约束;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保持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执政肌体;优化党对执政环境变化实时捕捉并做出及时性应对的执政党调适性机制,巩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厚执政基础;为顺利推进实施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创造稳定有序的执政环境,确保党在守正创新中实现自我超越、始终成为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 方雷,谢科伦.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探赜[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1-12.
- [3] 王建国,田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J].思想战线,2023(5):39-46.
- [4] 孙会岩.坚持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逻辑[J].河南社会科学,2023(5):48-55.
- [5] 武星星,卢黎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探赜[J].湖南社会科学,2025(5):30-36.
- [6] 尹传政.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演进[J].北京社会科学,2025(4):4-14.
- [7]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8]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9] 唐皇凤,肖融知.习近平关于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论述的创新意蕴[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6):5-15.
- [10]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1] 唐皇凤,李要杰.中国共产党执政韧性的科学内涵、基本表现与生成机理[J].探索与争鸣,2021(10):34-45.
- [1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6]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结构持续优化[N].人民日报,2025-07-01.
- [17] 郭跃文,丁晋清.使命型政党塑造的有效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18] 王纪臣,尚庆飞.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研究[J].学海,2018(5):5-11.
- [19]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0]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2] 黄广友,彭畅.党的自我革命与把握历史主动的双向关系论析[J].理论探索,2023(6):28-34.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5]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6]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5-01-09.
- [27]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8] 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M].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29] 叶娟丽,范晨岩.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调适性——以各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变迁为视角[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5-13.
- [30] 唐皇凤.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探索的原理性贡献[J]. 教学与研究,2025(12):43-56.
- [3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3] 刘蕊. 平衡、有机与协同:执政党政治生态的系统分析[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3.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Basically Achieving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Party's Self-reform

LIU Rui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Shan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nan 250103,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in each period to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form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elf-reform to achieve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smooth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ging of the Marxist ruling Party by the Party's self-reform. The Party's self-reform and the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promote each other. The Party's self-reform itself contains a distinct modern essence. Without the Party's self-reform to talk about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ll lose the strategic guarantee of core leadership. At present, if we talk about the Party's self-reform without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Party's self-reform will lose its realistic orient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eepen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should focus on providing a solid political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decisive progr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Party's self-reform in political guidanc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nd people's cohesion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strong core of leadership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Party unites and leads the peop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form and innovation, such as firmly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enhancing the Party's long-term ruling ability, promoting discipline and anti-corruption, optimizing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cultivating a good political ecology, to make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more vibrant and more historically active, and ensure that decisive progress is made in the basic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Party's self-reform,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谢新水,佟洲.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十五五”时期的进路[J].探索,2026(1):100-111.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 “十五五”时期的进路

谢新水¹,佟洲²

(1.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56;2.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北京 100091)

摘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人形+人行+人智”的产品特征,以及我们期待它们全域替代人类劳动、介入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技术难度和复杂风险。从全球视野看,中、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了政策、资本和场景的高效协同。从区域发展看,北京作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其领先优势既得益于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密集高效的融资和丰富的场景拓展,还得益于高质量的产业园区建设和人才资源的集聚。人形机器人产业是未来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人形”不只是技术格式,更是一种实质要求。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一高五难”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我国要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要避免通用适配论带来的功利性,也要避免本能亲近论和市场非理性论带来的狂热。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和安全治理是一体的,我国要突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瓶颈,既要设计好战略进路,又要设计好科学有效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D601;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100-12

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指出: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将深刻变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从产业发展趋势看,2025年被定义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以优必选、宇树科技、特斯拉等为代表纷纷开启量产计划。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也处于商业价值较低但技术难度高的发展阶段,面临量产瓶颈与商业化应用的双重考验,规模化落地难度仍较大^[1]。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小规模试水”迈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期,亟须从技术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如何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中的协同要素

近年来,人形机器人逐渐成为一个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作为未来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人形+人行+人智”的产品特征,以及我们期待它们全域替代人的劳动所带来的技术难度和复杂风险。目前,世界各国支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主要看重其产业价值和产业功能。从产业价值看,人形机器人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产业功能看,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全球老龄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首都安全治理研究”(24LLGAA025),项目负责人:谢新水。

作者简介:谢新水,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佟洲,男,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化和劳动力短缺有关,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机会^[3]。众多文献认为,所有产业发展都与技术突破密切相关。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从实现路径来看,在加快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时,产业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在笔者看来,目前推动世界各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三个,即政策、场景和融资。其中,世界各国的政策都对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战略引导价值,是推动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密集、高效的融资和场景拓展十分重要,但都需要体系化和科学化的政策为基础和支撑。概而言之,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绝非单一要素的线性突破而是政策、资本和场景的高效协同。

(一)政策:赋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数智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培育人形机器人产业;许多国家制定了各具特色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政策,其核心目的是赋能这一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快速发展、控制技术外溢、打造技术代差,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世界各国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来看,资金投入、研发补贴和政府管制比较常用。202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国家机器人计划3.0:机器人集成创新(NRI-3.0)》,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强调了机器人在制造业、医疗健康、农业、交通等领域的重要作用。2023年11月20日,德国发布《机器人技术研究行动计划》,以挖掘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创新潜力,将创新型机器人解决方案用于民用的安全领域。该计划特别强调设计以人为本的机器人,使其能用于手工业和服务行业;此外,还计划开发用于深海和地球观测的机器人。2024年,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重点关注协作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及AI融合应用,重点资助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医疗、农业、智慧城市和灾难响应等领域的应用。我国对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非常重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27年,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2025年8月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在该产业领域达到了世界顶端水平。

全球政策密集发力与市场的高效联动快速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的加速突破,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和产业链各环节加速协同,进而加速实现产品的迭代创新。目前人形机器人整机已具备高超的运动能力,能够完成行走、跑步、跳跃、上下楼梯等精细而复杂的动作。虽然人形机器人运动过程中断电现象时有发生,但电池技术、能源收集技术的进步不断提升其续航能力和运动体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人形机器人的“大脑”效能,使之具备理解复杂场景和内容的能力,提高了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方面,政策赋能与技术进步促使国内外上下游企业加速进入,共同催化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快速发展,加快了产业链协同,提升了产业发展速度。在全球人形机器人上游产业链中,关键零部件、人工智能芯片、运动控制算法等软硬件供应商能够有效协同;中游整机制造企业依托各自技术特色和优势加速系统集成,加快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生产;下游市场正从工业领域向民生领域扩展应用场景,诸多品牌的人形机器人在医院、酒店、物流等场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二)场景: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指出:人形机器人具备比人类更强的耐受性和适应性,能够在非结构化环境中长期以低成本运行,能有效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将在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特种作业等领域广泛应用,甚至在部分领域发挥更大

优势^[5]。所以,场景是人形机器人的生长和发展环境,有效场景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动力。目前人形机器人已扎根于工业制造与商业场景、军事与特种服务场景等领域。以场景为基础媒介,人形机器人正加速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

一是工业制造与商业场景。在数智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对人形机器人的适配性、替代性有很高的需求,人形机器人被期待成为嵌入各类社会场景、适配生产生活“全天候”节奏的劳动者,也是人类劳动的最佳“类人替代者”。人形机器人只有借用工业制造领域、商业领域作为它们的孕育和成长场景,其商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才有基础。特斯拉 Optimus、优必选 Walkers 等多款人形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广泛应用的目的在于通过合适的场景来提升其各种“类人能力”。有研究者指出,人形机器人的加入对企业组织结构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未来智能工厂由三种劳动力构成:70%的自动化设备、20%的人形机器人、10%的人类,三种劳动力协同作业将重新定义“工人”与“工厂”^[6]。在工业化向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人形机器人的“类人”能力可以改变工业社会以来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而成为数智社会的重要生产要素。在商业领域,如果人形机器人要不断向更复杂的场景拓展,就必然需要有效的、多维度的应用场景的支持。达闼 XR4、优必选等机器人已在展馆、酒店、商场中承担迎宾、讲解、咨询等任务,宇树 Unitree G1 机器人展示出了熟练的舞蹈表演能力,都得益于场景的支持而延伸了产品的实用价值和功效。

二是军事和特种服务场景。人类在增强军事防御力量时必定要快速采用新技术来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在军事领域,人形机器人正走向实战部署且在减少人员伤亡、提升作战效能、重构后勤保障和战术协同等方面体现出了明显的实效。军用人形机器人是智能化战争“机器人换人”、实现“零伤亡”的关键一环^[7]。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将开启“无人争锋”战争新纪元。基于硅基人的“躯体”优势,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极端环境的“冒险者”。美国 Robonaut2 太空机器人、俄罗斯 Fedor-850 人形机器人在极端环境、太空探索、抢险救灾等场景中成功试用,体现出了较强的示范性。极端场景中的人形机器人既可以很好地适用人类难以进入的工作环境,又替代了恶劣环境对人脆弱身体的伤害;所以,基于特殊场景来设计和训练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不可或缺的。

三是家庭服务场景。由于人形机器人作为“类人”所带来的亲近性,在养老、养生、健康护理方面人类对它们的认同远胜过其他工具,将成为老龄化社会的“刚需”。在 2025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电子学会组织遴选出“人形机器人+”十大潜力应用场景,其中“生活协助、陪伴及日常照料”是第一大应用场景^[8]。从市场需求看,面向情感陪伴、养老护理需求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如何安全、有序开放“第一大应用场景”依然是家庭服务型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的关键,也是其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 融资: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资本集聚是加速产业酝酿、分担技术转化和产业规模化发展风险的直接动力。建立投入增长机制是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把握未来主动权的必然要求^[9]。世界各国的人形机器人政策不仅赋能直接投资,还能够激发市场对这一未来产业的无限憧憬,很好地激发了投资主体的积极性。融资已经成为推进人形机器人从概念向应用加速、从产品到量产突破的“推进器”。目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融资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投资领域多元化。由于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长,投资主体不仅关注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还积极投资核心零部件、软件算法、应用服务和市场推广等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二是投资阶段前移。投资主体对人形机器人初创企业给予关注和支持,种子轮、天使轮融资和A轮系列融资占比较大。三是高效密集的融资加速了产品创新。也就是说,大量资本的涌入是人形机器人企业技术创新、市场推广、吸引人才、加速商业化落地与产业生态完善的动力源,高效密集的融资成为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北京作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的优势与挑战

据预测,2035年我国工业制造领域人形机器人市场空间或达1.6万亿元,生活服务领域人形机器人市场空间或达1.9万亿元^[10]。在我国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区域排名中北京目前处于第一方阵,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以北京为个案进行观察,从“点”的层面深入分析这一区域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剖析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逻辑理路,特别是对有效制定产业政策、消除产业风险、促进产业发展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一)北京作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的优势

在未来产业战略定位上,北京将机器人作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是一种自发行动。北京在打造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色,即坚持产业协同联动和产业生态优化同促进。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得益于目标明确的政策支持体系、高质量的场景、多元化和高额度的融资等。

第一,构建目标明确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科学高效的政策体系起着巨大的战略引导作用,既增强市场信任,又提升资本信心。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产业先导区在于对标国内外产业发展环境,不断完善自身的政策支持体系。2023年6月,《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对标国际领先人形机器人产品,支持企业和高校院所开展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攻关和工程化,加快建设北京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争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023年8月,为加快机器人技术体系创新突破、推动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北京市颁布《促进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快“机器人+”场景创新应用。2025年2月,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具身智能创新和产业培育,北京市颁布的《具身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行动计划(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技术;实现不少于100项规模化应用;支撑不少于100家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创新;培育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不少于50家,形成量产产品不少于50款;产出不少于10项国际领先的软硬件产品;量产总规模率先突破万台,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体系成为北京促进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第二,采用场景示范和产品创新双驱动策略。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产业发展都必须借助场景来实现,北京之所以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先导区与其采取的“场景示范和产品创新双驱动”的策略有关。一是遴选和编制机器人应用场景目录,对有显著示范效应的进行补贴。北京市鼓励制造企业、产业园区、医院高校、商业场所等开放应用场景;在“机器人+医疗+制造+建筑+商贸物流+养老+应急+农业”等领域打造百种应用场景示范工程;对示范作用显著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分别给予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30%、20%的补贴。二是面向特定场景创新应用样板间扩大消费应用。北京面向医疗健康、智慧养老、商贸物流、农业等特定场景需求,以“机器人+应用中心”创新应用样板间,扩大产品消费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三是根据典型应用场景创新

产品,鼓励采购消费。基于“机器人+定制模式”聚焦制造、商贸物流、农业等特定场景需求,通过“揭榜挂帅”、首购首订等方式研制面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产品;对机器人4S店、机器人餐厅和机器人酒店等新业态按照实际机器人采购金额的30%给予支持。

第三,打造“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市场化风投”的多元融资格局。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融资极为活跃,融资活动规模大、轮次密集、资金来源多元,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目前北京有人形机器人产业相关企业超300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448家、专精特新企业513家。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企业数量为1998家^[11]。从资本构成来看,形成了“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市场化风投”的多元格局。2023年以来,已有多家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融资过千万^[12]。2024年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行业融资数量达20项。2025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行业融资数量为14项,融资达20.31亿元;其中,大额融资案例比较多,6月有公司完成11亿元新一轮融资,创下国内该领域单笔融资纪录,且两年累计融资超24亿元^[13]。从融资轮次分布情况看,融资节奏明显加快,A轮及之前的轮次融资数量较多,表明该产业在迅速发展^[14]。在人形机器人产业融资过程中,产业资本、市场化风投资本的增加与政府引导基金增加有关。2024年北京新设政府投资基金扩展至8个投资领域,总规模达千亿元,支持战略性、前沿性、关键性股权融资项目^[15],凸显了首都核心产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潜力。

第四,不断推动产业园区和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产业园区具有不断聚拢辖区内人才、资金、产业、技术等资源以及优化产业创新生态的巨大功能;建设高质量产业园区有利于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而抢占产业赛道。高质量产业园区建设是促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发展、打造产业先导区的重要举措。根据《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要求,2023年8月北京在亦庄和昌平规划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其中,亦庄产业园25万平方米、昌平产业园30万平方米^[16]。在核心零部件领域,北京已汇聚了一批人形机器人上游企业,高精度减速器、伺服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产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整机集成方面,北京集聚了全国众多研发人形机器人本体的明星创企以及头部老牌整机企业。在AI大模型领域,北京占有全国8成左右的大模型独角兽企业,发布了近120项领先产品,覆盖内容生成、智能问答、IT支持、数据分析、智能识别等多场景应用。以亦庄新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为代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汇聚了100多家人形机器人生态企业,初步形成了平台集聚、企业主导、配套支撑的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在核心技术方面,高扭矩密度伺服电机、高爆发力控关节、六维力矩传感器等加速突破;在整机方面,汇童、START、CyberOne、XR-1、“天工”等人形机器人产品不断涌现。北京正是通过高质量产业园区和创新中心建设将各类资源集中起来,既形成了涵盖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应用服务等各环节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又成为世界领先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17]。

第五,提高人才链和产业链融合互动。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和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人才资源集聚是其重要的优势。2024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人才总量达210.6万人,占全市人才总量的26.2%^[18]。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支撑方面,北京还有全国重点实验室、政府投资基金以及与之配套的人工智能产业平台等优势。截至2024年末,北京有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占全国重点实验室的28.2%^[15]。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发展为北京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提供了关键支撑。

(二)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目标明确的政策支持体系、产品创新和场景示范双驱动的策略、密集高效且相对充足的融资是促进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系统动力。此外,高质量产业园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集聚也是北京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撑。然而,北京要实现人形机器人产业全球领跑,在关键技术突破、应用场景拓展、供应链配套与技术标准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关键技术突破难度依然很大。人形机器人是一种“如人”的特殊机器人。在数智时代,人形机器人产业是人类模拟自己最成功的尝试,也将面临最艰难的挑战。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软硬件方面尚存在有待突破的技术问题。在硬件方面,丝杠、轴承、传感器、电机等核心零部件需要进一步提升稳定性和可靠性,GPU 等高端计算芯片还需要一定比例的进口;灵巧操作、全身协调控制的技术还有待完善。在软件方面,人形机器人“大脑”对复杂环境感知、决策和交互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大模型、核心算法技术仍需要追赶国外领先企业。此外,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更不容易。例如,关节模组由“减速器+无框力矩电机+丝杠+传感器+编码器”构成,人形机器人快速行走需要高质量的关节模组,要突破这一关键技术难点还需要消解多方面的困境。一是谐波减速器传动速比受限使人形机器人的精度与响应速度下降。目前,世界各国谐波减速器的传动速比通常在 30 : 1 至 320 : 1 之间,不能用于传动速比小于 30 的场合。二是无框力矩电机温升控制困难使整机能效下降。无框力矩电机是人形机器人关节执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升控制困难将导致人形机器人能耗增加、使用效率下降。三是行星滚柱丝杠的技术壁垒高。国内目前行星滚柱丝杠厂商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小,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四是单一采集数据的方式影响人形机器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成为大规模量产的障碍。五是底层算法模型尚未统一,影响人形机器人的整体效率,特别是关键算法的可靠性不足,在复杂现实场景中可能让人形机器人“失灵”^[19]。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突破难度大,一些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需要进口。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姿态平衡的 IMU 传感器部件为例,进口 IMU 传感器虽然精度高,但 2 万元的单价让量产变得遥不可及^[20]。所以,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关键技术的多线条突破,才能降低产品价格,提升产品质量,这是规模化量产的关键。

第二,应用场景深度拓展局限较多。2025 年 8 月,为助力人形机器人迈向规模化生产,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业内首个“千台机器人真实场景数据采集计划”——通过搭建远程遥控操作中心,让千台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深入工厂车间、物流仓储、酒店商超等真实场景,在执行实际作业任务的同时持续采集交互数据。尽管如此,北京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的进一步拓展依然相对困难。一是工业场景有限。北京是以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超大型城市,传统制造业规模小,在工业领域或制造业场景中应用人形机器人相对有限。二是医疗领域应用场景开放不足。尽管医疗领域对人形机器人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医疗机器人研发与认证门槛高、伦理和安全监管都很严格。此外,根据现有法律制度,医疗领域人形机器人如出现事故责任,设计者、制造者、所有者之间缺乏清晰的责任划分和责任认定,因此人形机器人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深度合作推广较慢。三是家庭场景拓展困难。当人形机器人大量生产并深入生产生活各环节后,在人们身边犹如存在一个行走的“数据收集器”,特别是家庭场景对机器人的功能多样性和用户体验要求较高,且存在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等挑战,由此引发的安全风险不可忽视。然而,现

有技术和安全要求尚未满足家庭场景扩大开放的条件。四是特种应用场景亟待深度探索。例如,我国地下空间类型多、面积大、空间广,但促进人形机器人在地下空间高效行动,既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更依赖这些特殊场景的开放与应用。

第三,区域供应链配套与软硬件技术标准不够统一。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布局方面,京津冀有诸多协同。由于京津冀地区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与长三角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天津和河北在承接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外溢能力方面还有待提升。目前存在京津冀地区产业链配套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研发、生产、制造成本较高以及技术迭代时效性较弱等问题。例如,一些企业的机器人设计总部在北京,但六维力传感器、柔性仿生电子皮肤、芯片、微型电机及驱动系统、减速器等零部件供应商多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中游集成与组装、规模化生产则落地中部地区。此外,在人形机器人商业化量产过程中,技术标准的统一是降低产品成本、提升量产的关键步骤。目前,人形机器人软硬件技术标准不统一,每个具体动作都需要单独开发和调校相应算法模型,不同组件或子系统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不强,影响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效益。当然,人形机器人产业庞大、整机需要的零部件非常多,且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都很高,因此以政策赋能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就非常重要。

第四,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从全球布局看,世界各国都在控制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外溢,形成技术代差,从而试图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市场竞争来看,处于产业化初期的人形机器人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尚未完全稳定,但全球科技巨头、初创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在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竞争态势在加速演变。目前,全球已形成一批技术领先、具有明显优势的头部企业。例如,美国在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德国、英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积累延伸至人形机器人尤其是高端制造和医疗领域;日本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需求方面有一定优势。目前,北京在人形机器人设计、动力驱动、感知、控制、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环节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凭借政策、融资和市场需求的支撑,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生产和应用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在“十五五”时期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条件下,我国要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设计科学的发展进路。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进路

人形机器人是未来产业的“明珠”。“十五五”时期,我国正在加速布局未来产业,促进人形机器人高质量发展是其中的关键一环。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一高五难”,即门槛高、软件算法难、软硬解耦难、知识积累难、人才聚集难、安全应用难^[21]。思考“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科学进路,有必要分析当下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理念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设计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科学进路,必须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既要设计科学的发展战略,又要着眼有可行性的现实路径。

(一)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三个理念

当下关于人形机器人发展的理念主要有三种,即通用适配论、本能亲近论和市场非理性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充分考虑这三类理念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形成的困境。

其一,通用适配论。该理论认为,“人形”不只是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格式”,更是一种实质

追求。通用适配论者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在他们看来,“人形”之所以是机器人的必要外形,其重要假设前提是“世界是人类设计的,世界是为人类设计的”。本质上,人形机器人是机器,是生产工具,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制造为“人形”是为了赋予其人类的自主性、人类智慧及其行为模式,有利于让它们更好地去改善和服务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通用适配论者将机器人作为“人形”的目的是让其通用于人类的社会环境;因为只有设计跟自己一样的“类人”,才能使之通用于既有环境。例如,在工业场景中,人形机器人的“人形”有利于适配工业化过程中留下来的工厂及其工位大小、操作方式、空间布局、生产线等^[22]。在军事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可以通过眼、脑、手、腿密切协同,集感知智能、决策智能和运动智能于一体,代替士兵在非结构化场景中完成复杂精细、离散化、多样化的任务^[7],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在通用适配论者看来,按照人类的模样去打造人形机器人是它们适用环境的“最优解”,符合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

其二,本能亲近论。具有生育、繁殖能力的人类一直有“造人”的欲望,或者说,“造人”就是人类的本能。在社会世界,画画与雕塑、基因编辑都蕴含着人类“造人”的能力和欲望,而制造人形机器人是数智时代人类最靠近自己愿望的一次最真实、最刺激的实验。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我认同根深蒂固,本能亲近论者对这种最接近自己的“类人”展现了本能的亲近和极端的热情,“人形”作为技术格式因此有天然优势。在本能亲近论者看来,人类之所以要制造人形机器人,是希望它们具有人类的外形特征、行动能力,能够展现出人类的形态、神态和行为。人形机器人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因技术格式的优势而获得特殊亲近,进而与其他工具有着本质不同。因此,本能亲近论者非常看重其“人形”。在他们看来,如果人类真的制造出了如同人一样用双足行走、用双手劳动、用大脑思考、可以自主决策的人形机器人来替代人类的劳动、参与人类活动,那么便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情感亲近。

其三,市场非理性论。人类行为虽具有理性但很多时候又是非理性的,市场也经常体现非理性。对于“为什么是人形机器人”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答案是:“原因很简单,喜欢人形机器人的比不喜欢的人多,这是最主要的。”^[23]市场非理性论与本能亲近论相关。从“结构—功能”思维来分析,人形机器人之所以赋予“人形+人行+人智”的特征,是希望它们既可以替代人类劳动又可以为人类提供情绪价值;既得到人类亲近,又获得市场份额。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宇树人形机器人“跳舞”的场景给世界各国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唤醒了人类的非理性情感,带火了人形机器人。在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8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21个主体赛项和5个外围赛项。其中,主娱乐性比赛有100米、400米、1500米、立定跳远、自由体操、足球5V5等竞技赛,还有单机舞蹈、群体舞蹈、武术等表演赛。其实,当下作为“钢铁伙伴”的机器人真正智能、自主地干活还不太现实,除非是一些固定的工序^[24]。然而,作为群体动物的人类有与同类娱乐的密切需求,人形机器人的情绪价值与娱乐功能既可以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又可以匹配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满足人类感官需求与精神需要最好的“替代者”。从市场视角来看,各类企业应用人形机器人这种“类人”来娱乐、获取流量,形成广告效应,既可以检验、丰富场景适用性,也是实现产业价值的方式之一。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进路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人形机器人是我国培育未来产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发展理念上,既要避免通用适配论所带来的功利性——过于追求“产业价值”,更要避免本能亲近论

和市场非理性论带来的市场狂热——过于追求“人形”。在战略设计层面,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因地制宜做好顶层设计,以政策为核心动力,引导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

其一,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与工业时代的产业发展不同,智能时代的技术突破、产业发展与风险积累是同步的。在发展路径上,基于“人形+人行+人智”的产业复杂性,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配套体系欠缺、科技伦理与产业安全等诸多挑战^[25]。进一步而言,人形机器人产业不仅存在科技安全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而且有隐私泄露风险、责任风险、伦理风险等。这些安全风险都会对产业发展、社会秩序甚至人类生存带来挑战。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安全治理是联系在一起的。毕竟,作为协同主体,人类会以自身的需求和条件要求人形机器人获得社会认可、避免社会不适,要求其行为模式符合社会规范。“十五五”时期,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的安全理念和行动原则。具体而言,我国既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放在未来产业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因为这个产业的特殊性而不去发展或不敢发展;又要人形机器人安全治理放在产业发展的第一位置,不能因为发展而忽略安全治理。

其二,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促进央地政策高效协同。发展未来产业是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超车换道”、引领社会变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次重大机遇。人形机器人强国都在因地制宜打造产业特色。日本打造养老机器人产业、德国打造工业机器人产业、俄罗斯打造特种机器人产业都应用了因地制宜的策略。“十五五”时期,我国要把握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优势,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充分利用本土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线,更要避免一哄而上、内卷式发展、同质化发展。有学者指出,发展未来产业要调整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基本格局,实施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通过支持市场竞争实现技术瓶颈突破,引导企业和市场主动尝试和选择未来产业赛道^[25]。“十五五”时期是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重要阶段,高质量发展这一产业,既要处理好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只有因地制宜促进央地政策高效协同,才能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打造可行商业模式,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三,以政策动力为核心,引导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十五五”时期,我国要以高质量的政策引导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户以及场景主体协同探索多元技术路径,促进这一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一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要加强核心组件和零部件关键技术的协同研发,提升传感器、芯片、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水平;二是要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面向具体应用场景协同攻关,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三是围绕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需求,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布局创新链,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十五五”时期,我国在设计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时,要以政策动力为核心,着重从标准化体系建设、场景拓展、促进产业体系协同和全球品牌建设四个层面进行。

其一,进一步推动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标准化建设促进产业化发展。产业标准化既是工业社会产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数智社会未来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形机器人涉及高端芯片、高端装备、高端电池、高端大模型、高端算力算法等先进技术,产业链长,涉及很多复杂

的工作。数据是人形机器人“聪明”的基础,高质量标准化数据集与专业场景的匮乏是当前机器人还“不够聪明”的核心痛点^[26]。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量产瓶颈与商业化落地的双重考验,通过技术标准的统一来控制成本是促进人形机器人量产的重要一环。尽管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早期技术的标准化相对困难,但制定科学、完备的标准是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在国内层面,我国既要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标准研究、制定和应用,更要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要通过“技术创新—标准制定—生态建构”的路径,建立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提升我国在人形机器人国际化标准体系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促进应用场景开放,深耕产业发展的场景基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突破、产品形成、产品迭代、量产突破、产业规模化都离不开场景。“十五五”时期,我国要将持续促进应用场景开放、提高场景应用效率作为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一是以政策动力促进各类应用场景进一步开放。政策是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强化应用场景开放要以政策来引导,才能促进养老、医疗和家庭服务等场景合规、有效的开放。二是要以高质量的政策工具鼓励企业与相关机构合作拓展人形机器人在太空探索、灾难救援等特殊场景中的高效应用。三是以首购资金补偿政策对开拓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效果好的企业提供补贴;同时,促进用户积极消费人形机器人,从而拓展各类产业应用场景。

其三,引导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十五五”时期,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应是几家巨头的技术秀场,而应是全产业链的生态共建。唯有如此,人形机器人产业才能真正成为驱动社会进步的“新质生产力”^[2]。“十五五”时期,我国要以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为契机,积极推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部件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供应链体系,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和自主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促进北京、广州、浙江、江苏等先导区打造高质量的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国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要依托北京、上海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吸引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企业集聚,引导创新要素汇聚并通过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来加快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此外,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和应用有很多风险,要鼓励保险机构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提供各类保险产品,降低产品、产业和产能的落地风险。

其四,强化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世界品牌。“十五五”时期,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强国必然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我国应加快人形机器人领域国际合作,打造人形机器人的世界品牌。一是鼓励我国头部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既推动技术突破又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声誉;二是鼓励企业加入 ISO/TC 299 机器人技术委员会等国际标准组织,积极参与制定人形机器人的安全标准、性能标准等国际标准,争取在各类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三是建立人形机器人国际产业联盟,促进国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全球性影响;四是抓住产业窗口期,通过举办或参与国际展会、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形机器人赛事,推广我国人形机器人产品和技术,扩大国际影响力,打造全球品牌。

四、结语

人形机器人是未来产业的支柱,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政策、资本、

场景的高效协同,而非任何单一要素的线性突破。北京之所以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先导区,除了这三种要素作用外,高质量的产业园区和优秀人才资源也起了重要支撑作用。世界各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或多或少要受通用适配论、本能亲近论和市场非理性论的影响。“十五五”时期,促进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设计科学有效的战略进路和实践进路;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要充分协调央地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造可行商业模式;要以政策为核心动力,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要引导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此外,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要“领跑全球”的关键一步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全球影响力,打造世界品牌。我们正在步入数智社会,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新型社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具有人类外形、情感、形态且可能超越人类智力、行动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新人”。理论界和实践界都不能忽略这类“新人”融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之中所带来的功效和风险,对人形机器人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时代性课题。

参考文献:

- [1] 贾丽. 人形机器人成资本宠儿 量产及商业化难题待解[N]. 证券日报, 2025-07-29.
- [2] 贾丽. 让人形机器人实现从“钢铁伙伴”到“产业支柱”的跨越[N]. 证券日报, 2025-08-07.
- [3] 徐程浩, 王耀南, 莫洋, 等. 人形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25(1): 150-167.
- [4] 曾宪奎. 探索推动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模式[J]. 当代经济管理, 2025(7): 47-55.
-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EB/OL]. (2025-01-15).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412/t20241227_649391.htm.
- [6] 孙明华, 王继勇, 董雷高, 等. 未来制造[J]. 国企管理, 2024(8): 32-34.
- [7] 袁艺, 马也, 岳师光. 人形机器人: 军事智能化新增长极[EB/OL]. (2025-07-10). <http://www.xinhuanet.com/milpro/20250710/47f7a7b22ae44725884fb04195bd3461/c.html>.
- [8] 赵曦, 唐瑞. 从协助到陪伴、从照料到提供情绪价值 养老机器人产品形态日益丰富[N]. 消费日报, 2025-08-25.
- [9] 刘华军, 史浩琰.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人文杂志, 2025(3): 24-34.
- [10] 郭倩. 技术创新资本涌入 人形机器人场景加速落地[N]. 经济参考报, 2025-08-11.
- [11] 穆晓菲. 北京市人形机器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机会[R]. 北京: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25-08-04.
- [12] 吕丹. 未来可期: 人形机器人数据分析报告[J]. 中关村, 2025(5): 18-21.
- [13] 孙奇茹. 加速具身智能产业化突破, 海淀这家企业融资 11 亿元[N]. 北京日报, 2025-06-24.
- [14] 我国人形机器人股权融资 50 城[J]. 深圳特区科技, 2025(2): 80-83.
- [15] 北京市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3-20).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503/t20250320_4039431.html
- [16] 刘苏雅. 北京规划“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园[N]. 北京日报, 2023-08-22.
- [17] 王伟. 人形机器人四大创新中心如何“抓重点”[N]. 中国电子报, 2025-08-05.
- [18] 武红利. 北京人才总量全国城市第一[N]. 北京日报, 2024-12-22.
- [19] 毛艺融, 贾丽. 越过“四重门” 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进化中[N]. 证券日报, 2025-08-07.
- [20] 殷泽昊, 董思辰. 机器之心亦吾心——走近专注机器人研发的青年人[N]. 光明日报, 2025-09-02.
- [21] 彭新. 探访世界机器人大会: “一高五难”的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N].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5-08-11.

- [22] 赵云帆.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变与不变:人形机器人将从“演员”变“同事”[N]. 21世纪经济报道,2025-08-12.
- [23] 窦皓. 保持开放的心态看待起伏,对未来抱有更大信心——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访谈[N]. 人民日报,2025-08-13.
- [24] 王婧涵,安妮. 宇树科技 CEO 王兴兴:具身智能模型还未到突破临界点[N]. 中国证券报,2025-08-11.
- [25] 刘志彪,孙瑞东. “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问题、挑战及对策建议[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17-30.
- [26] 解敏. 机器人“我国标准”从这里起跑 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具身智能“数据+认证”双引擎[N]. 新民晚报,2025-03-10.

Basic Logic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Approach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XIE Xinshui¹, TONG Zhou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6,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humanoid robot industry's development stem from its product features of humanoid, human-walking and human-intelligence. They also come from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complex risks arising from the expectation that robots will fully replace human labor and integrate into human lif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China, America, Japa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oos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The key lies in th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policy, capital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jing is a pioneering area for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is field stems from multiple strengths, including a clear policy framework,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financing support, diverse scenario expansion, high-quality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and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is a key component of future industries. Humanoid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format, but also a substantive requiremen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one high and five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aim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It needs to avoid both the utilitarianism driven by the general adaptation theory and the frenzy caused by the instinctive affinity theory and irrational market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governance of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are insepar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of China's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we need to formulate clear strategic approaches. Meanwhile, desig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paths.

Key words: the humanoid robot, industry development, future industry,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责任编辑:陈卓 金华宝

引用格式:陈水生,江沛霖.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与有效监管[J].探索,2026(1):112-124.

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与有效监管

陈水生,江沛霖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形机器人已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制造、特种作业、公共安全和民生服务等领域,催生了技术异化、社会失序与伦理道德失范等复合风险,这些风险呈现出负向涌现性、跨域耦合性、时空溢散性和自反性特征。为有效应对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可从以下方面加强监管:以动态适应性为监管理念,构建兼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灵活性与韧性的新型监管模式;以“技术训练—原型开发—规模应用”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为支撑,明确各环节风险防控标准与权责边界;以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监管机制为保障,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多方治理力量。以上规制路径可为人形机器人的创新发展、规模应用与风险规制提供有效监管方案,为推动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控与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风险社会;复合风险;动态适应性监管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112-13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化,人工智能技术正从虚拟数据空间向物理实体空间延伸。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指出:“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将深刻变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发展格局。”2024年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人形机器人标准化白皮书》将人形机器人定义为“外观和行为与人类相似,具有部分或全部人类特征的机器人”^[1]。人形机器人正逐步突破实验室场景,进入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家庭服务、医疗护理、应急管理等领域。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作为兼具智能算法与类人形态的复合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具身智能领域的高阶应用。传统人工智能多为无实体的虚拟智能体和专用化的物理智能体,与物理世界交互边界清晰、场景固定,而人形机器人作为多模态 AI 技术与类人躯体的集成体,同时兼具基于大模型的认知决策、基于运动控制算法的躯体执行以及基于多传感器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在复杂开放场景中自主行动。同时,人形机器人的社会交互属性、类人特征与自主决策能力共同塑造了全新的人机互动形式。人形机器人技术架构的复合性、行动场景的开放性与交互模式的社会性构成了其与传统人工智能的本质差异。

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特性与人类社会的深度耦合催生了多维复合风险,衍生出伦理困境、社会冲击、责任边界模糊以及网络安全威胁等问题,传统的

作者简介:陈水生,男,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沛霖,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监管模式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提供有效的规制手段。当前,全球范围内对人形机器人的监管框架仍处于探索阶段。美国、欧盟等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或制定专项政策尝试规范技术应用,但普遍面临技术迭代快于法规更新、监管主体责任界定模糊、技术伦理标准缺失等挑战。中国虽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但针对人形机器人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亟需加强系统性研究并构建适配治理需求与技术特性的监管框架。

目前学界关于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主题比较多元且分散,主要从计算机科学、法学、物理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和多维度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应用及其监管展开研究。

一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与应用历程。人形机器人具有拟人智能、类人形态和耐受适应三个特点,按具体应用场景和主要功能可分为特种作业型、工业型、医疗型、教育型、公共服务型等类型^[2]。目前,人形机器人正从“形态仿生”走向“具身智能”,发展路径呈现出“一脑多形、场景定义形态”的新趋势^[3]。具身智能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了传统人工智能的具身化转向。所谓具身智能,是指一种能够通过物理形态感知环境、进行智能决策并执行相应行动的机器人或智能体^[4]。人工智能的具身化使人工智能系统与物理世界直接交互,将感知、认知和行动结合起来,不再局限于虚拟的代码空间,实现拟人化的感知、理解与行动能力^[5]。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理想载体和典型形式,具有高度仿生的外观和日益智能化的行为模式^[6],能够集成先进的传感器、执行器和人工智能算法来执行复杂任务,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7]。

二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风险与挑战。现有文献从伦理规范、法律法规、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探讨。在伦理规范层面,人形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训练与实时交互实现了智能化,但算法滥用易导致隐私侵犯与决策偏差问题^[8],其训练与使用过程潜藏着数据控制安全与数据利用的双重风险^[3];人形机器人的算法可能隐含设计者的价值观偏见,因训练数据偏差而歧视或限制服务特定人群^[9]。在法律法规层面,现行法律体系未赋予机器人法律责任主体资格,强调服务提供者的保证人地位,但“算法黑箱”导致的不可解释性往往使因果关系认定困难^[10];人工智能自主决策能力引发的社会信任与责任归属问题尤为突出^[11];通用基础大模型技术是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目前针对大模型技术训练引发的新型风险,传统规制手段存在立法错位与覆盖不足的问题^[12]。在技术层面,已有研究主要对机器人的技术挑战、大模型可靠性以及人机交互过程展开研究^[13];机器人在公共场所运行时可能因系统延迟或传感器短板而出现失控行为,对公众造成伤害^[14];或因软件漏洞产生不可预测的动作和物理碰撞风险,破坏周围环境^[7]。

三是人形机器人的监管与规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监管模式与规制路径等方面,并针对既有风险提出治理建议。人形机器人作为伦理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的权利对象,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制,有学者提出“试验性规制”的监管方式,主张通过监管沙盒工具平衡人形机器人的创新发展与风险问题^[15];针对人形机器人的隐私风险,有学者提出加强人工智能立法中的数据保护,完善监管机构对设计者的问责机制^[16]。

尽管现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值得拓展的空间:其一,目前对人形机器人风险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如技术安全、伦理规范或法律责任等,缺乏对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复合风险的系统性阐释,尚未深入剖析人形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的多维复合风险样态与实践特性;其二,对人形机器人复合风险的规制研究尚处于概念论证阶段,缺少与中国应用情景、产业发展及治理体系相适配的系统性、可操作性的监管方案。为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

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会引发哪些复合风险,这些风险呈现出哪些样态与特性,如何有效规制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并形成安全可控与可持续发展的监管体系。

二、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迭代与应用图景

人工智能的具身化标志着 AI 从虚拟数据空间向物理实体空间跨越,具身智能体正经历从“机械执行者”到“智能决策者”的过渡阶段。人形机器人作为新一代智能体的典型代表,集成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型材料等先进技术,已突破传统机器人的场景局限,从结构化场景向非结构化场景延伸,开始与人类共享物理空间并承担复杂任务,从单一操作向多模态交互拓展。

(一)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阶段及其技术迭代

人形机器人技术历经“机械仿生—感知集成—智能决策”三个阶段,经历了从机械结构设计到集成人工智能技术的漫长探索^[17]。20世纪7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加藤一郎教授研发的“WABOT-1”是世界上第一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是人形机器人研究的早期尝试。然而,受限于计算能力和传感技术,机械仿生阶段的机器人智能水平相对较低,主要依赖预设程序执行任务,只能进行简单的肢体活动和人机对话。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形机器人逐渐过渡到感知集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机器人开始装备各类传感器以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从而实现更为自然的人机交互^[3]。传感器技术的引入使人形机器人能够捕捉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些传感器犹如机器人的“五官”,为其提供了感知外部世界的窗口,极大地拓展了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与功能多样性。

现阶段,随着大语言模型、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为人形机器人提供了强大的“大脑”,人形机器人开始具备从数据中学习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完成诸如动态路径规划、复杂任务调度等高阶操作,实现更加复杂的行为模式。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在人机协同与共融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自主决策、情感识别、环境感知等方面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人形机器人能够实现与人类的无缝对话,理解并回应复杂指令。当下,人形机器人融合了人工智能、仿生学、材料科学及精密制造,通过物理形态与环境的交互,实现感知、决策与行动的闭环,展现出高度拟人化与自主性特征。可以预见,未来人形机器人将深刻改变社会形态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向不同应用场景需求,进化出更加多元化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

(二)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及其效用

随着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与政策红利的叠加,人形机器人逐渐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场景。尽管受到技术、硬件成本高昂等条件限制,人形机器人的场景泛化能力还稍显不足,但在示范化应用场景方面,人形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了以工业制造、特种作业、公共安全和民生服务为核心的四大应用领域,呈现出从专业领域向日常生活不断拓展的发展态势。

其一,在工业制造领域,技术突破推动工业机器人向多模态协同方向发展,工业机器人成为推动工业智能化、自动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视觉感知、动态路径规划等创新技术,人形机器人已实现高效精准作业,逐步承担起工业生产领域的关键任务。在汽车制造中,人形机器人的机械臂可高精度装配零部件,大幅提升焊接质量与效率。在智慧物流领域,人形机器人通过视觉识别与多模态协同算法,实现了复杂环境中的实时避障与最优路径规划,并降低了安全、效率

及运营成本。工业机器人正从单一工序执行向全流程多任务协同演进,为工业制造提供了动能。

其二,在特种作业领域,人形机器人能够在危险、极端环境中运行,用于执行巡逻巡检、危险作业等特种任务。在安防巡逻领域,人形机器人能够执行简单的任务。在矿山智能化场景中,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已开始替代高危岗位工人,大幅降低井下作业风险。在电力巡检中,传统人工巡检效率低、风险高,电力特种人形机器人可在极端环境下精准找到故障点。人形机器人凭借灵巧机械臂和双足结构,能操作检测设备、适应复杂环境,大幅提升巡检效能。未来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其三,在公共安全领域,人形机器人凭借耐极端环境、精准操作及远程协同能力,通过远程控制 and 智能化决策,已实现初步落地应用。目前,人形机器人能够在高污染、高辐射的恶劣环境下进行工作,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并提升处置效率,成为应对高危场景的关键补充力量。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中,灾害处理机器人和救援机器人被用于核反应堆建筑灾害事故,由机器人进入高辐射区域,完成监控与辐射水平检测工作。美国一家公司设计的人形机器人可以将处于危险情境中的人们抱出,由于运用了动态平衡技术,它能长时间保持上身直立的负重姿态,避免因剧烈颠簸对伤员造成二次伤害。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的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行动能力将持续提升,未来有望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更精准、自主的作业,实现在公共安全领域更广泛的应用,成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

其四,人形机器人在民生服务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多为示范性验证。从供给端来看,人形机器人在医疗康养、家庭服务、政务服务等领域逐步落地应用。在医疗康养领域,傅利叶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具有高度仿生的躯干构型和拟人的运动控制系统,已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傅利叶智能康复港”用于康复训练。在家庭服务领域,日本索尼公司研发的护理机器人可实现儿童与老人的照护和居家陪伴。在政务服务领域,人形机器人目前主要应用于政务大厅和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以提供信息导览、路线引导等初级服务为主。未来,人形机器人有望打破传统工业机器人的“孤岛模式”,具备更强的感知与智能交互能力,实现在医疗手术、家庭护理等高交互场景的人机协作与融合^[18]。

三、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

人形机器人具有“动态感知—自主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在发展应用中易催生人类主体与机器主体间的多重风险。同时,相比其他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对智能感知、运动控制、智能决策、人机交互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19],兼具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风险,若单纯讨论机器人或人工智能风险可能会陷入片面的误区^[20]。因此,可以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剖析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带来的复合风险及其表征,在此基础上总结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风险特性。

(一) 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引入

风险社会理论由乌尔里希·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风险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贝克的基础上,安东尼·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提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21]。该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技术理性扩张与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强所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强调现代社会已从“工业社会”转向以“人为不确定性”为

主导的“风险社会”^[22],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主导的工业文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人造风险”^[23]。关于风险社会特征的论述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

其一,风险社会的风险本质是“被制造风险”的普遍化,吉登斯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与“被制造风险”^{[24]20-23}。前者是源于外部、自然或传统社会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后者则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深度干预。此类风险超越传统自然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和跨领域传导性。

其二,风险的规模与程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显著扩增趋势。现代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预测性、突发性和迅速扩散性等特征,技术的扩张与全球化网络的形成使得风险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与时间界限,从局部性、偶发性威胁演变为系统性、全球性危机。风险的影响半径已覆盖跨国界甚至跨代际范畴,其破坏烈度远超工业文明初期的自然风险。这种风险的“脱域化”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的弥散性,也表现为时间维度的延展性。

其三,风险社会的系统性与复杂性。现代社会的风险网络复杂且多元^[25],需要从社会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出发进行全面治理。技术、制度与文化的高度复合使风险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通过社会系统网络扩散,向系统性风险和多重风险转变^[26]。现代风险并非单一技术或制度失效的线性产物,而是技术系统、社会结构、文化认知等多重因素非线性互动的衍生结果。这种复合性进一步表现为原生风险与次生风险的嵌套叠加。风险的复杂性不仅挑战了传统因果解释框架,也使治理主体在风险识别与责任归因层面陷入认知与制度的双重困境。

其四,风险社会的生成源于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强调技术进步的双重性,即技术既推动社会演进,又因其副作用解构既有秩序。风险社会理论是在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兴起的,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既批判现代性,又试图通过自反性现代化重构其合理性^{[27]4-9}。风险社会理论以现代性发展为切入点,认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现代性的特有后果^{[28]15-16}。

(二)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及其表征

传统社会中的风险多源于自然因素或个体行为,具有较强的局部性与可预测性,而现代社会的风险则主要由科技进步、工业化、全球化和极端环境等多重因素引发,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潜在的巨大破坏性。一方面,人形机器人作为现代科技高度集成的产物,是人类主动探索与创新的结果,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风险,这种风险并非自然产生,而是源于人类在追求技术进步过程中对复杂技术系统的构建与运用,充分体现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人为制造特性;另一方面,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和应用带来了技术、社会、伦理和法律等多维度的复杂风险。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性质、来源与影响范围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异化风险。人形机器人高度依赖传感器融合、算法决策与执行系统的协同运作,其物理行动能力与网络互联性使技术风险呈现“双维叠加”特征。其一,人形机器人功能复杂,依赖多种技术协同,机械、电子或软件故障都可能引发其功能失控,鉴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的高交互性,一旦功能失常,易造成人身安全风险。当人工智能算法在复杂环境中产生不可解释的输出,机器人可能执行“非预期但高风险”的动作,引发安全事故。尤其在公共安全领域,有可能延误救援时机,进一步放大风险。其二,目前人形机器人自主操作能力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原始

数据处理、多模态信息融合、信息推断决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欠缺^[29]。其三,人形机器人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和传感器融合技术,能够模仿和学习人类技能。人形机器人基于算法处理信息,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加剧了决策失控的可能性。在复杂环境中,人形机器人若接收到意外算法输入,可能因算法失控而产生异常行为模式,偏离设计目标。其四,人形机器人依赖大量数据运行,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会实时采集和处理大量个人信息,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若数据存储与传输环节存在漏洞,可能遭受恶意攻击而产生数据篡改风险。

第二,社会失序风险。人工智能的具身化意味着 AI 从代码塑造的虚拟空间进入更为复杂的现实世界,在物理维度实现人机共生。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会重构社会结构与行为规范。一方面,随着具身智能高级形态的逐步迭代,人形机器人的通用性与专用性会不断提升,高度智能化和自主性的特性使其能够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众多领域替代人类劳动,进而导致大量低技能岗位消失,冲击社会的产业结构和分工模式,引发社会稳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人形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投入,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加剧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第三,伦理道德风险。其一,人形机器人的决策系统依赖算法和数据,可能受开发者和训练数据中潜在的人类偏见与价值观影响,从而在行为和决策中表现出不公平和歧视等问题,引发算法偏见与伦理风险。其二,人形机器人的高度拟人化外观和交互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关系模式,易引发社会价值异化^[30]。在家庭场景中,老人和儿童可能模糊机器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认知,产生对机器人过度的情感依赖、信任或认同,存在过度拟人化风险^[31]。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虚拟化互动减少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频率和互动范围,削弱了人的互动欲望和选择能力。其三,人形机器人智能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会对人类的主体地位产生影响。人形机器人通过高度拟人化外观、智能表象和情感模拟等,能够对人类个体的选择、情感、心理状态进行潜在的操纵,进而影响人的自主性和伦理观念等^[32]。在传统伦理观念里,机器始终是人类的附属品,当人工智能发展到高度智能化阶段,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对人类进行有意的误导,在价值偏差下“操纵”人类,影响人类的决策,甚至转变为束缚、排斥或奴役人的力量。

第四,责任伦理与监管风险。其一,在责任归属上,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涉及开发者、运营商、用户等多方主体,传统法律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多主体交互情境与技术因果链条,可能陷入多元主体协作下的责任界定困境。其二,人形机器人的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尚不完善,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的问题。其三,人形机器人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应用场景和功能不断涌现,监管政策和法规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难以及时覆盖和有效应对新出现的风险问题,如具身智能技术模糊性带来的责任伦理划分问题。人形机器人在技术标准、安全标准、伦理标准和数据标准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范和认证体系,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使监管缺乏明确的依据和尺度。

(三)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风险特性

作为深度融入社会系统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复杂技术架构与多元社会互动的有机耦合,其在发展应用中产生的风险问题折射了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技术理性扩张与社会系统复杂性失衡的深层矛盾。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风险特性提供了独特视角。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风险社会特征,本文提炼了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四大风

险特性,构成了风险的生成、影响、扩散、演化的逻辑链条。负向涌现性是风险的生成起点,跨域耦合性、时空溢散性、自反性分别体现了风险的影响范围、扩散机制与演化逻辑。

第一,风险的负向涌现性。涌现是指复杂系统自组织过程中量的变化导致行为发生质的变化,进而产生的新颖而连贯的结构、模式和性质。涌现性强调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通过非线性交互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征,进而呈现成分流动、模式稳定的动态平衡^[33]245-248。系统中涌现出的模式与功能并非固有,而是由所处环境及与其他模式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人形机器人作为由硬件、算法、数据、环境以及人类交互构成的复杂系统,智能系统在无明确指令下,各要素的局部、微小偏差可能产生违背设计初衷的负向功能,涌现超出各要素单独作用总和的负面风险。一方面,深度学习算法赋予人形机器人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通过神经网络从海量交互数据中提取特征、优化决策模型,在应用过程中产生“自进化性”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通过持续学习、自我反馈和能力更新,突破原有设计边界,初始微小的算法偏差可能在机器人的持续交互中自我强化,最终突破安全阈值。另一方面,跨模态交互技术赋予人形机器人理解复杂指令、融合多维度信息的能力,当多台机器人在共享云端模型中同步更新时,某一区域机器人的决策可能通过云端系统扩散,形成跨地域的系统性偏差。这些负向功能并非开发者预设,却在复杂交互中“涌现”并自我强化。在风险社会情境下,人形机器人应用风险的负向涌现性体现为系统交互中产生的未预期、破坏性的风险结果,是技术组件、环境变量与社会互动等多要素非线性耦合的产物,体现了风险由“人为不确定性”向“系统性危害”的转化逻辑。

第二,风险的跨域耦合性。人形机器人通常嵌入复杂的系统中,与人类社会的其他部分相互关联。跨域耦合性是指在复杂系统中,技术、社会、伦理、法律等风险的跨域交织,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的方式相互影响,导致整体风险水平超过单一风险简单叠加的结果。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与人为性特征,人形机器人的应用风险正是这种特征的现实映射。人形机器人作为高度复杂的技术集成体,既承载物理世界的行动能力,又依赖虚拟空间的智能算法,同时深度嵌入人类社会运行体系,通过物理实体与现实世界直接交互,使网络运行从虚拟空间延伸至物理领域,导致技术、社会、伦理等领域的风险边界模糊化,形成“虚实风险”叠加。具体而言,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存在着风险扩散的耦合效应,单一维度的风险通过技术、社会、制度等系统的复合作用,可触发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多种风险因素相互作用后形成了错综复杂、多元交织的风险网络,进而加剧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非加和性”使其危害程度与影响范围远超单一风险的简单叠加,且难以进行提前预判或溯源,不仅需要技术的规范性治理,还需从伦理和法律层面加以统筹和协调,风险的治理难度随之提升。

第三,风险的时空溢散性。风险的时空溢散性表现为风险跨越时空边界的持续外溢与放大效应,其本质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网络的深度交织所引发的“脱域化”后果。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原本依赖地域性、情境化的“在场互动”中脱离,跨越时空重构。这种脱域机制是现代社会的重大特征,也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风险社会,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应用风险往往通过脱域机制进行扩散,这种特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形成双重传导机制,使得风险的破坏力远超传统技术风险,最终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扩散效应。其一,在时间维度,人形机器人的风险具有滞后性和代际累积性,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速度快,而风险显现往往延迟。例如,人形机器人依赖大语言模型进行自主决策,但其“算法黑箱”特性导致决策逻辑难以溯源,数据偏

见或算法缺陷问题可能在技术应用后才显现,形成“技术应用在前、风险显现在后”的滞后效应。此外,社会化交互风险可能代际累积,情感交互型机器人可能引发用户的过度依赖,导致用户的现实社交能力退化^[34]。这种影响可能在人形机器人长期应用后才逐渐显现,甚至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社交模式和社会关系结构。其二,在空间维度,现代风险自其诞生伊始便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由于人工智能在数据获取与处理中依赖的数据源涵盖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内容,模型训练与生成结果也会引发全球化的影响^[35]。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云计算等技术在人形机器人中的融合应用,人形机器人作为数据载体,容易引发跨地域性风险,其应用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而是通过跨国界的数字网络和供应链进行传播。例如,技术漏洞或数据泄露可能通过全球网络迅速扩散,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风险的自反性。自反性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自我对抗的逻辑,它意指现代化进程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后,其自身基础反过来成为被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动摇了现代性赖以建立的根基^[36]。风险本身具有一种反向作用的特性,风险的自反性体现在风险对自身条件的反噬,进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技术发展在突破既有边界、解决传统问题的同时,其内生性矛盾也会催生新型风险。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不断消解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算法黑箱”、责任模糊等弊端易引发风险再生产的循环,最终导致跨领域、跨层级的风险繁殖。另一方面,具身智能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变革社会的工具,使他们能够在数字与物理世界的交互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向更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37]。技术应用产生的风险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技术发展的边界与规范,倒逼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完善。作为具身智能体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高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与跨模态交互系统,所带来的风险不再仅仅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技术故障或算法偏差引发的安全问题和伦理困境也会推动技术改进和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完善。人形机器人风险的自反性表明,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的风险和问题,还要反思技术发展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等因素。

四、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复合风险的有效规制

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的复合风险兼具系统性与复杂性,涵盖技术、社会、伦理和法律等多个层面,具有负向涌现性、跨域耦合性、时空溢散性和自反性等特征,对人机共生、社会稳定与文明伦理带来系列挑战。这些风险并非人形机器人独有的问题,而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一般性问题。为此,本文依据“理念引领—制度支撑—机制保障”的逻辑,提出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复合风险的有效规制路径,旨在为应对人形机器人复合风险提供系统性监管方案。其中,动态适应性的监管模式为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风险的有效规制提供理念引领与模式创新,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为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风险的有效规制提供规则体系与制度规范,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监管机制为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风险的有效规制提供组织协调与资源保障。

(一) 构建动态适应性的新型监管模式

近年来,对人工智能的包容审慎监管逐渐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38],包容审慎监管起源于对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扶持需求,强调在促进新兴技术发展的同时,对潜在风险保持警惕,通过灵活且适度的监管措施,为技术创新营造宽松环境。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

部门联合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然而,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风险与技术、社会、伦理和法律等多维度风险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风险网络,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尚不足以应对这些风险。现代社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人形机器人的风险谱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确立动态适应性的监管模式是有效规制人形机器人复合风险的关键。风险生成的动态性、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影响的高流动性是目前人工智能治理的难点^[39]。适应性治理作为应对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与非线性特征的新兴治理范式,其目标就是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发展型理念实现对系统变化的持续响应,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具有动态适应能力的治理过程^[40]。因此,可对人形机器人实施动态适应性监管,对不同类型机器人和不同场域下的风险采取动态导向的监管模式,以适应多维风险冲击。人形机器人动态适应性监管可以理解为面对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与扩散性的复合风险,通过动态监测风险演化、协同多元主体并弹性调整规则,构建技术发展迭代与应用风险适配的调适性监管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模式,动态适应性监管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兼顾监管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动态适应性监管注重从技术、社会、伦理和法律等多维度对人形机器人进行综合考量,旨在实现对复合风险的有效识别、评估和控制。监管者不仅要关注人形机器人技术本身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还要关注其对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的衍生影响。例如,技术异化风险可能导致人形机器人功能失控,进而引发人身安全和社会失序风险。因此,要在监管过程中充分考虑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避免聚焦单一维度监管而忽视其他潜在风险。其二,动态适应性监管是兼具灵活性与韧性的监管。考虑到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应用场景的多样化,应根据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机器人应用的不同场景以及风险特征的实时变化,及时调整与优化监管措施。在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探索和原型开发阶段,应保留一定的监管弹性,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变化保持开放态度,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试错,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合规框架内进行大胆创新,为新兴技术发展预留容错空间。在应用部署阶段,当新的风险类型出现或现有风险特征发生变化时,监管者应迅速响应,通过修订法律法规、引入新型监管工具等方式,增强监管体系的适应性、及时性与有效性。

(二)完善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

制定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的规章制度,将风险规制嵌入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通过明确各阶段的监管标准、责任主体与操作流程,实现对复合风险的前置防控与全程约束。建立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与监管制度,明确人形机器人的法律地位,界定开发者、运营商、用户等各方的权利义务。以人形机器人“技术训练—原型开发—规模应用”三阶段作为监管全周期,结合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客观环境、参与主体构建针对性的制度框架、监管策略和监管手段。鉴于人形机器人具有自我学习与操作性能能力,依据既有数据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在发展应用中存在潜在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将风险预防置于监管的核心位置,即在风险发生之前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风险评估、监测和预警等手段提前识别和防范风险,避免风险的扩散和叠加。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树立前瞻性思维,对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与市场应用进行全面的预判和分析,制定相应的风险预防制度。

在技术训练阶段,建立源头风险防控制度与前瞻性的风险评估体系。一方面,在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初期,建立算法伦理审查制度,对算法设计原则、数据来源合规性以及潜在社会影响开展全面审查。研发机构需提交算法设计说明书,由第三方伦理委员会对算法公平性、透明度及潜在风险进行审查,未通过审查不得进入下一阶段。另一方面,制定技术风险等级评定制度,确立人形机器人在硬件、软件、算法、通信、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综合考虑技术、应用领域、数据、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对人形机器人进行全面、深入的风险等级评估,并根据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从源头减少技术异化风险。

在原型开发阶段,推行“监管沙盒”制度,增强人形机器人应用的风险规避与持续创新能力。“监管沙盒”是一个受监管机构监督的可控空间,企业可在其中开发和测试创新技术,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发展^[41]。在“监管沙盒”内,企业可进行一定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测试和应用,由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测与评估,赋予测试企业在沙盒内一定的责任豁免权。在人形机器人初步开发阶段选择一些特定的场景,如工业园区、科技园区、测试基地等作为“监管沙盒”的试点,而后逐步扩大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和规模。在尽可能增加“监管沙盒”参与主体的同时,完善“监管沙盒”退出机制与常规监管中的市场准入机制,确保通过沙盒测试的被监管方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安全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及时发现和防范人形机器人的潜在应用风险,并为制定和完善监管政策提供实践依据。

在规模应用阶段,健全人形机器人风险动态监测与责任追溯制度,防范化解人形机器人在不同场景应用中的复合风险与衍生风险。首先,建立实时、动态的风险监测制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人形机器人的运行状态、数据流动与市场应用等进行全方位审查和检测,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问题并发出预警。其次,建立产品质量定期抽检制度,设立专门的质量监督团队,定期对人形机器人进行技术评估与抽检,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相关责任方进行整改,保障人形机器人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最后,完善侵权责任认定制度,明确开发者对算法缺陷的责任、运营商对数据安全的保障义务以及用户的合理使用边界,划分多主体参与下的责任归属,为纠纷处理提供制度依据。

(三) 创新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监管机制

面对人形机器人多维风险的复合性,单一主体的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全链条风险监管。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应用涉及多个领域和环节,政府作为监管的主要责任主体,应完善人形机器人的责任界定制度与法规,进一步明确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等主体在各个环节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监管格局。

首先,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沟通协调和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厘清各部门职责,确保科技、工信、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在人形机器人监管中的高效协作,避免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现象的发生;建立动态风险联防平台,联通各部门监管数据,进行风险关联点、违规线索和执法结果的实时共享,实现跨部门风险预警与联合处置。

其次,建立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管需要通过用户和市场来调整方向,政府监管部门在发挥统筹引领作用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公众、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的作用。政府应借助技术工具与日常科普进行数字素养教育,构建便捷化公众反馈渠道,形成多方

监管合力。公众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最终使用者和直接受影响者,要提升其对人形机器人风险的防范意识和监督参与能力;社会组织 and 行业协会应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引导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加强行业内部的自我约束和管理;科研机构可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开展人形机器人风险研究和技术咨询,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指导,并为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

最后,建立企业主体自治机制。企业作为技术研发与应用的责任主体,应秉持负责任的创新与研发态度,将风险防控嵌入产业全链条,实现源头风险自净。在数据开发应用阶段,强化人形机器人开发设计阶段的数据风险防控,建立数据分类处理框架,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及个人数据实施分级管控,推动数据全流程合规应用,防范数据泄露、窃取和篡改等风险,提高数据获取、数据交互及数据安全等技术保障能力;在原型开发阶段,夯实基础部组件、关键部组件和控制器等板块,加强对重点部组件的安全风险防控,同时预设风险响应模块,通过用户反馈与实时监测数据持续优化模型,进行技术纠偏;在规模化应用阶段,企业需向社会公开训练数据来源、算法伦理准则及风险处置预案,并每年委托独立机构开展合规审计。

五、结语

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广泛应用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在工业制造、特种作业、公共安全、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的同时也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应用中衍生了复合风险。当前对人形机器人的风险治理存在着制度、法规与工具等方面的不足,缺乏对人形机器人风险规制与监管模式的深入探究。包容审慎监管为人形机器人的风险规制提供了重要工具,但面对人形机器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复合风险,包容审慎监管难以有效回应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新问题,难以应对新技术迭代带来的复合风险。为此,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对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的复合风险进行了系统阐释,揭示了人形机器人发展应用中风险的负向涌现性、跨域耦合性、时空溢散性和自反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融合适应性治理理念,强调对人形机器人复合风险的动态响应能力,提出人形机器人复合风险的有效规制路径:其一,确立动态适应性监管模式,为风险规制提供理念框架;其二,完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为有效监管提供规则支撑;其三,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监管机制,形成优势互补、权责明晰的监管合力,为监管制度运行提供保障。三者共同构成“理念引领—制度支撑—机制保障”的规制路径,为人形机器人监管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向,以完善人形机器人监管体系,促进其产业创新、安全可控与可持续发展。

人形机器人的风险治理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命题。未来,可依据技术发展阶段与应用场景的差异,兼顾人形机器人的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灵活调整监管策略;构建人形机器人风险监管评估体系,探索“技术—制度—理念”协同演进的规制路径,将技术可靠性、责任可溯性、伦理相容性、制度适配性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全程追溯”的全链条治理升级。

参考文献:

- [1] 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人形机器人标准化白皮书[EB/OL]. (2024-12-05). <https://hulianhutong-shequ.cn/upload/tank/report/2025/202503/4/44bb54f3cece40ea9205c3e8531bee4f.pdf>.

-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R/OL]. (2024-12-26).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ztlbg/202412/t20241227_649391.htm.
- [3] 朱妍. 图书馆人形机器人:现状、应用与展望[J]. 信息与管理研究, 2025(2):11-22.
- [4] 刘双阳. 具身智能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刑法应对——以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为例[J]. 东方法学, 2024(3):171-185.
- [5] 沈甜雨,陶子锐,王亚东,等. 具身智能研究的关键问题:自主感知、行动与进化[J]. 自动化学报, 2025(1):43-71.
- [6] SODERLUND M. Service robots with (perceived) theory of mind: An examination of humans' reactions[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2(3): 1-11.
- [7] 赵杨,张佳怡. 基于具身智能的人智交互体验研究:理论、应用与展望[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5(3):52-62.
- [8] 华劼. 人形机器人对不同类型隐私的影响及法律应对[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116-128.
- [9] WILLEMS J, SCHMIDTHUBER L, VOGEL D, et al. Ethics of robotized public services: The role of robot design and its action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22(2): 101683.
- [10] WIRTZ B W, MULLER W M. An integr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amework for public management[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9(7): 1076-1100.
- [11] 蔡士林,杨磊. ChatGPT 智能机器人应用的风险与协同治理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5):14-22.
- [12] 刘金瑞.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新型风险与规制框架[J]. 行政法学研究, 2024(2):17-32.
- [13] 曾凯,王耀南,谭浩然,等. AI 大模型驱动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技术与展望[J].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2025(5):967-992.
- [14] MINTROM M, SUMARTOJO S, KULIC D, et al. Robots in public space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design[J].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2022(2): 123-139.
- [15] 张涛. 迈向试验性规制的人形机器人治理[J]. 东方法学, 2024(5):43-56.
- [16] 王苑. 具身智能体的隐私风险及法律应对——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的展开[J]. 东方法学, 2024(3):64-76.
- [17] TONG Y, LIU H, ZHANG Z. Advancements in humanoid robo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 2024(2): 301-328.
- [18] 刘伟. 人形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趋势研判[J]. 人民论坛, 2025(4):42-47.
- [19] 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 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蓝皮书[EB/OL]. (2024-04-18). <https://www.hulianhutongshequ.cn/upload/tank/report/2024/202405/4/58f9026093be448ab1af9bf25edded62.pdf>.
- [20] BALKIN, JACK M. The path of robotics law[J]. California Law Review Circuit, 2015(6):45-60.
- [21] 瞿华. 风险社会:可能及其可为的逻辑思考——兼论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4):1-7.
- [22] BERGKAMP L. The concept of risk society as a model for risk regulation——its hidden and not so hidden ambitions, side effects, and risk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7(10): 1275-1291.
- [23] 张劲松. 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6):69-73.
- [24]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 周红云,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25] 乌尔里希·贝克, 郗卫东. 风险社会再思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46-51.
- [26] 易承志, 郑欣. 韧性视域中面向城市复合风险的应急预案建设[J]. 探索, 2025(1):101-113.
- [2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28]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 [29] 陶永, 万嘉昊, 王田苗, 等. 构建具身智能新范式:人形机器人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综述[J]. 机械工程学报, 2025(15):121-147.
- [30] 唐小飞, 孙炳, 张恩忠, 等. 类人智能机器人社会价值替代与风险态度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6):4-15.

- [31] SHARKEY A J C. Should we welcome robot teachers?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4): 283-297.
- [32] 谭九生, 杨建武. 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协同治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0): 44-50.
- [33] 霍兰. 涌现: 从混沌到有序[M]. 陈禹, 等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34] HU Y, ABE N, BENALLEGUE M, et al. Toward active physical human-robot interaction: Quantifying the human state during interac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 2022(3): 367-378.
- [35] 刘兴华. 数字全球化、风险复合化与全球风险治理[J]. *世界社会科学*, 2025(2): 64-78.
- [36] 龙柯宇. 公共卫生法治的自反性现代化境遇与因应[J]. *行政法学研究*, 2023(6): 99-112.
- [37] DUFVA, TOMI, MIKKO D. Grasping the future of the digital society[J]. *Futures*, 2019(1): 17-28.
- [38] 徐磊. 发展与安全并重: 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的包容审慎监管[J]. *理论与改革*, 2024(4): 67-83.
- [39] 谢潇, 罗世杰.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态风险及适应性治理[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112-125.
- [40] 容志, 谭晓芳. 适应性治理: 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J]. *治理研究*, 2024(3): 111-126.
- [41] 杨丰一. 人工智能“监管沙盒”: 理论溯源、实践考察与制度构建[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12): 25-35.

Compound Risks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CHEN Shuisheng, JIANG Pei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umanoid robots have moved from laboratories to fields such as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special operations, public secur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services, giving rise to compound risk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social disorder and ethical misconduct. These risks are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emergence, cross-domain coupling, spatiotemporal spillover, and reflexivity.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ompound risk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regulatory efforts can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aking dynamic adaptive regulation as the conceptual guidance to build a new regulatory model featuring comprehensiveness, systematicness, flexibility, and resilience; adopting a whole-life-cycle regulatory system covering "technology training—prototype development—large-scale application" as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clarify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boundarie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each link; and relying on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 to integrate governance forces from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The above regulatory path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gulatory schem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large-scale application, and risk regul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the safe, controllable,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humanoid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 words: humanoid robots, embodied intelligence, risk society, compound risks, dynamic adaptive regulation

责任编辑: 金华宝

引用格式:阎国华,魏新宇.生成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工智能角色[J].探索,2026(1):125-135.

生成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工智能角色

阎国华,魏新宇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伴随数智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创新突破,人工智能开始逐步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分配、能力构建与价值共创,不仅重塑了传统人机关系的角色边界,还使其自身跃升至可以提供教育支持与满足学习需求的重要角色。从生成基础上看,人工智能的角色获得是其在存在论升维、认识论递进与实践论创变作用下,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类主体”“智能体”与“行动体”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从呈现样态上看,人工智能既可以承担工具性角色,亦可以担当代理性角色,扮演参照性角色,乃至逐渐发展为伙伴性角色。对于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生成的角色属性,应给予积极关注并不断超越,着力使其从物的自发生成转向人对其的自觉塑造。为此,可从锚定主流价值以框定人工智能的角色边界、完善技术架构以夯实数智赋能的角色功能、提升数字素养以实现人机协同的角色互动和建立长效机制以推动合规有序的角色实践入手,着力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的塑造实践。

关键词:人工智能;角色;思想政治教育;塑造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125-11

角色是社会关系中的结构化身份,往往内蕴特定的地位层级、职能性质和责任要求,遵循所属群体共有的行为规范。凭借卓越的技术集成优势,人工智能正在从基础层、感知层到应用层多向深度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持续激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的新思考。从具体实践看,在与教育主客体交互过程中,人工智能日益展现出类人特质和“社会化行为”,呈现出独特的身份属性,并在积极参与思想传播、价值塑造与认同建构等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议程中,形成了兼具工具性、代理性、参照性与伙伴性等多重维度的角色谱系。从发展视角看,人工智能正在突破传统的工具属性,逐渐演化为助力理论武装的支持性要素、深化精准思政的促进性因素与优化育人范式的创新性力量。然而,人工智能为何能以多重角色身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更应承担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有效发挥优势角色效能仍需进一步探讨。面向未来,人工智能不应仅限于协助学生事务管理、辅助常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角色,而应跃升为可以支撑内容呈现、激发学习需求、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角色。基于此,聚焦人与人工智能间的全新关系,深度追问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何以生成,审慎确证人工智能角色以何呈现,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角色由其“自发生成”如何跃迁到人对其的“自觉塑造”,对于构建科学的思想教育人机关系生态、有效应对人机协同的风险挑战和持续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前瞻性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智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研究”(24BKS114),项目负责人:阎国华。

作者简介:阎国华,男,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新宇,女,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的生成基础

角色形成于社会要素彼此联结的互动关系中,“在较大社会环境的联系中许多角色得以确认、设定和归属”^{[1]368}。依托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开始从单一模型转换为混合智能物、从被动执行者演变成主动合作者,逐渐成为存在论上的“类主体”、认识论上的“智能体”与实践论上的“行动体”,深度塑造着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互动方式和价值引导的关系模式。由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边界逐渐消融,促使各要素在新的互动关系中获得新的集体角色和职责定位成为可能。

(一) 存在论升维:人工智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类主体”

主体性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具有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质存在而特有的主体能力。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工智能逐渐具备的“自主进化”能力,使其在人机交互之中日益呈现出超越工具层面的存在论意义,甚至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2],从而实现从“物”到“类主体”的跨越。

一方面,人工智能体现着“主体对象化”属性。智能机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反映,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3]198}。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人类运用技术手段和创新思维,将自身劳动力要素以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类能力物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人工智能,教育者能够把教育理念、教学思想和价值目标转化为机器智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传递、价值引领和思想认同等核心任务得以数智化延伸。另外,技术的迭代升级也往往推动着人类能力的发展跃升。源自人类利用数智技术突破自身局限性的实践,人工智能也是人类认识自我、反思自我与提升自我的辅助性力量。借助硅基生命的固有优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能够突破碳基生物的生理有限性,比如利用深度挖掘来拓展理论阐释的深度与广度、利用情景对话来强化复杂情景的价值判断力、利用虚拟现实来赋能红色文化的历史呈现,从而加快落实培育时代新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育人目标。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呈现出“对象主体化”特征。当下,人工智能日益拥有与人类主体相似的特性,既包括外形、动作与行为等浅层次模拟,也涵盖关系化、社会化等深层次演变,逐渐获得“对象主体化”的意涵。这些类人特性增加了人工智能的社会存在感,提升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感、同理心和满意度^[4],使人工智能得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尤其是随着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及脑机接口等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以数据为血液、以电波为神经、以算法为大脑,效仿并延展着人类肌体的形态与动作,以实在性身体与虚拟性身体两种形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育人载体和交互路径,彰显其在以具身互动推动价值共鸣、以学情分析深化精准思政和以数据挖掘集成育人资源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既能够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赋能教育双方的行为实践;还能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学生群体特征绘制、思想动态把握和认同状况反馈等各个环节,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形成新型教育互动关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主性”对象。

(二) 认识论递归:人工智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

作为智力劳动与知识劳动的物化成果,人工智能是一般智力循环累积与递归调用^[5]的结果,通过汲取社会的普遍知识,发展出可以识别信息、呈现图景、展开互动和理解关系的类人智

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人工智能可以凝聚群体性智能,作为具备感知、计算和反馈的角色,深度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

在计算智能层面,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在数理逻辑上的延伸,以大数据、算法和算力为基础,展现出强大的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储存能力,可以处理规模数据、进行复杂运算并实现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定制化、过程数据化与反馈精准化带来新契机。此外,云平台、云存储、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方式可以让人工智能获得数字记忆,助力其成为具备庞大记忆容量的存储智能体。同时,数字化记忆可以有效地发展记忆,让记忆更持久、更清晰、更细腻以及更便于调用,不仅有助于集体记忆的有效达成和作用发挥,还有助于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和情感基础。依靠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汇聚并建构起更加丰富、更有条理以及更具选择性与针对性的育人资源,并以智能化方式重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意义表达,进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构建、生动呈现和高效传播。

在感知智能层面,基于信息编译、数据挖掘和特征推理等方法,人工智能得以运用语音生成和视觉识别技术来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感”“知”“联”的综合一体化。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动态的感知适应机制,灵活调整感知模式,主动识别教育环境的实时变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经验判断到精准感知转变。在情境感知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可以更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场景,包括精准捕捉主流价值的关键话语符号、动态识别青年群体的典型认知图式以及系统揭示价值共识的深度影响因素。

在认知智能层面,人工神经网络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不断发展出许多高度复杂的非线性模型,编织出人工智能认知涌现的底层逻辑。例如,聊天机器人内嵌“思维链提示”技术,可以模拟人类逐步推理思维,进而得到正确的答案^[6]。通过关联规则、因果机制、持续学习等技术方式,认知智能体能够仿照人类的思维过程,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更加轻松的方式进行实时对话,包括谈心、交流和解疑释惑。由此,不仅可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还能通过演绎思考路径呈现出蕴含其中的价值导向,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向更好体现技术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三) 实践论创变:人工智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行动体”

“他者”代表着区别于自我且无法被自我同一的差异性。“自我之统一与独一无二已经就是己之被另一者所具有的重力所把持。”^{[7]283-284}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他人、自然与社会形成多种关系,并在与“他者”交互中不断建构自我主体性、获得超越自我的可能性。基于人类语言和行动的“数据滋养”,人工智能逐渐具备交流的可能,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他者”,加上模拟社会交往规则和反应模式,可以愈加深入地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一是人工智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对话交流。依托大语言模型训练和语料库建设,人工智能得以掌握语句结构、语义信息与上下语境,并逐步发展出自然语言生成能力。人机对话使教育活动得以全天候、不间断开展,弥补教育互动的时空受限问题,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性。此外,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能够在人机交往中自定义人工智能的对话角色,动态调整人工智能的角色、风格以及形象,从而优化对话体验与任务结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可以依据角色需求与对话场景提供相应的叙事话语,从而适应不同的沟通偏好,比如在学习中使用准确的学术话语,而在心理疏导时则使用更加生活化的话语表达。

二是人工智能调和思想政治教育情感联系。尽管人工智能尚无法像人类一样拥有情感感

受和情感体验,但基于计算方法,仍可以具有情感表现^{[8]190}。例如,经由用户自主命名与定制性格,人工智能伴侣系统 Replika 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实时语音、虚拟现实等方式,与用户进行交谈和互动,为用户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与陪伴。作为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智能体,人工智能可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人机交流,给予教育对象及时的安慰、鼓励和夸奖,营造出更加积极正向的情感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更加细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深入人心。

三是人工智能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协作模式。目前,人机互动演化出灵活反馈与动态交互的协作机制,人机关系逐渐从人类主导向共同决策转变。一方面,人机协同不断巩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人机协同已经超越简单分工,转向教育者、教育对象与人工智能的密切互动和协作共生,形成了多样化、深层次、全方位的协作方式。另一方面,多智能体协同得以发展。凭借分布式控制、协同进化算法、智能协作框架等技术形式,多个智能体之间也能够共享参数与协调控制,从而推动构建人机协调、价值共创和责任共担的智能育人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的呈现样态

角色呈现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拓展了实体身份的范畴,破除了对交往对象属性的刻板印象^[9]。受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形成多重角色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的现代图景。在新型关系中,人工智能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与能力,成为智能性、交互性和自主性的实体存在,展现出多样化角色功能特征。

(一)工具性角色:内容整合者、方法优化者与效率提升者

作为物本身,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使用的技术工具,内蕴着特定的工具属性及效能。随着技术功能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不断产生更高的物的贡献,发挥出更大的工具价值,以超级工具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整合、方法优化与效率提升。

首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合者,人工智能凭借卓越的数据处理与信息聚合能力,能够从浩瀚的资源库中挖掘和筛选出能够深刻阐释理论、有效引发思想共鸣和强化价值引且便于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图文、视频和案例等。通过文本挖掘等人工智能预处理措施,各种优质内容得以搜集、提炼与转化,成为源源不断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另外,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多变,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10]14}。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知识图谱、数据分析和语义读取等功能,更加充分地汲取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精华,加快与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融合,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从而增强理论阐释的现实穿透力和时代感召力。

其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优化者,人工智能能够在形式层面实现多模态呈现,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趣味性和体验性。与传统的文本语言不同,人工智能可以整合多样化非语言符号,通过数据文本、数字音频、图像视频等方式传递知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从抽象文本向具象叙事转变。例如,在讲述社会发展成就时,人工智能可以深入挖掘经济产值数据、生活改善实例与文化繁荣图文,帮助教育对象更立体地获取、理解和掌握理论内容。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助智能手段,以声音、视频复现历史情形,以多元载体营造沉浸式场景,激活教育对象的多维感官,从而增强教育对象的学习体验。

最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提升者,人工智能有助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流程,显著提高工作效率。从准备阶段选择充分彰显主流价值的育人资源,到实施阶段生动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神内核,再到总结阶段精准评估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教育效果等,人工智能可以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展现出广泛的适配场景和应用潜力。相较于传统教育工具,人工智能能够以强大的查找、挖掘与解析能力,从繁杂的事物中提取出所需信息,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检索、数据分析、语法校验以及资料拓展等需求,提升单位时间内信息的传输总量,缩短思想育人的运作链条,日益成为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提升者。

(二)代理性角色:智能延伸者、行为替代者与情感补偿者

目前,人工智能能够在特定环节中延伸人类感知,代替教育者或教育对象完成指定任务,并提供情感的间接性补偿,逐渐开始发挥智能上、行为上与情感上的代理作用。

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充当智能延伸者的角色。个人认知能力往往具有不断发展性和相对局限性,常常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并由此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较为难以突破的问题。对此,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担负智能延伸者角色,凭借其出色的存储记忆优势、敏捷计算优势,以及计算机视觉、特征扫描、语言识别及位置追踪等核心功能,实现对事物的觉知、选择和辨析,深化教育过程对表象问题的本质思考、辨识教育对象思想层面的潜在波动并增强教育者以理论分析现实的能力,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联系实际更具时效性、在因材施教方面更具精准性、在凝聚共识方面更具亲和性。

其次,人工智能可以担任行为替代者的角色。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超越自身限制的产物。伴随其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性承担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或代替教育者完成一些常规性工作,从而使其能将更多时间用于开展针对性沟通、研究思想演化规律和创新思想启迪路径等创造性活动。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增强或替代部分人体器官功能,而“这种资源的替代效应也能拓展和改进生理态身体及其所处环境”^{[11]205}。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人体固有局限,承受更极端的外部条件,比如提供跨地域、全天候的智能辅导、在线答疑等。这些功能可以显著拓展教育活动的实践时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可及性与灵活度。

最后,人工智能可以承担情感补偿者角色。受时空条件、个体差异、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交流有时较难充分实现。目前,在仿生机械、情绪识别、多模态表达等技术支持下,人工智能拥有了许多类似人类的外貌和行为,也逐渐具备类人的情绪和性格,成为情感交往的对象性存在。基于此,人机之间不仅发生着形态、功能与行动上的转移,也发生着信任与依赖的迁移。例如,通过模拟教育者的情感表达、积极同教育对象进行对话交流等途径,不仅可以让人工智能以调和者的角色填补思想政治教育部分领域的情感空缺,还可以有助于化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交流难题。

(三)参照性角色:现实反馈者、局限映照者与关联呈现者

大数据“承诺以‘世界的实质’取代理论与模型,并提供一个‘无中介的渠道’,了解世界的本质、其全部的多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居住于其中的‘真实’非抽象的个人”^{[12]21}。鉴于人工智能超强的数据映射能力,人机之间具有一定的镜像效应,并经由求同与辨异,窥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样态、局限钳制与规律次序。得益于这种镜鉴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传统模式扬长

避短,实现效果优化升级。

首先,作为现实反馈者,人工智能可以综合统计、计算、语言等优势,获取巨型数据参数,整合出数据描绘的事物细节,比如类比人类情感活动,反映其状态、模式甚至价值。这种揭示能力极具应用潜力,不仅使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反馈者,还可以显著突破传统的有限反馈模式。通过实时反馈与持续追踪,教育者能够及时监测教育对象思想动态、心理状态以及行为倾向,进而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节点。与此同时,教育对象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也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情况及其与社会要求间的距离,从而更好地查漏补缺、精准补强自身弱项短板。

其次,作为局限映照者,人工智能得以扮演人机交往的“他者”,成为“人类某些特征的反面映照”^[13],映射出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存在的盲点与不足。人机交互可以提供一种新的交往方式,让人机互为镜像映射出彼此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促使人们在比较中正视自身的不足。伴随持续发展,人工智能业已形成许多显著优势,比如能够实现社会思潮研判的迅速性、思想理论传播的精准性及主流价值叙事的生动性,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对照比较、反思自身的参照系。依托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持,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更加全面地审视自身的政治判断力、思想引领力和风险防控力,而教育对象则能够在对照中主动激发内生动力、寻求思想淬炼、实现自我革新,进而推动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

最后,作为关联呈现者,人工智能以符号化形式模拟人类思维,发展出的深度挖掘与系统整合能力有助于发现事物间难以察觉的联系,进而助力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归纳内蕴的规律性。借助人工智能,事物背后隐藏的关联性、趋势性和因果性可以被更好地归纳出来,并形成理论知识、价值取向或事物演进规律,从而帮助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实现学理新跨越。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例,思想政治教育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可视化呈现生命起源、宇宙演化的变化更迭,更加具象化地阐释物质的运动和规律,从而为教育对象提供更广阔的认知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考维度。

(四) 伙伴性角色:自主生成者、决策建议者与发展赋能者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人机协同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常态。人工智能逐步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伙伴,向着应对复杂性问题的综合智能体发展。在此功能呈现下,人工智能以一定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挥着自主生成者、决策建议者及发展赋能者的多重作用,深度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机间的有机协同。

首先,人工智能扮演着自主生成者。得益于多种技术加持,包括前反馈神经网络、自注意力机制、生成对抗网络、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ChatGPT、Sora、StyleGAN等众多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继出现。它们采用先进的算法和规则,能够自动生成原创性文本、音频、视频等,实现从辅助型模型向创作型模型的飞跃式变革。将这些发展具象到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中,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特定要求、学习进度、兴趣偏好,自动生成个性化学习材料、定制化辅助资源、生动化教育方案,从而锻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阐释和价值传递的新范式。

其次,人工智能扮演着决策建议者。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决策支持与执行能力,能够针对不同场景,以新的方式和新的维度,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好地实施统筹谋划,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克服决策的主观性,进一步贯彻前瞻性、协

调性、整体性的学科决策要求;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而言,改变也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持续的学习^[14]。历经数次迭代和强化学习,当下的人工智能具备更加出色的可塑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可以在系统运行中增强拓展、在结果反馈中纠错提质。基于此,无论面临全新情景,还是遇到复杂问题,人工智能都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认知环境快速变化、多元思潮持续涌现等问题的整体响应能力、场景适配力。

最后,人工智能扮演着发展赋能者。在人工智能赋能下,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以技术优势不断拓展人的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更好释放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力,赋予人的主体性以新的内涵。一方面,创造更多学习机遇。人工智能可以打破固有时间和空间限制,构筑起人人可及的资源平台,并能根据不同教育对象,提出分众化、精准化、定制化学习路径,让每个人都能在恰当节奏中深化理论认知、拓展思想广度、增强价值体认。另一方面,锻炼人的高阶思维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正在开启全新的创意时代,能够探索前所未有的元素、结构和风格,开辟更多未知的可能性。基于此,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可能运用人工智能,在既有认知及知识框架外寻求新的创新点,从而获取更多启发性思想,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创新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工智能角色的塑造策略

从整合教育内容到映照现实局限,再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角色作用,就必须明晰其核心优势与固有局限,辩证审思人工智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向度与限度,进行系统性角色塑造,实现人工智能角色的增能而非代替、赋权而非越位。

(一) 锚定主流价值,框定人工智能的角色边界

审视角色的界限应秉承审慎和尊重的态度。在数据处理、语言模型和强化学习等基础技术支持下,人工智能逐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潜在可能,在强化人类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对人的主体性造成冲击。因此,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方向,摒弃技术主义的片面追求,捍卫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工智能的角色职能始终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范围内展开,达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在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中,需要将科学的思想观念有效转化为可执行的数字代码,用主流价值驾驭数智技术,推动技术运行在主流价值框架内开展,从基础价值生态上使其符合人类价值期望。为此,一是要明确以人为本的根本遵循,注意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对人工智能价值排序的影响,揭示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运行偏差的问题,始终将维护人类尊严、尊重生命权利、保护身心健康作为人工智能研发和利用的根本遵循,让人工智能应用始终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立场;二是要将价值规范细化为技术规则,建立人类价值观念和人工智能规则集合的科学转化机制,努力将抽象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数据参数、知识语料和程序准则,从而保障核心价值内涵得以准确传递,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具有可追溯的价值依据。例如,将“公正性”价值目标体现为避免算法歧视、防止技术偏见、缩小数字鸿沟等操作要求,引导人工智能在运行中深刻折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警惕技术主义,防范人工智能的角色异化。伴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技术应用中所倡导的标准化、效率化和功利化价值容易迅速扩张,甚至衍生出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系造成冲击。基于此,应抵御技术主义的价值侵蚀,消除工具理性凌

驾人文关怀、技术逻辑取代教育规律、技术手段替代人的作用的价值倾向,防止人工智能角色僭越人的角色。一是防止数据主义独断。思想政治教育应严格界定人工智能的适用限度,重点关注生动鲜活的生命个体而非冰冷的数据,避免将思想、政治、情感等降维为技术参数,切实防范数据主义张扬。二是抵制效率至上倾向。人工智能的角色塑造应当打破效率至上的单向思维,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在时间监管、阶段分配和成长伴随等多维度的积极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循序渐进与螺旋上升。三是破除技术理性误区。在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避开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教育难度降低的价值误区,打破技术无限可能的价值迷思,明确人工智能角色的正当性源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非技术自身优越性,防止人工智能角色的无限扩张。

(二) 完善技术架构,夯实数智赋能的角色功能

技术架构是人工智能发挥角色效能的基础支撑,在研发、设计和应用时需充分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形成涵盖基础架构、技术环节和应用实践的全方位有机体系,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性角色向伙伴性角色智慧升级。

在基础架构上,筑牢数字基座,推动人工智能的高效执行。强大的数据、算法和算力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基础层^[15],为人工智能角色功能提供软件资源和硬件支撑。为此,在数据采集、标注和管理上,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范要求,注重观测反映价值导向、核心问题和发展趋势的数据,形成高质量教育数据集。在算法方面,要通过协同过滤、内容推荐、关联规则与多目标优化等核心算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和高效性。在算力方面,要强化智能算力的调配和使用,加快创新人工智能芯片和智能软件,进一步释放人工智能的角色效能。

在中间环节上,加强核心攻坚,助力人工智能的持续优化。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可穿戴设备等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的持续优化有助于整合文本、图像、语音和视频等信息,形成集成性和多模态优势,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思想状况的综合判断力、整体理解力和深度分析力。同时,优化大模型训练和小模型协同机制,助推人工智能安全地采集新理论、新情况与新案例并定期迭代教育模型,赋予人工智能角色持续发展进化的能力。

在应用实践上,融入育人场景,驱动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人工智能只有应用于立体鲜活的教育场景,融入丰富的教育实践,才能发挥更大和更具实质性的作用,完成从机械工具到重要角色的升级转变。因此,在教育活动准备阶段,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挖掘多源数据,系统分析价值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而规划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教育引导策略。在教育实施阶段,可以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流程和精细化操作,包括从活动开展到人员组织、再到过程管理。在教育评价阶段,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态、价值倾向和行为模式进行审视,形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育人效能评价结果。

(三) 提升数字素养,实现人机协同的角色互动

人工智能以多重角色介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不断重塑各个教育角色的边界范围。这也要求其他角色升级与跃迁,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同向同行。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应在人工智能角色实践中反观自我,主动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构建面向未来的人机协同。

一方面,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者职责,构建人机协同的教育共同体。随着人工智能在存在论层面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仅限于沿用传统的模式与规范,而应积极构想人工智能可能

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在实践中寻求人机协同育人的新方式。在面向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的角色不仅在于知识传递,更侧重基于知识与意义统合的信仰塑造,需要更加关注如何有效激发情感共鸣、实施知识创造和促进价值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合理规划同人工智能的分工与协作,更好地把握和满足教育对象的发展需求。同时,鉴于人工智能角色不断迭代升级,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增强终身学习的能力,持续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主动拥抱新型智能技术,勇于探索人机合作新模式,更好适应人机关系变革下的新境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产生显著作用,仍无法替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增强主体责任感,充分发挥其在价值传递、情感交流和思想引导上的优势,审慎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负效应,确保教育目标的达成。

另一方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力,形成人机协同的学习共同体。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渠道,进一步具备个性化、定制化和自主化学习条件。在此情况下,要积极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现实反馈和关联呈现等角色功能,主动发现问题,构建个性化知识体系,主动适应人机协同下的学习模式,助力自身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动探索者、发现者与建构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注重引导教育对象有意识地将推理、联想、设想融入教育任务中,同时学会利用人工智能挖掘海量资源中的思想养分,获取有助于理论理解和价值实践的创新启发,掌握人机协同学习中的主动权。另外,在人工智能驱动下,信息获取与思想传播高度自动化,也进一步凸显出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对于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要引导教育对象敢于质疑信息的真伪性,理性推断其逻辑合理性、价值倾向性,通过合理分配自身的注意力资源,锻炼自身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素养。

(四) 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合规有序的角色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塑造与职能适配,既要实现价值最大化,又要减少相关风险的发生。这就要求建立技术应用的长效机制,促进人工智能角色实践的有序开展。

首先,健全法律规范,明晰人工智能的运用界限和行为准则。从法律制定角度,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明确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设成果归属、可能使用限度、侵权责任追溯等问题,划定清晰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边界。从法律执行角度,应强化法律救济和分层问责,对利用人工智能扭曲价值导向、损害教育公平等行为及时处罚,并畅通法律援助通道,落实违法必究和权益保障。从法律监督角度,法律监督机构应进行持续性的监督与评估,保证人工智能始终在法律框架内发挥作用,并建立公开透明的法律申诉渠道,允许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对人工智能的行为提出质疑或反对,以此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其次,完善技术标准,确保人工智能的开发安全和应用可靠。一是借鉴国际标准。人工智能角色塑造应当善用比较视野,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他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管理思维与增效模式。例如,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国外高等教育在制定相关伦理政策时,较为普遍地“体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制定与应用场景结合的必要性”^[16]。二是制定动态标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求,制定前瞻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技术标准体系,通过及时修订和补充,持续引导人工智能角色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合理配置。三是细分具体标准。面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人工智能角色应重点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加以塑造,创设具体的人工智能核心术语、运作框架与参考模型,为人工智能的规范

运用提供精准化支撑。

最后,优化组织管理,保障人工智能的有效运作和合理配置。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多元利益和多个环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组织管理的连接畅通。一是搭建统筹有力的组织架构,合理分配政府、高校、科技企业、信息技术中心、学生管理部门等多方职责,促使各方在人工智能角色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和资源畅通,打造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平台,形成集约化人工智能利用格局,促进优质技术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互惠共享。三是强化人工智能角色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意识形态导向性、技术嵌入安全性、教育效果有效性等多个维度,对人工智能的角色运用进行准入评估,实时监测人工智能状态,并有序退出存在安全漏洞和性能退化的人工智能应用。

四、结语

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正在经历存在论升维、认识论递归与实践论创变,不仅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机关系,也促成了人工智能的角色赋予。在存在论层面,人工智能在突显其主体对象化属性的同时,亦凭借其卓越的技术集成优势,呈现出对象主体化的发展趋势。在认识论层面,人工智能逐渐获得技术意义上的数字记忆、智能感知与智慧认知,认识、理解并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阐释和思想启迪活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体。在实践论层面,人工智能凭借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交互机制等技术基础,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对话交流、情感交互与分工协作,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体。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催生出多样化的人工智能角色谱系。人工智能既可作为内容整合者、方法优化者与效率提升者,承担工具性角色,亦可作为智能延伸者、行为替代者与情感补偿者,担当代理性角色,同时还能以现实反馈者、局限映照者与关联呈现者,扮演参照性角色,也能通过发挥自主生成者、决策建议者与发展赋能者作用,担当伙伴性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虽然已从最初的模仿人类智能逐渐转变为开始影响人类智能^[17],但其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生成整体仍属于一个伴随生产力发展的自发过程,尚需进一步通过人的自觉塑造来充分发挥其角色效能。为此,要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方向,完善人工智能所立足的技术架构,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角色素养,建立人工智能角色实践的长效机制,从而构建起面向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机协同生态。

参考文献:

- [1] 乔纳森·H. 纳特.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张茂元,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2] 赵汀阳.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J]. 哲学动态,2018(4):5-12.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SKULMOWSKI A. Placebo or assistant? Generative AI between externalization and anthropomorphization[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24(2):1-18.
- [5] 涂良川. 人工智能“无生命之生命化”技术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再论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哲学追问[J]. 学术交流,2023(12):5-16.
- [6] HUTSON M. How does ChatGPT “think”?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crack open AI large language models[J]. Nature,2024(8014):986-988.

- [7]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另外于是,或在超过其所是之处[M]. 伍晓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8] 周昌乐. 机器意识:人工智能的终极挑战[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 [9] 王袁欣,朱孟潇,陈思璐. 理解人机对话——对角色定位、信任关系及人际交往影响的分析[J]. 全球传媒学刊, 2023(5):106-126.
- [10]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11]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2] 依格纳斯·卡尔波卡斯. 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的政治与法律[M]. 邱遥堃,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13] 彭兰. “镜子”与“他者”: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之考辨[J]. 新闻大学,2024(3):18-32.
- [14] 涂良川. “生成式人工智能”逼近通用智能的哲学叙事——ChatGPT 追问智能本质的哲学分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0-47.
- [15] 赵建超.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新探[J]. 探索,2024(1):144-156.
- [16] 吕宇静,杜严勇. 国外著名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10-125.
- [17] 尹孟杰. 机器与人类的不可区分性问题研究——回到图灵测试[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71-77.

Generation and Shaping: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AN Guohua, WEI Xinyu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s i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gun to gradually get involved in the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value co-cre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has not only reshaped the rol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but also elevated itself to an important role capable of providing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fulfilling learning needs. From a generative perspective, the role acquisition of AI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effects of ontological elevation, epistemological recurs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 quasi-subject, intelligent agent and action ag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manifestation, AI can assume instrumental, agentic, referential, or even partnership roles. The evolving role attributes of AI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rrant active attention and continuous transcendence, shifting focus from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of objects to the conscious shaping of humans. To this end, efforts can be made to anchor mainstream values to define the role boundaries of AI, improve technological frameworks to solidify the role functions enabled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enhance digital literacy to facilitat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role interactions, and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s to promote compliant and orderly role practices. This will deepen the shaping practices of AI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aping

责任编辑:陈卓

引用格式:王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与应对策略[J].探索,2026(1):136-146.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 隐蔽风险与应对策略

王 振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如何规避隐蔽风险、发挥积极作用,是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文化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和内在结构在生成与发展中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主体,却被这项技术挑战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却可能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应用。正是因为这些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使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华文化主体性之间呈现出相互牵引的张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主要表现为容易遮盖和混淆真正的文化主体——人民群众,掩盖和弱化真实的主体文化——中华文化,遮蔽和阻碍文化主体间性——共享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防范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需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现代化,增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综合效能;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与规律,创新中华文化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方式方法;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需求,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华文化主体性;张力;风险挑战;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6)01-0136-11

当前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答问题的比例最高达 80.9%”^[1]。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根据人类借助思维符号表征系统表达的提示自动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2],具有学习并生成逻辑新内容的特点。快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带来了挑战。文化主体性实质上指涉的是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植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时空的延展,探索对中华文化自身的自觉与自信^[3]。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本身具有文化属性,但它一经生成就对人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出了挑战,给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主体、主体文化等要素带来隐蔽的弱化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4]，“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5]，“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5]。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全面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客观影响,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风险挑战及内在机理,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如何规避风险、发挥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研究”(24BKS036),项目负责人:王振。

作者简介:王振,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极意义,是“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两个热点话题,同时也是具有深刻内在关系的两个重要命题。一方面,关切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机遇与挑战。有学者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价值导向,认为“对互联网情境的‘模拟’不可避免地带有数据主体所在时空的文化观念”^[6],ChatGPT 和文心一言都会受到一定的价值观干扰;有学者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将给意识形态治理提供新契机,但技术本身的特性及其现实应用也存在各种潜在风险^[7];有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实现了中华文化传播范式的根本性变革,但也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真正实现“科技向善”^[8]。另一方面,关切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应对。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语境中要持守人的文化主体性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构建人工智能开发与运用边界以及伦理规范和制度机制,探索多元文化保护路径与人机协同的文化生产模式^[9];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创造空间,创新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成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力量^[10]。

总的来看,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兼具机遇和挑战已达成共识,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层面对其中存在的风险与应对进行了分析探讨。但是,学者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有何风险看法不一,对其风险的生成原因和机理研判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要素,有针对性地分析其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相对较少,这就使得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产品,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与实践导向,不宜简单地对其进行价值判断,需要坚持理论逻辑与实践实际,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发生机理、作用规律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文化,展现出文化主体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张力,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同这一张力相结合会演化为不同类型的风险挑战,需要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出发,进一步研判其中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基于此,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关系中存在的张力,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出发,有针对性地研判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风险样态与应对策略,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积极策略。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

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11]7。文化价值功能上的自我相关的矛盾性与不合理性,是文化创造对与它的主体(人)的悖谬^[12]8。人与文化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内含牵引力、拉伸力和整合力的张力,使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文化保持稳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3]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华文化主体性之间展现出一定的张力关系,

这也是中华文明旺盛生命力的体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价值功能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主体,却被这项技术挑战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产物,却可能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应用实践。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文化价值上的张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4]就一般性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它以人类为目标群体,满足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提升的需要;就特殊性而言,它往往以特定的文化群体为目标群体,满足特定用户筛选和获取一定文化信息的需要。作为文化存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人类对自身主体性实践能力提升的需求,但这种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产物也会反过来限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同时,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属性的人工智能文化可能会提升或限制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展现出非合理性结构因素。生成式人工智能从诞生开始,就存在文化价值上的张力,既追求人自身认识能力的提升,反映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人的主体地位;又可能限制人的认识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进而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这种张力表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寻求自身认识能力提升的产物,反过来可能限制人民群众自身认识能力的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但它又有可能影响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生成式人工智能揭示数字信息技术的一般性文化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尤其是在生成对抗网络以及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完成文本、图像等自主内容创新。虽然这一技术实践大部分时间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但无论是大语言模型构建还是生成对抗网络,无论是算力实体支撑还是应用场景搭建,都是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因此,无论是从原理、要素、技术还是平台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本质都是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产物,体现人的本质规定性,具有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文化创造的一般表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遵循文化生成、裂变与发展的特殊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4]147} 计算机网络硬件、软件 and 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现代生产的物质条件不断取得飞跃,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变得多样,因此人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对象化产品也会随之变化,完成裂变到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深刻的规律性,随着人民群众劳动实践能力的提升而自发变化,新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自觉能动地对象化为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思维、人工智能、网络衍生品、计算机平台与终端等不断丰富现代文化存在样态与人类生活方式。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持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算法与算力等要素综合作用下生成、传承与创新互联网条件下的多样文化,不断丰富和拓展网络文化产品,使现代社会文化的生成、传承与创新更加多样。

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一般性文化特征与特殊性文化规律,都呈现出其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张力关系。无论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是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存在的文化,从其发生那一刻开始,就既充满未来希望,又充满现实无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4]152} 数字信息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大模型的数字信息文化内容生成机制以及数字文化现象、数字

文化心理、数字文化价值内核等文化样态都反映着未来社会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憧憬,体现着人民群众对现代生活方式创新的追求。但是,受制于劳动生产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和客观实际,对其中的规律性认识以及伦理规约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创新具有不同程度的隐蔽干扰。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中的文化主体与主体文化均含张力

在张力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诞生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合理性,存在着自我相关的矛盾性。人民群众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的主体,但人民群众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容易被限制自身主体性的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本身存在有利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容,同时也存在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中文化主体聚焦的是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13]8}。人民群众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发生与发展的主体力量,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变化和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容易遭遇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成对抗网络和建构大语言模型的过程中实现文本、图像的自动生成与演化,但无论是大模型等算法技术,还是计算机终端、网络传输设备等算力支持,亦或是抓取的、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数据,都是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产品,人在其生成中均展现出主体地位。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承和创新的主体依然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自觉学习、运用和传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并结合自身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创新这种文化。因此,无论是生成、传承还是创新,人都是其中的主体力量。但是,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中,易于网络社会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产生挑战。比如,2025年5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o3 出现了不遵从人类指令的状况,拒绝自我关闭,挑战人在文化生成中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结构上的不合理性是运动变化的,在自身的运动变化中原本合理的功能和价值可能会变为不合理的功能和价值,进而影响中华文化主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中主体文化聚焦的是多样文化中如何判断不同文化的主次与属性问题。在文化建设中要坚持守正创新,而其中的“守正”,就包括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3]11}。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个由人创造的各种要素构成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网络虚拟世界,而人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又受到虚拟网络文化的影响,因此网络虚拟世界中存在的价值上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也会影响人对主体文化的价值判断,出现模糊、混乱和不确定性。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5]208}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按照自己的审美与规则有意识地劳动实践,生产与创造满足自身成长发展需求的文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网络劳动实践的产品,其算法与算力都受制于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它在大模型支持下可以自行运算数据,完成文本和图像生成等内容的创新创造,但是这些毫无例外都没有超出人的价值融入。正如有研究显示,不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会生成不同价值诉求和文化特征的内容^[6]。这就是说,人工智能算法和算力等要素均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文化特征,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那一刻开始,就容易造成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群体受到创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群体价值观的影响。

(三) 万物互联世界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张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并发展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万物互联世界之中,但这项技术一经生成也会对互联网世界中人与人的交往提出限制和挑战,不仅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世界中真实人与虚拟人、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必然涉及万物互联世界中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虚拟网络世界中存在共同主体。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筛选、检索、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却容易弱化共同主体和共同客体,使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阻碍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必要联系。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影响全世界各国民众科学准确地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可能影响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民众一道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人工智能文化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4]因此,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共同文化主体形成与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对破解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虚拟网络世界中存在面对共同文化需求的共同文化主体,但其技术手段和关键要素容易阻断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必要联系。人的现实社会属性使其不可脱离交往的社会,网络空间中人的类本质实现也离不开交往的网络劳动实践。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社会中,存在着从主体到网络再到主体的网络文化主体间性。网络交往社会中的人不仅要理解其在网络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也要理解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共享、共建、共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3]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人民群众了解世界各国文化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的文化交往、促进解决世界共同文化难题。但由于技术壁垒,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都受到了来自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的现实挑战,因此关注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主体间性对理解和回应这些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

既然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中存在张力,那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揭示其不合理性结构中存在风险的一面,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文化主体性的隐蔽风险。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遮盖和混淆真正的文化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遮盖和混淆人民群众在中华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Transformer 架构和生成对抗网络(GAN)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中的两个核心技术,Transformer 支撑大语言模型(如 GPT、PaLM)的核心技术,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处理长序列数据,实现高效的上下文建模;生成对抗网络(GAN)通过生成器与判别器的对抗训练,生成逼真图像(如 StyleGAN 生成人脸)。在这些技术支持下,人可以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快捷、便利地检索和获得文字及图像处理结果,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人类获得间接经验的快捷工具。但是,这一过程也存在割裂人与现实生活、削弱独立思考、扰乱价值判断的可能。这种可能不仅容易影响人在劳动实践中深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生动力,也容易使人在对虚拟网络的依赖中丧失主体性实践创新的能力。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容易使人

民群众的实践与认识过分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使中华文化容易异化为人工智能的简单拼凑,最终影响人民群众在中华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遮盖和混淆人民群众在中华文化遗产中的主体地位。中华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现实的人民群众、实践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仅依靠人工智能的推送。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133}。人需要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人类优秀文化的滋养,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技能。这种文化滋养离不开实践检验与实践创新,抽象的虚拟网络技术很难让人真正理解优秀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必然,甚至会对人传承与创新优秀文化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扩散模型通过逐步去噪生成高质量内容,虽然能够让人在大数据模型的辅助下有针对性地获得想要了解的文化内容,但这些内容缺乏个人主体性实践的体验和检验,较难对人民群众自觉、自发地传承中华文化产生积极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遮盖和混淆人民群众在中华文化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面对人与自然界、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复杂矛盾以及人自身成长发展的诉求,在主体性实践中丰富和创新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但人脱离现实社会与客观实践时,这种矛盾认知和发展需求就会变得抽象,进而影响人的文化创新动力。比如,稀疏专家模型中门控网络可能偏向少数专家,导致其他专家欠拟合;稀疏激活模型可能阻碍未被选中的专家更新,这些训练挑战都容易弱化人民群众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创新能力,影响创新性实践对象化产品的生成,进而影响中华文化创新活力。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掩盖和弱化真实的主体文化

就一般性而言,主体文化主要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中稳定的、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文化主要是指由人民群众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而凝聚成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3]8-9}。这里指明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文化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用户认识、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能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掩盖和弱化这些主体文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掩盖真实的主体文化,弱化人民群众传承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际运行中,往往通过人为或自动的方式,对采集的各项虚拟数据添加标签或符号,帮助用户能够理解、学习和处理这些抽象的数据,同时为用户提供精准化、分众化的信息供给。这种技术操作在计算机应用中由来已久,比如二进制编码、数字仿真模拟等。但作为一种标注方式,本质上不是人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品,只是一种虚拟仿真产品。这种虚拟标记容易引导用户的网络习惯,让用户容易在虚拟标注的引导中偏离主体文化现象、主体文化心理和主体文化价值内核,从而丧失坚定主体文化自觉、客观评估主体文化的机会,使用户在虚假需求和虚拟现实的诱导中降低传承主体文化的内生动力。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容易使人民群众在虚拟标注的引导中偏离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中华文化价值内核,影响人民群众的中华文化自觉与自信。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掩盖主体文化的全貌,弱化人民群众全面完整认识中华文化的能力和

需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中,通过个人兴趣和生活习惯优化数据与训练技术,有针对性地提供片面的文化供给,容易使用户沉迷特定的文化环境,不利于用户在不同文化的对比中自觉地全面认识自身群体的主体文化。在此影响下,用户很容易混淆反映人的类本质劳动的文化和反映异化劳动的文化,从而掩盖主体文化全貌。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损失函数设计,扩散模型使用均方误差逐步去噪,GAN 通过对抗损失平衡生成与判别数据信息,就容易影响用户在多元文化交锋中真实、准确、完整地认识中华文化,甚至影响用户坚定中华文化的自觉。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掩盖主体文化生成的实践基础,弱化人民群众坚定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13]10}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网络社会信息检索与生成的工具,提供的是间接的信息检验和虚拟的信息反馈,很难让人在客观现实中感受自身的类本质劳动实践以及中国改革发展实际,容易使用户产生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困惑,不利于用户通过实践认知和情感体验增进文化自信与自强。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稳定训练策略,通过技术手段有针对性地完成信息供给,容易造成使用者对虚拟世界与现实实践的认知差异,从而影响使用者在客观实践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同时,互联网拟态环境中的象征性现实可能代替真实的文化体验和文化经验,加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和模型部分来自英语世界,本身可能隐含价值偏见和刻板影响,这样就容易使用户在缺乏真实体检的基础上受到价值偏见的影响,进而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遮蔽和阻碍共同文化主体间的互动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文明交流与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13]4}。可以说,关切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共同文化主体以及共同文化难题,是全人类共同科学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作为人类科技创新的必然需求,全人类都必须正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等问题,以此来满足不同民族发展的客观需求。面对这些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解决的共性文化难题,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也会形成共同的文化主体,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协同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共同文化课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容易遮蔽共同文化难题的客观实际,弱化虚拟网络社会中共同文化主体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进而削弱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字模拟和信息适配等方式,对用户获取的信息进行提前筛选,并且向用户提供有利于特定价值导向的信息供给,将会遮蔽不同民族在虚拟网络社会中的共性需求和共同的文化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垂直领域适配机制有可能对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与工程化中,医学领域需结合专业术语和知识图谱进行语言与图像微调,历史领域需要结合历史资料和价值导向进行文字和逻辑微处理。这种垂直领域的适配机制可以使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结果,满足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要。但是,这种机制容易出现共同主体的交往壁垒和信息鸿沟,继而在虚拟交往世界中面对共同文化难题的文化主体产生消解风险,妨碍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从而影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5]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中存在张力，因此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态地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风险，而应努力消解风险并将风险转化为机遇。唯此，才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以文化治理能力为抓手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文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4]，“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16]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风险的重要着力点。

一方面，信息化条件下深化多元主体参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在中华文化生成、传承与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团结共同主体，增进文化主体间性。信息化条件下通过治理的手段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主要是突显人民群众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深化多元主体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4]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增进多样群体共同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比如，构建师生智能体多维交互的学习共同体^[17]，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源化方式，通过技术共享降低创新门槛，通过技术标准化、分层治理和全球协作，构建开放且可控的开源生态等。

另一方面，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信息自下而上的传导方式。治理现代化强调信息自下而上快捷的传递方式，推进实践中反馈的问题和意见能够快速传导到管理者的视野之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需在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机制和人工智能的方式，促使有关弱化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经验，能够及时传导至管理主体，进而增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评估与反馈实效。比如，“通过多方协作与技术演进，构建高效且可操作的治理体系，‘技术—制度—社会’三轴联动机制的协调组织将治理嵌入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18]，对进一步增进完善信息传导方式和评估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规律为参考创新中华文化的嵌入方式

就一般性而言，一定民族的主体文化包括多种形态，如作为劳动实践对象化产品的文化现象、文化心理以及融含其中的价值内核。创新中华文化深层次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从文化现象、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三个层面创新嵌入方式。

首先，推进中华文化现象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现象是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生存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能直观接触的文化内容。推进中华文化现象嵌入，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架构、数据筛选、算力训练、评估指标和应用场景等核心要素之中，使用户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过程中，获得快捷、便利、有针对性的主体文化现象供给。

其次,推进中华文化心理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蕴含在中华文化现象之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是人民群众在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生成并凝结在一起的心理特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共情力,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心理情感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网络实践的对象化产品,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群体的文化心理。“个体会创造性地定义人类心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区别,以此作为社会创造策略的具体方式。”^[19]因此,需要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效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主体与文化载体,通过完善算法模型、数据选择、优化训练等核心要素,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机制和产出结果有效反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

最后,推进中华文化价值内核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所有核心要素都为人的劳动实践所创,其中必然包含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价值判断。在主体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蕴含着一定群体稳定的价值观念,成为主体文化中最为核心、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标识。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中华文化价值内核的嵌入与引导。这就是说,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要素运行之中。依托数字化建设,提升主流价值语料规模和多样性,同时有序推进数据分层次开放,凝聚主流价值语料库建设合力,实现主流文化价值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成与创新到运用这项技术完成信息检索和生成的全过程嵌入。

(三)以正确认识发展需求为前提增进人民群众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动力

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离不开认识和增进人民群众传承创新主体文化的内生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检索工具,更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一种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核心要素虽然会对文化主体性产生弱化风险,但遵循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关切人民群众与中华文化的发展需要,仍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

首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创新创造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及人工智能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要注重对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的培养与强化,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背景下文化创新的主体动力^[20]。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激发人民群众创新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可以关注用户的成长发展需要和人工智能文化创新发展需求,主动设计算法模型偏好,破解可能生成的拟态环境,关切用户网络信息时代生活方式的客观变化,以喜闻乐见、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供给、文化心理凝聚以及文化价值引领,激活人工智能条件下用户创新发展主体文化的内生动力,引领人工智能文化科学发展。

其次,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动力。价值理性坚持人的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即人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后果,关注行为目的的合理性。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中存在张力,使得人民群众在实际技术运用中需要客观考量其目的的合理性。在技术模型中设置人机对话边界,明确人机交互范围,同时运用语义增强技术拓展核心价值概念的应用场景,最终达成“技术拟人”与“价值育人”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激发人民群众传承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需要在算法模型、数据训练、评估机制等要素中前置性地明确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为工具理性的实现以及工具本身的持续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实现人与人工智能文化的协同发展。

最后,增强全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动力。沟通理性强调以理解和共识为导向,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关注对话的“有效性要求”。以沟通理性为支点,进一步增进共同文化主体传承发展人类文明,也是解蔽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可为探索。比如,在影视

创造领域中,主体间性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等影视内容生产模式的共创机制,可以被理解为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内容创作过程中,通过合作、交互和共享资源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的一种动态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可以实现利益共享的共振机制;在意识形态治理中,要通过完善数据确权与分类分级立法,明确公共数据的社会服务属性,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众监督的协同治理框架。这些进一步表明,在应用场景与工程化设计中增进共同主体的交流对话机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在数据策略和算法模型中进一步提升共同主体的价值共识,能够增强共同主体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生动力。

五、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客观的实践基础,反映了人提升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现实需要。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一些技术要素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了现实挑战,但合理运用这些技术则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机械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影响进行价值判断,需要客观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张力,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规律,积极转化矛盾、把握张力,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变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增量。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的劳动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文化也会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新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网络劳动实践创新中会持续发展,脑机接口、大模型等技术也会持续完善,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16]可以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化建设的协同研究,深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抢占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化应用制高点,不仅是未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7-21). <https://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2] 苗逢春.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及其教育适用性考证[J]. 现代教育技术, 2023(11): 5-18.
- [3] 邹广文.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2): 4-20.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5-04-27.
- [5] 习近平.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 求是, 2025(8): 4-8.
- [6] 马文, 陈云松. 文化主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导向干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1): 66-74.
- [7] 孔德臣, 侯勇.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治理: 契机、风险与应对——从 ChatGPT 到 Sora[J]. 探索, 2024(4): 123-138.
- [8] 蒋永强. 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和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143-150.
- [9] 张秀华, 郭静茹. 人工智能语境下文化主体性危机及应对[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5(3): 9-17.
- [10] 周建华. 论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数字技术逻辑[J]. 理论探讨, 2025(4): 127-133.

- [11] 张建军. 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修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司马云杰. 文化悖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 [1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
- [17] 王思遥,黄亚婷.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的形成机理及预防机制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25(11):24-31.
- [18] 陈述,李白杨,詹希旒. 数字蝶变环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点位识别与阶段治理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25(5):24-33.
- [19] 周详,白博仁,张婧婧,等. 和而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凸显下人类的社会创造策略[J]. 心理学报,2025(11):1901-1913.
- [20] 韩喜平,袁涛.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化建设融合的有效机制探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5):57-65.

Hidden Risk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Zhe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how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mitigate hidden risk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inforcing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s a crucial focus for building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ore element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 certain uncertain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pose challenge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is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humans, as the subje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confronted by this technology that questions their cultural subject status. As an objectified product of human labor practi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restri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ubject culture. These structural uncertainties, irrationality, and contradictions give rise to a dynamic tension betwee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ies a hidden risk of undermin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mainly by obscuring and conflating genuine cultural subjects, masking and diluting authentic subject culture, and obstructing objective interactions among common cultural subject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oncealed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aken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unde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grasp the core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novate methods for embedding subject culture into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by fostering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cultural subjects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subject culture.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dynamic tension, risk challenge, coping strategy

责任编辑:陈卓

《探索》格式规范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结合编辑出版行业相关规范,《探索》杂志执行如下格式规范。请作者在投稿前对照要求调整文章格式(建议参考《探索》近年来已发文章)。

1.文章题目。新颖、简洁,一般不超过30个字。

2.文章摘要。须简明、客观地对文章进行概述,不对文章做评论、补充或解释;具有独立性,能脱离论文独立使用,具有与正文基本等量的信息;不使用“作者指出”“本文认为”等与之类似的词汇。500字左右。

3.关键词。一般3~5个,关键词之间以中文分号分隔。

4.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2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独立署名文章。作者署名之下注明每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全称及所在地的城市名、邮政编码。

5.基金项目。若有基金项目,请在文章首页页脚标明,格式如下:项目性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具体项目名称”(具体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XXX。

6.作者简介。标注在文章首页页脚。列出:姓名,性别,学位,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7.文章各级标题编号采用“一(一)(二)……二(一)1.……(二)……”标注。

8.注释。注释是作者对标题和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补充说明,须放置在当页页脚;注释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相一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

9.参考文献。引文出处采用文尾注形式。参考文献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一致,左顶格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注:[1]、[2]……每条参考文献最后均以实心句号结束。专著和汇编文献的具体页码标注在文中序号旁。同一处有多个文献出处的,只选一个。同一个文献在文中多处出现的,该文献标识序号不变,文献为专著或汇编的,文中序号后标注具体页码。

9.1主要文献类型及其标识代码。专著[M]、会议论文集[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数据库[DB]、电子公告[EB]、联机网络[OL]。电子文献类型标识说明:[J/OL]——网上电子期刊;[EB/OL]——网页信息;[DB/OL]——网络数据库。

9.2常用类型参考文献的编写格式:

(1)专著、汇编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用“YYYY-MM-DD”的格式表示).

(4)外文译著、译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中文译者.中文本出版地城市名:中文出版者,出版年或中文期刊名,X年(X期):起止页码.

(5)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专著(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专著(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城市名:出版者,出版年.

(6)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代码].(网页日期).具体网址.

(7)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名.论文题目[D].学校所在地城市名:学校名,出版年.

9.3外文参考文献格式按照中文参考文献格式列出。当以英文著录作者名时,其姓要写全且每个字母都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且大写,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文献名首字母要大写,文献名中专用名称的首字母大写,其余都为小写字母。

10.英文摘要。包括文章题目、作者名、作者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内容与前面的中文信息一致。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1期（总第247期） 2026年1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z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总 编 辑：金华宝

副 总 编：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No.1 (Sum No.247) January, 2026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Jiulongpo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zs.net> or <http://suta.cbpt.cnki.net>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Vice Editor-in-Chief: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60